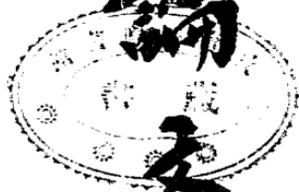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國慶日

曾憲論文集



320.4
1010

27980

雷震論文集

借閱者姓名	借出日期
李登輝	1981.10.4
林慶年	36.4.21

中華民國教育部
圖書館

登記號 27980

類別號 _____

雷震論文集目次

擁護民族領袖並正告日人.....	一五二
中國果不能與日本一戰乎.....	一五三
養成鬥士的精神建設新中國.....	一五五
進步與鬥爭.....	一五六
日帝國主義侵略東三省之經濟政策.....	一五八
國聯何以屈服於日本.....	一五九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駁議.....	一六〇
兩不討好的國民代表會.....	一六二
高考及格人員的呼聲與考試制度.....	一六五
法治國家的真諦.....	一六七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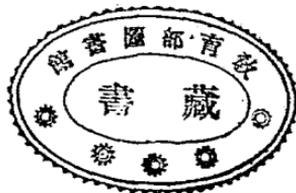
一



3 1797 7588 1

520.4
M G
D693.09
645

國營事業之我見·····	一五七—一六三
統一先從小處做起·····	一六三—一六六
我們要超越抵抗的心理纔能排除國難·····	一六七—一六九
如何整理財政·····	一六九—一七四
救國應先恢復民族精神·····	一七四—一八一
荒謬絕倫之日本聲明書·····	一八一—一八七
二十一年後的新展望·····	一八七—一九七
黨國當局應有之覺悟·····	一九七—二〇三
建國戡亂之正道——真與誠·····	二〇四—二一五
航空救國與國民動員·····	二一六—二二九
外國糧食傾銷與我國農村經濟·····	二三〇—二三二
我們要準備進攻纔能應付國難·····	二三三—二三七



擁護民族領袖並正告日人

二十四年七月中國新書



(南)

五月二十九日，日本駐紮天津軍部酒井參謀長及北平日使館高橋武官，突如其來的對北平軍分會何委員長提出爆彈的要求以來，兩國政局驟現緊張，華北風雲日趨危急。觀日本軍部的活動情形，如軍隊的調遣，軍需品的搬運，軍事人員的往來等等，大有可繼九一八，一二八，長城古北口諸役之後，而再為一次更大的武力侵略××。華北的運命如何？甚至全中國的運命如何？言念及此，不禁戰慄。政府之交涉，我們無從過問，我們站在國民的立場，不能不表示明白的態度。

一

五月三十一日上海每日新聞載稱：酒井高橋對北平軍分會所提出之條件為：

- 一 解散×衣社，CC團，政訓處；
- 二 罷黜于學忠張廷諤；
- 三 解散河北省黨部及特務工作人員；
- 四 中央軍離開河北省境………

日人所藉口的，是停戰區內孫永勤部有擾亂熱河之行爲；關東軍出師討伐，于學忠部下之保安隊

擁護民族領袖並正告日人

，不時不協力攻擊，暗中反有幫助孫部之嫌，如指示孫部之逃走方法，供給彈藥糧食等等，顯見中國軍隊欲資助義勇軍以擾亂「滿洲國」。又稱天津兩個親日派的新聞社長胡白之被暗殺，完全是中國官廳所指導之下的排日行動。更進一步酒井並指出何應欽氏對於擾亂國境地帶之匪徒會給以義勇軍名義之事實，係爲反「滿」行爲之表現，指摘蔣委員長之對日政策爲「二重外交，爲糊塗欺瞞」，「南京政府」之對日聲明，僅不過欺瞞之一種手段，並攻擊蔣委員長年來之政策，謂其操縱各黨各派，卵翼藍衣社，欺騙中國民衆，言下且暗示有促蔣委員長下野之意。

六月九日酒井高橋二次會見何委員長，催促前次要求的實行，並加上一些其他的要求，如五十一軍之撤退河北，排日之絕對禁止，宋哲元軍隊之調開，未了更殿以覺書而脅迫我國北平負責當局之簽字。

所謂如何如何的條件，現在差不多完全見諸事實，中國當局在盱衡大局委曲求全之中，已絕對的忍痛讓步，自動收拾危局矣，吾人於此，不得不提出如次之疑問：

- 一 停戰區域內的責任在事實上中國能單獨負得起麼？
- 二 漢奸就是親日派麼？
- 三 國際條約應該一方遵守麼？

四 怎麼叫做排日？

一

查孫永勤部之起，實因日本久佔戰區。塘沽協定已過二年，而其不撤兵如故，雖經我方負責當局一再交涉，但我之保安隊尙未能完全進駐，於是戰區乃爲匪徒出沒之所。日人平素縱匪殃民，華北各報曾屢加指摘，以致孫部乘時崛起，後竟與日軍爲敵，可見負責者完全爲日本方面。中國人民飽受孫匪之劫掠，雖深恨日人之縱匪，但外部並未對日提出抗議，也可謂吞聲飲泣了，而日人竟肆意造謠，據爲口實，謂中國軍隊及民團資助孫匪，其誰信之！現在所謂「滿洲國」境內，土匪出沒無常，義勇軍到處發現，列車時遭顛覆，日兵屢遭慘殺，此又豈中國軍隊與民團之資助以成乎？一二八之役的元兇白川氏死於何人之手？這又是中國人之教唆所致乎？前年台灣番民之暴動，日本軍隊疲於奔命，這又是何人的指使？中國境內亦常有土匪出現，這又是中國政府的教唆麼？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日人慣行此技，我們亦不欲多言了，總之，停戰區中到處駐有日軍，且動輒實彈演習，如有土匪發生，日人應負其責！日人在停戰區域應負的責任如何，且看外國人的公論：

一 孟却斯德保衛報載駐平特派訪員稱：「萊斯脫女士在河北省昌黎縣發現販賣麻醉品之日本人，至一百十六名之多，而高麗人亦有四十七名，此中有六十五名，迄自本年之初，始乃僑寓該地

，至其所售毒劑，價目甚為低廉，一旦被人破獲，則均以治外法權為護符，而得逍遙法外，即以樂亭一處而論，該處人口僅有三萬，而日韓人所設麻醉品商店已有二百處之多，唐山及三治一帶鑛區，工人受毒劑之害尤為劇烈，按之可靠消息，最近十二個月以來，唐山中開設麻醉品商店共有五百六十處之多云」。

二 孟却斯德保衛報社論云：「中國人毒癮加重情形，至為可怖，日本所負責任至為重大，現有種種有力之證據，足以證明中國人所吸毒劑，多半係由日本屬地販運而來，或由該處經過，且係得有日本官廳之同意，而專在華北一帶推銷者，任何公正觀察人士觀此情狀，無不提出下列一項問題，即日本陸軍對於長城以南數省，既懷抱野心，則此種毒劑，足使中國人民意志銷沉無力，不能與日本拓展主義相抗者，竟可公然販賣，是否由日本陸軍加以鼓勵是也。」

中國年來受煙禍酷烈，故政府決心禁絕，各地禁煙均有進步，獨停戰區域內煙毒日增，日本軍人能辭其咎麼？據今年國聯情報處發表情報稱：「據偽滿公佈第六十七號佈告，偽滿煙民九十萬人中僅八萬二千六百人持有執照，無執照者達八十萬人，每年吸食鴉片之未受管理者達一千五百噸，此外其他毒物之每年消耗亦達三十噸，此種毒物之販賣，實足危害世界」。該處同時又稱此間國際方面均信：「全世界禁煙事件之最重大革新，現正在中國發展中，中國政府對於禁毒之努力實為中國力求擺脫

鴉片桎梏之誠意的表現。……最公正之批評者，咸不能否認中國政府所操方針爲任何其他各國所未見，卽此可見政府之決心，……又若其他各國頗多以禁烟所收極肥，而致因循者，此種危險，中國政府如何防制，亦堪注意，然中國政府在此艱難之候，以堅卓之力，而確獲成功，則爲不可否認之事實，此實不能不對中國政府蔣介石委員長及禁烟各局道謝者也」。

總之。在停戰區域內，中國政府是無法負責的，其一切的一切，中國政府縱欲負責而事實上不能，鴉片紅丸特其一例耳，世界均知中國在此區域不能負責，而日本軍部偏欲嫁禍於中國，其居心如何可知矣，日人在中國戰區以外各地尚有如左之行爲：

一 製造偽鈔偽幣

二 貨品入國偷關漏稅

三 假冒中國商標，將日貨上面標明「中國製造」，「國貨」等字樣，（日人商業道德之低劣，爲世界各國所公認。）

四 不按條約，到處任意行動。

三

胡白二社長被人暗殺事件，本發生於日本租界，日人已屢稱此二人爲親日派，何以保護竟如此不

擁護民族領袖並正告日人

嚴密，致遭匪徒之襲擊而死，且暗殺事件本爲日本軍人的家常便飯，日本的好幾位首相及政界財界要人均遭軍人暗殺，是明明白白的事實，遠事姑勿具論，原敬之被刺斃於東京驛，濱口雄幸之因暗殺受創而死，犬養毅，井上準之助，團琢磨武藤山治等等之受同樣之非命，如此事實，不勝枚舉。日本的堂堂首相，可以隨便暗殺，而中國的兩個小小社長，因暗殺而引起國際間之重大交涉，或竟引起世界第二次大戰，何以彼此相懸之若此！嗚呼，余不禁爲日本首相惜矣！至謂胡白之被暗殺，謂爲在中國官廳指導之下的行爲，試問有何證據！中國官廳從不幹這些無聊的行爲，且亦不值得幹的。那麼，我們焉能說日本政界財界要人之被暗殺，是當地官廳指導之下的行爲麼？

日本軍部認爲胡白二人是「親日派」，故胡白之遭暗殺，就斷定是中國排日行動之表現。日人慣會硬派中國的負責當局或名流學者某某爲親日派，某某爲親英或親美派，或直稱爲歐美派，其實這種硬派強指，根本就陷於錯誤，中國人只知有祖國只知有人類，對於祖國，應該獻身努力，對於人類要盡其應盡之責任，不知單獨偏向日本或歐美親善；無論何國，凡對於中國友善者，中國亦以友善報之，凡抱有野心而欲侵略中國者，則必出其全力以抵禦之。日人之如此硬派，非不智即含有惡意之挑撥。中國人最多只能說某某會說日本話或操英語，或他比較對日本或英美國情比較了解而已！根本談不到甚麼人是親什麼。

退一步論之，假定某某爲親日派，但所謂親日要與漢奸有區別。親日也者不過對日本政治國情比較明白或同情而已！其中心主義仍是以中國爲本位，漢奸則是以個人爲本位，他只圖其個人目前微末之私利，罔顧國家民族之利益，他是叛逆，他是危及國本之凶寇，不獨與中國本位有反，且與中國的秩序安寧有極大的障礙，中國人與漢奸之不能兩立，猶之如日本對於謀害祖國的人或謀刺天皇的人要處死一樣，日本人晝夜防止韓國人之獨立，民國十二年東京大地震爆發之時，謠言四起，僉稱韓人擬放火殺人以企謀獨立，傳稱已在東京組織臨時政府，日本青年團員手持鐵棒一見韓人就一棒打死，大街小巷，排隊巡邏，風聲鶴唳，人心惶惶，中國人被誤認爲韓人而遭棒擊喪命者爲數亦不在少，其實韓人並沒有這一回事，完全是日人之神經過敏，平素防恐韓人企圖獨立的恐怖所致，日人自命爲文明人，何以有這種行爲？日人如此謹防韓人之變亂，則中國人剷除漢奸亦屬應有之工作，且爲愛國之行爲，有何據爲交涉之口實，我深知日人有崇君尊上愛護祖國之美德，而最厭惡通外的行爲，中國人也一樣。親日與漢奸不同，日本軍部不要引漢奸爲親日派，則共存共榮才有實現之希望。

四

日人又謂中國政府蹂躪條約，不遵守天津議定書及塘沽協定，但是中國政府甚麼地方違反條約或協定？日人又不能舉出有力之確證，我們知道日本人是向來不顧國際條約而一味橫行的，九國公約，

非戰公約已被日本人撕爲廢紙，國際聯盟儘可任意脫退而不交還南洋羣島，仍有許多一相情願之理由，在日人心目中那裏有甚麼國際信義？現在又來講中國蹂躪條約，其用意不外欺騙日本的國民，使之贊助其侵略的行爲而已！世界各國自從四十二對一否認日本的信義以後，已無不知日人道德水準之極低，不可以理喻者矣。卽就塘沽協定而言，不是日人早應撤兵了嗎？而乃遷延二載，一味延宕，至今仍未退出長城以外，其蹂躪條約已有明明白白的鐵證了。北平保定均非停戰區域，中日兩國條約並無承認日本飛機可以自由飛行領空之規定，爲甚麼日本飛機可以自由由承德飛至南苑，有時飛至平漢津浦路線，此豈只違反兩國友好條約，簡直侵犯中國領空，「偽組織」實行石油專賣，是否違反條約，日人有不帶護照任意至內地旅行，又何嘗不是侵犯條約呢！日本在中國的報紙，不論中文或日文，常常散布許多謠言，每乘政局發生變動之時，更肆其生花之筆，是非顛倒，黑白混淆，這又合於兩國之友好條約麼？日人常利用謠言以自肥，故在中國之日本報紙平均每日至少可找出謠言一條。「日本軍部廣派偵探到處刺探秘密，這又是條約上的正當行爲麼？總之，國際條約應該雙方遵守，尤應採用平等互惠的原則，不獨不應強令一方遵守，尤不應片面的解釋或任意的曲解爲武力侵略之口實，

五

日人動輒加上中國一個「排日」的銜名。日本外交官或軍部人員一見到中國負責當局，開口不是

說「中國現在如何如何排日」，或就是說「某地又發生如何如何抵貨」甚至以純粹敘述歷史的教科書也含有排日意義在內，不願買日本貨更是排日行爲，提倡國貨也是排日的變象，教育部頒布的留學規程也出於排日之結果，財政部釐訂稅則也有排日性質，諸如此類，中國政府及人民一切行動，凡有利於日本侵略政策者，都可概括之曰「排日」，他這種口頭禪，不獨成爲日本最近對我各項交涉之開場白，簡直變成其要求權利的絕好口實。他——日本人——不待你——中國人——發言，就似是而非的或竟無中生有的說上了一大套，加上了許多莫須有的罪名，甚麼排日抵貨如放連珠砲一樣，等到說完了之後，再加上許多要求。聰明點的人有時也許還能答辯幾句，不然連洗耳恭聽就來不及。日本人近年對我國一貫的手段是採用這個方式，因爲使你不能準備，他可以把你頭腦說得發昏，精神陷於疲乏，終於連你自己也就半信半疑或竟信以爲真了。譬如日本人常說他的貨物比西洋貨如何好、而且價錢非常便宜，簡直價廉物美，中國人爲甚麼出高價買西洋劣貨而不願意出低價購買日本美品呢，這就是中國人排日的緣故，他說得像煞有介事，聽起來也是乎「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其實都是武斷，都是矛盾，都是自私。平心而論，日本貨也許有時比中國貨好一點，或許一般比中國貨略爲好些，但是無論如何，無論怎樣，絕對不能超過西洋貨的堅牢，美觀吧。日本人說中國人依然抵制日貨，爲甚麼日貨進口增加，據本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海電稱，海關息，本年五個月全國對外貿易輸入總值爲四

五三，九六八，六五四元，較去年同期減少二九，六六一，七六九元、但是其中日本的進口貨，值六千四百九十三萬九千餘元，較去年同期之四千九百七十一萬六千元則頗有增加，中國人如果繼續抵制日貨、能有這個現象麼？不過中國人沒有像日本人所希望的全部購買日貨罷了！至於排外的事情日本人真比中國人多，最少不會比中國少。日本教員在講堂上沒有不罵美國人的，因美國人拒絕日本移民的緣故、末廣重雄也好、米田實也好，這是日本最懂得外國事情的人，其罵美國則一也。不獨如此，馴至一般日本人，均懷恨美國人。日本小學教員上課時總是罵中國人不好，說得中國如何如何不行，所以日本小孩一提到中國人就搖頭。日本人心地狹隘，愛國心強，其排外之思想更濃厚，中國人焉能與之比擬哉！中國人寬大為懷，一視同仁，除非受他國之壓迫而謀抵抗，向來無所謂「排外」。近年中國之對日本只可說是抵抗，不能謂其為排外，日本這幾年一再壓迫中國，事實筆不勝書，可謂無所不至其極，中國除失去廣大之領土外，人民所遭受物質上精神上之損失，絕非楮墨所能形容，在此狀況之下，猶欲中國人不出於抵抗，其可得乎？就是把中國土地整個併吞了，倘若不能把中國人殺盡，中國人還是要抵抗的。而這種抵抗到底的態度，遠者不必說，即就最近東四省的情形，已可證明而有餘。

路透社上月二十四日長春電：關東軍司令部今日發表公報稱最近一個月內，軍隊在「滿洲國」境

內共與義軍交綏一百九十五次，軍隊死二十五人，義軍委棄屍體一百四十二具，現「估計共有二萬八千人，約及一九三一年之總數七分之二」，其團體之特長如下，（一）漸次集團化；（二）服裝與旗號漸次模仿「滿洲國」軍；（三）戰術漸次巧化，此外因地形上之關係，討伐極感困難，故該項義軍恐不至迅速減少，事實具在，日人其鑒諸。

六

以上爲對日問題我們國民所取的態度，次論日本軍部攻擊蔣委員長個人之不當。

酒井高橋此次提出無理的要求，同時並對蔣委員長加上許多威嚇式的攻擊，據謂人事的調動與部分的變更無關於大局，惟蔣先生堅持「二重外交」的政策，乃中日提攜之障壁，酒井氏對新聞記者大膽地說道：

「二十九日會見時曾約何應欽氏再會一次，故現在到北平來。今天把我軍的真意說明使其信服，對現下問題也毫無忌憚，儘量說完了。我們並不僅交涉華北問題之局限於一方者，究其極，實以此問題爲契機，蔣介石氏之對日態度如何，非究明真相不可」。關於此點曾對何應欽氏說道：

我們糾彈蔣介石氏，因爲中國四萬萬民衆起見，他是錯誤的指導者，決不是因爲說給中國民衆聽的立場。使滿洲事業勃發的，豈不是錯誤的對日態度麼！他這個人理應謝罪於國人，非即刻負責

辭職不可。然因爲不肯爲此，故截至現在止，仍不能不採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矛盾政策。因此之故，陷國民於塗炭之中，依然想固守此政策，在國民之前致受無廉恥之譏，此排日的賣國行爲，中國自己怎麼看法，中國民衆現在對蔣氏的信任正應該澈底忌避，對於蔣氏全國民衆豈不應該舉行不信任投票麼？（見二四年五月六日上海每日新聞所載）

日本使館磯谷武官更於六月五日在北上前發表聲明書，闡明日本軍部對於華北事件之意向，甚至謂不幸事件之禍根，由於蔣先生之政策所致，其大意如左：

華北此次發生的事件，係因南京政權（不稱政府）在表面上雖稱緩和抗日，而暗中則利用藍衣社憲兵黨部及其背景之中央軍，以束縛中國民衆之自由與脅迫其生命，而鼓吹排日思想的結果，上述之藍衣社等，均於獲得獨裁政權的必要上，爲蔣介石氏特設之機關，亦可云蔣氏之所有物。自此點觀察之，斷定禍根正在蔣介石氏自身之政策，日本政府此次令關東軍及中國駐屯軍以芟除此禍根者，實將中日兩國國民由禍害救濟出來，將中日兩國之關係根本的匡正，以招致東亞全局之和平，實出於這種崇高之觀念（？），其主張行動，光明正大（？），俯仰天地而無愧（？）倘蔣介石氏不根本的改正從來的錯誤政策，事將愈加糾紛，華北一二當局之更換，對於事態不能有何等之改善，蓋此不過枝節之問題而已，要之，事件的本身，固不過華北之局部問題，而禍根之

掃蕩，則在中國整個的問題也。（六月六日東京朝日新聞及六月六日上海每日新聞）

我們讀了日本軍閥這種狂妄的信口雌黃，惟有滿腔氣憤與慚愧，他想把他們侵略行爲與趁火打劫的勾當，說得冠冕堂皇，好似梁山泊上的替天行道，所謂光明正大，公正無私，直有「弔民伐罪」的口氣，其實日本這種行爲，無論何人，都看得很明白。日本人素以善造名詞自誇，我不知日本國民是否愚蠢至此，但是中國民衆則絕不會受這名詞的欺騙，如酒井所謂「排日的賣國行爲」不知如何聯絡起來，信如所言，則爲抗日而犧牲生命的反是漢奸，而鄭孝胥熙洽之流乃是愛國志士了！固然，自日本人眼中看來，凡投降日本的都是好人，凡謀抗日的都是惡人，所以要把手學忠趕掉，宋哲元驅逐，這種價值誠然是日本本位的。但是我國民衆，只有澈底抗日的一途，試看九一八以來之輿論，有痛恨日本的麼？即間有不主張武力抗爭的，也不過恨國家的力量不足，不能和日本宣戰罷了！「甯爲玉碎，不爲瓦全」乃是國民一致之主張。

會憶本年五月中旬（已忘正確日期），上海江南正報（該報現在似乎停刊是日本人辦的中文報）有一篇社論，題爲：蔣介石宜即奮起！有一副題是：若不立即下野以謝國人。其中的意思是說：現在國民政府的大權握於蔣氏一人之手，故中日提攜之進展，悉視蔣氏的態度如何而定，汪精衛黃郛等輩都不過表面的交涉人而已。如果蔣氏有中日提攜的誠意，理應儘速親往東京，披瀝胸懷，否則宜即

刻下野以謝國人云云。今讀酒井的公開談話，也說「理應謝罪於國人，非即刻負責辭職不可」。則日人的真意如何，當可見矣。我們不要拘拘於文字的表面，打開窗子說亮話，則一言可以蔽之，即是：你蔣介石趕快前來投降！如果不投降，則我們要逼你下野了。讀者諸君！時至今日，應該認識，現在的華北問題，決不是河北一省的問題，乃是中國不肯做日本附屬國的問題了呵！

自九一八以來，痛恨日本帝國主義的心理已普及於全中國的全民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政策，在我國民衆的眼中只有責備政府抗日之不徹底，不能充分盡自衛國家的責任，而日本軍閥尤嫌其妥協之不定，親善之不足，故此次又以不相干之理由，威逼政府投降，蓋其欲實現亞細亞門羅主義的焦急心理，使其一味橫行而已！然而日本軍人不直接罵中國政府而專罵蔣委員長一人者，自另有其奸計在。他們明知要使中國民衆不痛恨日人，是絕對不可能的，然而要使蔣先生一個人屈服，則比較容易。故一方使在華的軍人大聲恫嚇，陸軍省參謀本部則明白爲其後盾，而他方外交部則故意推諉，說這是軍部的事情，不能由外交解決，窺其用意，無非使中國政府屈服於武力之下，與其締結條約，說名義上實際上中國都是日本的殖民地罷了。

其實，蔣先生下野與否全看中國民衆是否擁護爲轉移，並不因日本軍人的意旨而決定。過去蔣先生曾兩次下野，然以民衆的擁護而旗鼓重張，其地位日臻鞏固，則是否錯誤的指導者，已經國民的判

定了。今日的政治家下野上台本爲尋常事件，然而促其下野擁其上台的必定是其本國的民衆，並不要仰仗外人的鼻息，由外國軍人來講話。如果要發見這種政治家，只好到無人承認的「偽滿洲國」去找罷了。中華民國還有一天存在，這種事件，我們國民絕不許其發生，正告日本軍人，勿存此非分的妄想！在這國難嚴重的今日，我們四萬萬民衆只有絕對一致擁護民族領袖蔣委員長！尤其擁護他能抗日到底，他能復興中國！

又近來的日本報紙屢屢謂中國政府堅持「二重外交」，即表面上雖和日本虛與委蛇，而實際上却不肯投降日本、以前廣田有吉等看見中國受世界恐慌及美國購銀的影響，經濟不況已達極點，乃以借款爲餌，欲使中國政府上釣，此中日經濟提攜之說所由倡也。誰知中政府始終只是虛與委蛇，而最近市面日見穩定，經濟不況，已成過去，則誘之上釣殆不可能。故一變其和藹的態度，顯出其猙獰的面目，借華北二種小題，而認真大做起來，以求其所大欲的發洩。

夫中日兩國，同文同種，土地接壤，理應提攜親善，爲世界謀和平，爲人類造幸福。不幸實際則不然，中國人無論誰個無不痛恨日本，甯願同歸於盡，不願忍辱生存，伊誰之咎？不要說得，日本應該負其全責。日本軍部整日大聲疾呼曰：一九三六年戰事快來了！要應付一九三六年之大戰，則不能不要求爲戰事上所必要之種種準備；而夢想與中國軍事同盟及經濟合作，都是爲達到這個目的。試問

何以有一九三六年戰爭之發生？難道不是因為日本欲併吞中國所招來的麼？九一八以來，日本軍閥，張牙舞爪，在在向列強挑戰，列強還是隱忍自重，不敢輕啓戰端。如果日本不想單獨併吞中國，有誰和你開戰？則何來一九三六的危機？故日本軍閥一手製造戰爭，而又以戰爭恫嚇其國民，使之不得不追隨其後，這種計劃自然狡詐而巧妙。而其結果，則不獨犧牲中國民衆已也，一旦大戰勃發，而遭慘敗，蹈前德帝國之覆轍，則日本國民也不是同歸於盡了嗎？日本在世界之孤立，已成無可掩飾的事實，則未戰之前敗徵已見了。正告日本國民，要講共存共榮，須站在平等的地位，才能盡互助的使命，切勿追隨軍人之後，以趨於共亡共滅之途！則不獨東亞和平之幸而已，世界全體人類實深賴之！

中國果不能與日本一戰乎？

一

在中日關係好轉的聲浪之中而高談中日戰爭能否發生，或中國能否與日本一戰，若不爲識者譏爲不識時務之徒，卽易被通者認爲幻想空談之輩，正不值方家之一笑也。其實吾人應認清目前所謂「好轉」之內情如何，日本果有誠意與中國共存乎？中國豈真願與日本親善乎？不要說得，日本所要求之親善，是屈服式的親善，簡直是要中國俯首投降，而中國之表示親善亦係具有不得已之苦衷，所謂虛

與毒蛇者是！在這種狀況之下，中日親善固屬可能，中日交戰難保不有，故在親善之中檢討戰爭，準備戰爭，正爲未雨綢繆之計，應無無的放矢之譏。而且中日兩國今後果能走上「共存共榮」之道乎？抑不幸而趨於「同歸於盡」之途乎？恰在十字街頭，正賴兩國負責當局之審慎決定，尤視日本軍部之能否懸崖勒馬。故於此時研究兩國能否發生戰爭，尤其論到在中國今日能否與日本一戰，猶之在身體健康時而講究如何衛生以防止疾病者，或亦爲兩國人士所渴望之意見，而不能譏其全爲無稽之談。請觀美日兩國國交現在是如何親密，而兩國士子討論美日戰爭之書籍何以又如此之衆，此正示兩國雖在親交之中而亦有發生戰爭之可能性。惟本人既非軍事專家，所論不免偏於推測，識者通者也許認爲幼稚，然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能如此則幸甚也。

二

語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在普通情況之下，我們要論斷中國能否與日本一戰，當然要先檢討日本軍隊動員的數量如何，軍事各部門的設備如何，換言之，軍隊第一次能有多少動員，以後究有多少補充，兵器之貯藏如何，彈藥之補充如何，軍艦戰鬥力如何，飛機轟炸力如何，其次論及戰時日本食糧如何接濟，工業原料如何補給，海外貿易如何進行，人民生活如何維持，諸如此類，必須將日本方面的一切分析清楚，同時將中國同樣的條件亦一一加以剖析，然後以中國與日本相較，才能檢

討中國能否與日本戰爭。必如此知已知彼，才能握着最後的勝利，中國目前一般的識者通者均是這樣盤算。但是如果這樣打算，中國與日本最少是一與十之比，日本可比一個老虎，中國不過一個小貓，日本各種設備之充實，國力之富足，而且接濟有源，補充有備，一切均非中國可以勉強比擬，那麼中國簡直不能與日本戰爭，日本如果提出什麼條件，中國祇有馬上屈服，日本軍部祇用「斷然的處置」一聲威嚇，就能立逼中國就範，正無怪乎識者之中竟有主張目前廢止國防之論。這樣打算愈週密，中國愈不敢與日本抗戰，這樣知己知彼愈真確，中國滅亡愈加快。

這種商人式的算盤主義，在錙銖較量的買賣上固然有效，但施之於民族生死國家存亡之最後關頭上殊萬不可行，就是商業上算盤打到十二分的人未必就能獲利，有時亦須具有遠大之眼光與冒險之精神始克有濟，中國商業之失敗與外國商業之成功，何莫非因此而造成，至担負國家重任操持民族子孫運命之當局，應如何高瞻遠矚以爭民族之永久生存呢！日本如果不來侵略，中國人民當不願自動挑戰，倘如日本一再侵略，非遂行其大陸政策以滿足其軍人之慾望不可，此時中國也不能忍垢含辱，屈服到底，縱然只有斬木爲兵揭竿爲旗之具亦非與日本一決雌雄不可。所以說中日兩國倘不幸而開戰，不獨其禍首厥在日本，中國亦只是迫不得已而應戰，正所謂爲國家人格而戰爭，爲民族生存而戰爭。這種戰爭既是抵抗戰當然談不到勝負，這種戰爭既是掙扎戰當然計不到利鈍，遑論知己知彼！「正是被

侵略者之對於侵略者，如尙有自求生存之意念與決心，根本談不到知己知彼，也根本不配談知己知彼，而在侵略者對於被侵略者非置於死地不止之時，則尤其不必談知己知彼。……此侵略者之貪暴，能許你有談知己知彼，策萬全而後行之之機會乎？（見中國新論第一卷第四期社評）。故在這種場合中國能戰也要戰，不能戰也要戰。

論者又以爲中國實力既不堪一戰，如不自度量而勉強抵抗，其結果不過徒然犧牲，毫無代價，不觀乎「一二八」之役，閘北淪爲焦土，人民之生命與財產損失無算，最後仍不能不簽字於淞滬協定；復不觀「古北口」之役，軍隊抗戰半年，死傷前仆後繼，人民遭受之損失更不計其數，結局仍不能不承認塘沽協定。前車可鑒，今日如果不能忍辱負重，其結果不惟相同，而其損害之範圍則更廣大。我以爲此種看法，全屬粉飾遁詞，而且自欺欺人，誠然一二八之結果固不免簽字於喪權之淞滬協定，誠然古北口之終局又不能不簽字於辱國之塘沽協定，然兩次抗爭所表示之民族精神如何，兩次奮爭所給與國民之自信力如何，外人對於中國軍隊抗戰成績之讚美又如何。十九路軍以後雖誤入歧途，然當時氣概，磅礴宇內，中外共仰，至參加古北口諸役之中央軍及宋哲元軍隊，肉搏抗戰，日人恨之切骨，此次日本軍部必欲去之而後快者，乃報復故耳（日本報紙如東京朝日新聞等稱中央軍及宋哲元軍隊在古北口頑強抗戰，軍部認爲係與日本爲敵，故必使其離開河北省境）。有此結果，雖敗猶榮，故一

二八古北口兩役，不能謂其在民族史上全無代價也。即退一步而論，戰敗而簽訂喪權辱國之條約，比不戰而喪權辱國者又如何，是故與其不戰而亡，則不如戰而亡。

又有一部分老成持重之輩以爲中國目前既無國防，海軍空虛，加之農村破產，經濟衰落，此時斷不能對外戰爭，戰則必無良果；吾國目前所急圖者，應積極增加生產，培養國本，臥薪嘗胆，生聚教訓，以待他日最後之一決。此種論調，言之似乎成理，析之完全無故。吾人有二點欲問者，第一、獨中國人能臥薪嘗胆雪恥復讎，他人則終日偷閒蕩檢優遊歲月乎！又惟中國人能刻苦耐勞增加國富，他人則坐吃山空毫不長進乎！其實中國一切落後，日本一切占先，日人之勇猛奮鬥，進步神速，遠非「天下太平」「偷安苟活」之中國人望塵可及。中國走前一步，日本人起碼跑上二步，中國國力增加一分，日本國力最少增加二分，以此類推，何日可以復讎！何日可以雪恥！反躬自問，中國人又何嘗真正能臥薪嘗胆呢？我嘗論中國人是「敵人來了就慌張，敵人去了又頹唐」，其怠惰頹唐萎靡麻木之程度又遠非他國人所可想像。至於國防一層，中國今日固然談不到，即在最近的將來，中國縱急起直追亦萬萬趕人不上，不觀乎軍縮會議失敗後各國正盡其全力以從事於軍備擴充乎？在這種局勢之下，談到國防，亦只能就相對而論耳。第二、我們縱欲和平的從事產業增進國力，試思他人能允許我們有從事殖產以增國力之機會乎？老實說一句，如日人之如此威逼萬般欺凌，顯然是不願意中國發憤圖強有統一

鞏固之中央政府出現，遑論和平的從事產業。田中義一對滿蒙積極政策有云：「將來要制服中國，也必定要打倒美國的勢力爲先決問題，但是要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事實已表現了），如果要征服世界，必定要先征服中國，最可恐懼者，就是中國人民漸漸覺悟起來，雖然是在內亂厲害的時候，還能夠極力的模仿我們日本，因此對於我們商業的發展阻礙很大，加之，我們日本貨專靠中國人做顧客，將來中國統一，工業必定隨之而發達，……於是我們日本對於中國的買賣，也要受很大的打擊。……就我們日本的現在和將來的情形看，如果要造成昭和新政，必須積極的對滿蒙採用權利主義，用權利來培養我們的商業，不但可以制服中國的工業的發達，同時也可使歐美各國的勢力不能侵入。……就拿滿蒙做根據地，用商業做假面具，來侵吞中國四百餘洲，再拿滿蒙做司令部，奪得全中國的利益源，再拿中國的富源，來征服印度南洋羣島以及中小亞細亞歐洲等地方」。呀！有這樣強隣在側晝夜策劃，生於今日的中國人，還能夢想和平嗎！還能希望熙攘生產嗎！

最後討論中國能否對日一戰尙有一個重要問題應值吾人考慮者，即戰端開始後之共產黨處置問題是。關於此點，目前有二種看法，樂觀派者認爲共產黨亦係中國人，萬一對外戰爭發生，他們縱不能一致加入前線，最少亦不會在後方搗亂，而甘作喪心病狂之亡國奴，縱其中有少數不良份子，然亦不足懸爲大害，其理由有二，第一，他們所爭者爲權利，到無權可爭時，他們必放棄其所爭而加入共同

戰線，蓋日人萬一勝利而他們亦是不能立足，第二，他們究是中國人，在歐戰開始前，各國無產階級雖有聯合戰線以進攻其對象資本家之呼聲，迨戰事一發生，各國工人均爲其祖國爭光榮而奮鬥，民族觀念之超過階級觀念，史實昭然，中國不能獨外。悲觀論者則不然，以爲共產黨只知爭權奪利，毫無祖國之觀念，且趁中央對外用軍之際，正可遂其爲所欲爲之心，以中國目前計，惟有先消滅共產黨而後才能抗外，不然前後夾攻只有速其滅亡耳。兩派觀察固各有相當之理由，但以我個人觀之，所謂共產黨也者，亦不可一概而論，萬一對外戰爭發生時，欲全部共產黨員加入合作，當屬事實上所不可能，蓋中國人之中自不能希望全部均能以民族觀念動乎其中，而強其一致行動，不然中國應無漢奸之類矣，同時共產黨之中亦非全無深明大義之人，尤其在國家存亡關頭當非全部均不能以理論與事實而說其誠意歸服以謀協同對外也。是故共產黨問題要視吾人如何處置以爲斷，若徒以共產黨之處置而躊躇延擱對外之嚴重問題，則深非得計也。

三

次論抗戰及於中日兩國之影響以及國際局勢之變動如何。

在中國方面，因不堪欺凌與壓迫而出於抗戰，故其戰爭是爲爭民族生存而戰，是爲爭國家人格而戰，則戰爭的結果最少是可以激起民族之興奮與完成國家之統一。

現在中國民族之萎靡頹唐，已如上文所述，這種怠惰自私的習性，非給與一大刺戟則不易使其自改，在抗戰之中，各人爲圖自己生存計自不能不發憤振作。故戰爭一事對於民族也可說是一服興奮劑，萬一不幸戰敗而滅亡，則世界歷史上可留一頁光榮之紀錄，中國民族當遺留一篇光輝之教訓，而使後輩子孫可有再起之機會，過去兩度亡國而能復興者，其受惠於文天祥史可法諸先烈可歌可泣之抗戰史之刺戟者爲如何也。如徒知忍辱負重，退讓爲國，則民族精神祇有愈陷於銷沉而不復振，等到頭來，卽退讓亦未必能確保「苟存」。我們要明白如願決鬥而死者未必卽死，欲忍辱偷生者未必能生。至完成統一的問題，更易明白。蓋在抗戰之中彼此爲求生存計爲對付共同敵人計，自不能不力求親密的聯合以資應付。若專事屈服，其不願屈服者難免不單獨行動以伸其憤，斯時則易變爲內訌。故退讓則適足以召分裂之禍；實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至日本方面，如果戰事真正發生，當決無十全之利，否則，恐所得有不償所失。其海陸空軍目前之設備，固足以擊破中國而有餘，然中國軍隊若採用游擊的襲擊，亦能使日本軍隊疲于奔命，且以中國幅員之大，日本軍隊究能佔領至何種程度，充其量亦不過佔據大都市及附近之郊野耳，在交通極不方便之中國，此種佔領能否絕對控制，更屬問題之問題。大兵盡行調派至中國，日本國內秩序如何維持，其不滿意於政府者難免不乘機而動，韓國革命黨人，當乘此千載難逢之機會，發生獨立運動，東

四省因日本軍隊撤退至對俄邊疆或移入關內作戰，各地義勇軍勢必蠢起爲敵，其傀儡式之「偽滿洲國」，時時當有崩潰之虞。日本軍隊一面要攻擊中國同時復須維持各地秩序，豈止疲於奔命，恐將陷於絕境而不可收拾。

在經濟方面，究能如何維持，亦有一究之必要。日本國外貿易百分之五十五全賴消納於中國市場，但戰事發生，中國人民經濟生活當必破壞無遺，田園荒蕪不堪，除東四省外一般人民絕無購買力，何能消受日貨，可以說日本在戰時失去一個大市場。就原料而論，中國因土地失耕，農產減少，自然無力供給，其餘印度南洋英荷屬地，北美合衆國，加拿大及俄法等國，在今日已現出排斥日貨，追戰事開始，必定同情於中國而當出於經濟抵制，其他各國縱不經濟抵制，當亦不直日本之所爲。故中日戰爭，對日本實只有害而無利。日本最得意之傑作而樂於嘗試者，就是一聲「斷然的處置」不遺一矢一彈而輕輕盡括許多權利耳。如果中國人真正情願拚命，恐日人亦不願輕於一戰，日人過去之所以猖獗無忌者，特其看透中國人的骨髓不會有「拚個你死我活」之決心也。

戰後國際關係如何，上文已略述之，大部分利害關係較切之國家，對於日本之行動，殊存敵視，暗中援助中國，其餘各國或因利害關係，或爲正義所驅使，亦厭惡日本之行動。他們不獨因失去中國之廣大市場而怨恨日本，且他們亦不願日本獨吞中國，蓋日本之強盛即彼等之危險也。故戰爭開始一

年以後他們必公開對日宣戰或援助中國，容後詳論。

以上檢討中國能否與日本一戰一問題之各種理由，原來中國因受日本之壓迫，不得已而出於一戰，乃為爭國家與民族之人格而戰爭，固不必斤斤於利害得失之如何也。且看亞比西尼亞者不過一蕞爾小國也，其人口不過數百萬人，其文化猶在半開化之域，而為爭國家之自由，尙敢與鐵血宰相領導下之意大利一決雌雄，而有甯死不辱之氣概，亞皇向國會演說，謂「寧願隨國人戰死，而不願放棄自由」，（十九日亞京國民電），又亞王今日向路透社特別訪員發表談片，「切實聲明，及任何解決辦法，以亞國土地為他國之保護地或代管地，致損失亞國之獨立與主權及其人民之自由者，渠必拒絕之，渠信亞國理由正當，蓋亞政府始終努力和平解決也，但意國如對亞用兵，則亞人必堅決抵抗」二十日亞京路透電。又據交通部長馬文可斯談稱：「吾人雖無可誇示於人之新兵器，然有亞比西尼亞精神，試觀吾人四千餘年之光榮歷史，決無敗於意大利之理，若亞比西尼亞戰敗，則必亞國人全部為祖國死盡之時」云。這種慷慨激昂吞敵人之概，中國人見之能無愧煞欲死！

總之中國確能與日本一戰，最多不過是「同歸於盡」中國決不會因抗戰而單獨滅亡，日本決不會藉戰爭而能併吞中國，願國民靜待政府之決定可耳。

四

中國果不能與日本一戰乎

戰爭一開，日本首必調派大批海軍封鎖中國海口，斷絕中外之交通，阻塞軍火彈藥之進口，同時並用淺水兵艦駛入沿海及長江各都市，監視當地民衆之行動，以中國今日海軍之微弱，自不能與之對抗，只有任其佔領。至日本陸軍除經僑滿由長城各口入關外，在天津青島上海福州等地均一齊登陸，用重砲向我軍陣地轟擊，我軍當然與之還擊，除因戰略關係外，我方絕不退讓。依目前兩國陸軍之實力作比較，中國軍隊非不如人，特器械砲火不如人耳。職是之故，我國對日作戰，當採用游擊戰與持久戰。

游擊戰者，乃將兵力散開，山野埋伏，極力避免列陣相峙，對壘交鋒，俟隙而動，神出鬼沒，以奇兵出其不意而搗其虛，以伏兵攻其不備而塞其胆，使日軍應接不暇而疲於奔命。以寡敵衆以弱抗強者，惟此，這種戰略最爲有效，而且行之亦易，蓋軍隊散開，化整爲零，使對方兵力分散，攻擊困難也。至彼此之間應如何切實聯絡，以收包圍襲擊之效，當爲最緊要之問題，一般便衣民衆，應担任斥候情報之工作，使敵軍防之不勝，戒備無從。此種戰略，遠之如西班牙人之抗禦拿破崙，南非波亞人之抵抗英兵，近之如十數年前俄人在西北利亞之對付日本軍隊，近年共產軍在江西福建各地之對抗中央軍隊，均屬行之而使對面難以應付也。

持久戰者，即在戰局延長，一年二年三年拖延下去，忽戰忽停，不戰不和，務使敵人陷於困疲而

後已。在物質缺乏之國，利在速決戰，而在物質豐富之國，則利在持久戰。中國物質固不比日本豐富，但因人民生活簡單，既係迫不得已而應戰，自不能計較生活之方式如何，况戰時只有二種職業，兵與農是，不在前方打仗，就在後方耕田，同時一面打仗一面耕田，不去打戰就去耕田，槍桿放在田埂上，以這種方法與敵人相抗，試問日人能支持幾時？日人最懼持久戰，不然早已君臨中國矣！日本海軍少校石丸藤太云：「或謂日本將不懼持久戰，此非事實，因近代戰爭，原非如往時武士之格鬥，徒撐虛勢所能爲功。勝負之判，全賴實力之有無。第一，日本原爲不能自給之國家，不特戰爭所必要之材料，須依賴他國，卽日常生活之食糧，亦有時不能自給，經濟力蓋極貧弱。况值戰爭，四周被塞，自更無取足之途。加之中俄兩國，控制其間，時思報復，若戰爭持久，不特亦俄將乘機伸其魔手，卽英國亦有助美攻日之危機，且全世界亦將陷於莫大之混亂。於此，謂日本猶能堪持久戰者，實屬一種極謬誤之見解。」

例如：「日俄戰爭，其期間不過十二個月，而日本已疲於奔命，難乎爲繼。故希望早成和議者，與其謂出自俄國，毋寧謂出諸日本」。（見石丸藤太著，日美戰爭）

我軍既採用游擊戰與持久戰，故極力避免正面衝突，放棄海岸線，誘敵深入內地，避免在都市及其近傍戰爭，減少不必要之犧牲所有大都市任由日軍佔領，我軍保持郊外及鄉間，以分散日軍之兵力

，日軍人數究有限，自難充分發揮佔領之效力，且以中國幅員之廣大，恐日軍亦有鞭長莫及之憾矣。我軍既放棄海岸線與大都市，則政治中心將置何處？四川也，雲南也，新疆也，處處均可做臨時都城，我們既有破釜沉舟之決心，一切毫無問題。

然則戰時軍費如何籌措，殊值研究之問題，糧食就地徵發，軍民可為一體，前已論之，至軍械彈藥等等，當需現款購買，必須一面發行國內公債，銀行停止兌現，一面向海外華僑勸募，至不得已時徵集公私之貴重物品以售於外人而換購軍需物品，至對外之交通與軍火之進路，自屬不成問題，在國際關係複雜之中國，日本軍艦封鎖，勢不能絕對有效，戰時外國軍艦亦可駛入內河裝運子彈，其他如由新疆至俄國，由雲南至安南，日軍均無法防止也。

五

戰爭開始一年以後：

戰事發動之初，各國咸注視戰況之推移與探詢彼此對於戰事之態度及準備今後之出動，日本此際當藉多量之宣傳費與有力之宣傳機關，儘量信口雌黃，飾詞捏造，以冀各國之嚴守中立。然英美俄各國，無論為利害關係計，抑為正義人道計，屹不為此類片面之宣傳所動，惟亦不願立刻表示態度。至戰爭一年以後，各國鑒於中國人民堅決奮鬥之精神，憤慨日軍之蠻橫無理，以及彼等所受戰事之影響

與痛苦，彼等當陸續對日宣戰。茲分論之：

首先與日本宣戰者厥爲俄國，蓋日本之大陸政策，不獨中國受其害，俄國亦感其威脅。日俄兩國爲種種問題，糾葛迄無已時，近因九一八事變、日軍藉口僞滿治安，派兵駐紮俄僞邊界，而俄國爲防止日兵跳梁，大兵雲集貝加爾湖一帶，兩國戰爭，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同時兩國輿論界，相互攻訐，俄人之視日人，猶若眼中之釘，日人視俄爲戰敗者，頗有不值一顧之慨。故中日一旦開戰，俄國必定參加戰爭，一方出兵佔領庫頁島，進攻北海道，復由海參崴擾亂日本海，一方當由貝加爾湖，伊庫爾次克各地進兵東四省，佔領南滿鐵路，直搗旅順，取大連，轉戰韓國。俄國不但乘中日之戰以圖報讎雪恥，必將日人在大陸之勢力，根本剷除，以絕後顧之憂。

其次與日本宣戰者必爲美國。美日關係過去之葛藤，較俄日決不爲少，日本一切軍事政治經濟及教育之設施，無時無地而不以美國假想之敵國。兩國間衝突之最著者如移民問題，對中國政策問題。原來美國西部曠地，招致中國勞工前往開墾，後來日人暗中活躍，一再謔言，說中國人如何如何不好，建議由日本移民以代之，於是中國工人入境被阻，而日本移民乃突飛猛晉，一八九七年日人渡美人數尚不過一千五百人，十三年之間至一九〇〇年忽激增至一萬二千人，加州人民至是深懷恐懼，乃起而作排斥日本移民種種運動，日人因之深恨美國。至對中國問題，日人因美國主張門戶開放與保全中

國主權及領土之完整，致其大陸政策，受其牽掣，恨之尤爲切骨，其他日本乘俄國革命欲出兵西伯利亞以自肥，至痛恨美人之反對而失敗。

美國對日既宣戰，除用海軍進攻外，並用大批飛機轟炸首都之東京及重工業地之大阪。日本當占領菲列賓及進攻阿拉斯加等地，雙方各有勝負，彼此堅持不決。

最後老成持重之英國，鑒於環境之情勢亦不能不參加戰爭。先是屬領如加拿大，澳洲，印度等地深惡日本之蠻橫與恐畏日本之強盛，要求對日開戰，英本國尙躊躇不決，最後因英國南洋及中國各地商業，盡被日本遮斷，故不能不對日宣戰以事膺懲。

世人嘗以爲英日過去有二次同盟，故不致發生戰爭，其實國與國之關係，只有利害關係，而無人情關係，昨日之友，今日亦可成爲敵人，吾人若詳細考察英日本來之關係，知英日戰爭之發生，確有充分之可能性。九一八事變後英外相西門氏在議會中演說，指斥日本行動爲違反國際條約之行爲，而前首相喬治氏在一九三三年著文寄載哈斯特系美國各報上有如左一段：

「滿洲爲日本軍所席捲，使其與中國分離，而成爲日本統制下之傀儡國，此等日本軍之行動，其毫無友誼的性質者，由攻擊上海一事，足資證明。……一九三一年中日事件爆發之時，英美兩國如有堅決的決心，採取共同行動，無論何國均可以不捲入現時戰爭漩渦，而事件早已解決，惜乎時機去矣

。日本看透各國之躊躇逡巡，又看透各國不能干涉日本之行動，故其他一切之脅迫亦所不顧也」。

英日同盟，英國所得幾何，其徒助長日本之強盛者，英國焉有不知？故第二次同盟期滿後。日本人士雖渴望繼續不已，而英國則斷然廢止同盟條約，此不獨因英國朝野均不贊成，尤其自治領之加拿大更極力反對，蓋英人深知日本之強大，即屬英國之勁敵，故廢約後復建築新加坡港以制日本之跋扈，日人對於新加坡軍港之建築，常抱有非常之惡感。近年日貨侵入南洋印度及拿加大等地，英國尤為恐怖，乃加高關稅以資抵制，固此種種兩國關係日趨惡劣。故英國參加對日戰爭，當屬必然之事。

其他法國荷蘭意大利因在東方有利害關係，均次第加入戰爭，制裁強暴。

二年以後，日本在上述四面楚歌之下，既感對外應付之困難，而國內不滿政府者將發生革命，韓國企圖獨立，台灣生蕃暴動，滿洲傀儡倒坍。各國海陸空軍又呼應進攻，此時日本軍隊死傷殆盡，飛機全滅，炮艦擊沉，糧盡彈絕，國內壯丁因連年招募，大半死亡，產業衰落，糧食缺乏，終局只有乞和屈服矣。

兩年後之中國，土地大部喪失，戰時政府遷至成都，人民之死傷與物質之缺乏，正與日本相同，惟堅持到底，終不求和，繼因各國對日次第宣戰，日本陸軍勢不能不撤退佔領區域，我軍企圖反攻，

中國果不能與日本一戰乎

三二

節節勝利，不三月而全部失地收回矣。

六

中日戰罷，兩敗俱傷，日本固一敗塗地，中國亦瀕於絕境，物質精神，同歸於盡，惟第三者則坐收漁翁之利耳。是故中日兩國只有互助，才能共榮，以理衡之，無論以人種立場而言，抑以東方文化立場而言，兩國決不容許爾強我弱，互相攻擊，不幸事實則不然，吾輩又徒喚奈何。惟日本強國也，中國積弱也，懸崖勒馬，惟日本自決。

養成鬥士的精神建設新中國

二十四年四月載於
中國新論創刊號

一

我們怎樣纔能建設新中國？現在有許多人，都以為服膺中山先生的遺教，就應該從恢復我們固有的道德，知識，能力開始。但是最可惜的，他們只牢記住中山先生遺教的前半，遺忘或忽視了遺教的後半。這後半是什麼呢？中山先生很明顯的告訴我們說：「但是恢復了我們固有的道德智識和能力，在今日之世，仍未能進中國於世界第一等國的地位，如我們祖宗之當時，為世界之獨強的，恢復我一切國粹之後，還要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後才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如果不學外國的長處，我們仍要退

後。」（見民族主義第六講）

那麼，我們要怎樣去學外國，才能達到建設新中國的目的？中山先生接着又告訴我們說：「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後跟着他。譬如學科學，迎頭趕上去，便可以減少兩百年光陰，……如果能夠迎頭去學，十年之後，雖然不能超過外國，一定可以和他們並駕齊驅」。〔見同上〕

上面兩段文字，中山先生把建國的意見說得很明白而透澈，就是說：中國今日要恢復民族地位，建設新中國，不獨要恢復我們固有的道德和知能，而且要迎頭趕上去學外國的長處。換一句話說：處今日局勢之下，專靠祖宗所遺留下來的這點寶貝實不足以建設一個新中國。還得借外國的寶貝來補充。這是因為現代國家的機能是繁複多端，現代政府的職務是千頭萬緒，他除掉負責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之外，尚須增加人民的幸福，充實人民的生活，增進人民的自由，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而且繼續增高，有加無已。現代國家機能之複雜錯綜，和政府職務之千頭萬緒，既非我們祖宗的時代所能想像，故祖宗之遺物當不能視為建設新中國唯一的天經地義了。

專靠過去的文化仍不能建設一個新中國，其理由尚不止此；今日中國所處時代如何，今日世界所顯現的精神如何，我們務要認識清楚。能夠認識這一點，不但和立國有極大的關係，而且和建設新中國有極大的關係。應該認識清楚的是甚麼？就是「時代精神」（Zeit Geist）。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

的精神，合乎這個精神就能生存，違背這個精神就要滅亡。合乎這個精神，叫做時代化或現代化，而反乎這個精神，叫做時代錯誤或時代落伍。古人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如果用今日的目光來解釋，也就是這個道理，崇古的思想並不是壞的，但是同時也帶着相當的危險，「一代不如一代」的觀念是絕對要不得的。我們切不可爲古代的一切都是「金科玉律」，我們也切不可孔子不及周公，周公不及禹湯，禹湯又不及堯舜的觀念來衡量二十世紀進展不已的時代。今日的文化既由歷史的積聚而成，無古代自無今日，然而所謂古代者祇可作爲前車之鑒，不可準爲今日之法，譬如古人重德治，今人尚法治，古人崇尚生活節儉，今人要求生活豐富，過去標準之不能適用於今日者如此！過去的文化，已與現代人之實際生活，相去甚遠，這種文化如不能經過「現代化」的陶鎔，何能適合於建設新中國之需要，！現代人要接受西洋文化，現代女子喜歡穿高跟皮鞋，這不一定是現代人喜好奇異，也不定是現代人趨向墮落，至多不過等於晉唐人之佞佛茹素一樣，亦時代趨向所至也。

現代國家的機能與夫時代精神的影響，已如上文所述，故我們要建設一個新中國，當然需要許多的材料，凡是與建設新國家有用之物品，我們都要儘量的接受與攝取，然後這個新國家始有成功之可能，這正如江河不擇細流，才能成其大是一樣的。而要做到這一點，我們第一要有懇摯的態度；第二要的虛心的胸懷；第三要能包容接受與我們建國有益的材料的意思，我們固不必妄自菲薄，我們亦不

可妄自尊大。我們過去誠有崇高的文化，其質量且薄歐美過去所有者而上之，但是我們今日也毋須過度的誇耀，橫直歐美人士之稍具東方知識者都已經承認了的，因為過去的文化固於建國功效上的極大的價值，為我民族精神之所寄託，但我們若自誇過甚，反而易啓輕視他國文化之心，對於外來文化不願虛心坦懷去接受，其危險實有甚於點墨不染之白紙也。中國與日本幾乎同時接觸西洋文化，其結果則一拒一迎而其間之不同有如是者，斯則中國人自視過高而輕視西洋文化之故耳。不獨此也，時至今日，還有一部分頑固之徒，以為中國有了固有的文化，國家一定不會滅亡，假使一旦不幸而國家滅亡，也可以用固有的文化去同化他們，使民族復興，如昔之元清二朝被推倒一樣，如今日外國人到中國來也喜歡打麻雀一樣。語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但中國人只有己而不知有人。以致常常有人主張以大刀與外國人之槍砲相抗者。這真令人捧腹。老實言之，處今日的時代而不認識時代的趨勢，非糊塗即為不智。糊塗也好，不智也好，他們都不能肩負建設新中國的責任的。今日的時代精神是什麼？所謂現代化究竟怎樣化法？綜合言之，就是要一切積極化。分析言之，就是要「精神戰鬥化」，「生活充實化」，「智識科學化」，「民衆本位化」。申言之，要積極的養成戰鬥的精神，要充分的造成豐富的生活，要儘量的涵育科學化的態度。

二

何以養成戰鬥的精神？

中國民族，飽受儒教之禮讓爲國，老莊之無爲而治；釋迦牟尼之出世哲理；精神上已不能夠振作了。再加上四千年來之專制政治，有清二百餘年之奴化政策，愈使民族精神萎靡頹唐，無以復加，時至今日，麻木不仁，已達極點，雖一再遭遇着重大的刺戟，亦不過暫時表示反應而已！然不久依然故態復萌，仍舊沈淪於聲色貨利，好逸而惡勞，報仇雪恥，既無決心，迎頭抵抗，又無準備，致遭外人以五分鐘熱度之譏。我嘗論中國民族今日的情形是：「敵人來了就慌張，敵人去了又頹唐」。也許不止是我個人的觀察如此吧！

試看日人進攻東北之時，國民如何一致大聲疾呼，曰「禦侮救國」，曰「抗日圖存」，然不旋踵而應戰的聲浪就低下去了。迨敵人進攻上海，隨着又是一度狂呼，等敵人佔領熱河，跟着又是一頓猴跳，會幾何時，依然天下太平，優遊歲月，以度其苟延殘喘的一息了。中國民族精神的如何萎頓，觀此可就不難想見了。

我們應知人類的的生活是不能有一刻之停止的，我們的身體是時時刻刻生長的，由少及壯，由壯及老，生生不息，進展靡窮，等到停止活動之日，就是表示死去，我們的精神生活亦屬如是，世間凡百事物，亦莫不如是，所以我們不求進，則必退，我們一切生活，不問精神物質，不謀向前進展，勢必

往後退下，決無立在中間停擺不動之剎那。停擺不動，就是死去，如時鐘之振子一樣，一停擺動，時鐘立刻死去，計時功用馬上消滅。萬物動作停滯，萬物就要死去，民族精神停滯，民族就要滅亡，所以要以建設新中國，首須建設新民族精神。

我們要怎樣去建設新民族精神？民族精神的建設，要從心理上去做改造的功夫，第一，要將消極的心理變成積極的心理；第二，要將冷淡的情感變為狂熱的情感；第三，要將老成持重的態度變成勇猛精進的態度，換言之，新民族精神，更有積極的心理，如火的熱情與夫堅強的意志。但是要達到目的應該先改造消極的道德觀。消極的道德，也可以說是「奴隸道德」，其發源於專制政治之下，是為保持專制皇帝的龍位而特設的，其不能適用於建立民族國家之今世，尤不能適用於建立民族國家以與其他國家抗衡而圖生存的中國，上文已略言之。這種道德祇能養成一個歌功頌德的皇帝時代的順民，而不能養成一個奮鬥圖存的現代國家的國民，順民祇要有三跪九叩首的習慣，而「國民」必須具備「鬥士」的精神，故在今日以之亡國則有餘，藉之建國則不足。我們的主張是生的肯定，個人意志的肯定，自我權威的伸張，民族精神的發揚，具有富貴不能淫的意志。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強」雖不一定即是「善」，而「弱」確一定是「惡」。我們不要終日夢想和平，和平要用血與肉換來，和平才有價值，惟具有實力，始有真正和平。鐵與血是今日建國的基礎，戰與鬥是今後唯一的生路。我們要有

尼采超人的道德，成們要主張戰爭的道德，尼采（Nietzsche）謳歌戰爭，他說惟有戰爭能促人進步，惟有戰爭能使人生開一新生面，我說只有戰爭始能復興中國民族，只有戰爭始能救亡圖存。尼采的 Sarathustra 這樣的說：

「你務必尋求你的敵人，你務必與你的敵人抗戰，你務朝着你的思想抗戰。

你若要求和平，這是準備新戰爭的和平，與其求長時的和平不如求短時的和平。

我不勸你做事，只勸你戰爭，我不勸你和平，只勸你勝利，使你的事業變為戰爭，使你的和平變為勝利。

你說，願為善行而犧牲戰爭，我說，願為善戰而犧牲事物。

你應該選擇可厭的敵人，但決不可選擇可輕的敵人，你有很強的敵人，正可以自誇，那麼，你的敵人的成功也就是你的成功。」

殺死敵人固屬殘酷，被敵人殺死也就悽慘，我願意殺死敵人，我不願意被敵人殺死，在今日的世界，你不殺死敵人，敵人也會殺死你，討饒也無效，叩頭總不靈，不能戰死疆場，必定窒死俘獄。且看尼采論善惡之標準如何：

「善是甚麼？凡增進威力感，增進要威力的心都是善。人類所有的力，他自身就是善。惡是

甚麼？由於懦弱生出來的一切都是惡。幸福是甚麼？是增強威力之感，是戰勝抵抗之感，不是滿足之念而是更大的威力，不是和平而是戰鬥，不是德行而是能力。弱者與缺點多的人應該受苦的，當他們窘迫的時候，我們應該加重其窘迫，比罪惡更有害的是甚麼？就是對於弱者或缺點多的人的同情。」

我們要打破「奴隸道德」，我們要主張「積極道德」，惟有「積極道德」，始能建設民族精神，惟有建設民族精神，始能建設新中國。我們前進高唱復興之歌曰：

「民族精神，立國之本，精神建設，國家乃興！」

三

何以要充實物質的生活？

中國過去的道德，多屬消極的方面，樂天安命，知足不辱，不求有功，但求無過，都是古人教人立身處世的準則。至於物質生活，則崇尚節儉，以節儉也是立身處世之美德，不但認為儉可養廉，而且主張儉可永壽。薩孟武先生解釋古代的儉德說：「在中國，生產物的缺乏不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乃因貧窮的增加，而減少了消費力，致資本的原始蓄積，不能由封建經濟轉變為資本主義。貧窮日益增加，生產日益減少，於是在中國遂以節儉為一種最高道德原理，不但聖賢教人節儉，就是皇帝也以

節儉治天下。」（見薩著水滸傳與中國社會）。

薩先生這種見解誠然不錯；中國物產本不豐富，只可稱曰地大，不能號為物博，又因是農業國家，交通極不發達，有無未易相通，自不能不提倡節儉以資補救。然我個人觀察；中國過去之崇尚節儉，其理由並不僅此：蓋中國素以消極退讓為道德上的最高原則，以禁欲止念為做人涉世的無上道德，所以風氣所致，乃演成提倡節用，崇尚儉約，「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仍能不改其樂」；其所憂者為道而非為貧，情願「朝聞道，夕死可矣」，其所樂者為貧而又為道、故能「食毋求飽。居毋求安。」

這種怡然自得的精神，我們固不能不表示相當的敬佩，但這種道德的精神能適用於今日的社會生活麼？能夠適應於今日的時代精神嗎？

現在是一個生存競爭的時代，現在是一個欲望希求的時代。一切經濟行為皆以滿足欲望為出發點；因使滿足欲望，才有種種的社會活動，物質生活如是，精神生活亦如是。人類若無欲望的衝動，不飲不食，無知無識，六根清淨，四大皆空，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自無須要求經濟的活動，亦毋須要求至善至美的境界，但是我們要激發人類活動，我們必須先刺戟其次望而使增加，因欲望增加，而滿足欲望的活動始克增進。然後社會才能呈活潑的現象，社會生活才有長足的進步。故增

加欲望，實爲社會進步之源泉，固不能予以防止或禁止，視若洪水猛獸之爲害也。美國社會學者嘗云：「社會一切的活動，全是個人的活動，而個人的活動，又全是由個人欲望而產生，故可以說欲望是全社会活動力底原動力」。「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攘攘，皆爲利往」。惟其利來利往，則天下始有熙熙攘攘的活動的現象。

馬沙爾說明欲望與活動之關係有云：「人類的欲望，其數無窮，種類甚多，然一般則爲有限而能滿足的。原來非文明人的欲望不能比野獸的更多，但非文明人因隨着一步一步的進展，其必要的多樣性與滿足其必要的方法的多樣性也逐漸增大；於是他不但要求慣例上所消費的物量的增大，且要求其品質的優良，他要求物的選擇範圍的擴大，更要求滿足在這裏所發生的新欲望所需要之物。」（見 *A. Fried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以上所說，乃是經濟上的問題，其次從實際來講，今日專講節儉究有多大的用處？實不能無疑問，蓋要講求如何節儉，必先講求如何制止欲望，然處今日之世，交通頻繁，天涯咫尺，我們既不能閉關自守，焉有制欲的可能呢？實在說起來，在茲物質生產異常發達的世界，中國人的欲望，早已被海濤洋浪所激發而衝動起來了。爲今日着想，只有想法去滿足他們的欲望，才是我們自求生存的办法，也就是建國復興的正道，專講求節儉是無濟於事的。南京提倡節約救國，也曾高唱入雲，南京推行新

生活運動，也不能說不努力；但是要人請客，仍大用其魚翅燕窩，又何常節儉呢！依據海關進關報告二十二年份入超爲國幣七萬三千四百萬元，二十年份入超爲國幣四萬九千四百萬元，這種駭人聽聞的入超數目，專恃節用可以平衡得了麼？當然二十三年份的入超數量比二十二年減少二萬餘元，但是這樣的減少，乃出於農村破產和購買力的衰退，決非提倡儉約救國的結果。

節儉誠屬美德，浪費應該反對，這該是任何人所應承認的，尤其是在物質精神儘量浪費之今日，是一服很好的藥，是一種當頭棒喝，不過我們認爲救國建國除了節儉運動之外，應該採用積極的方法去促進人們欲望的滿足，不專以儉約爲治國平天下之方策，尤其要在「有」字上求節省，而不要在「無」字上求儉約也。經濟上以「收支適合」爲唯一的原则，然欲使收支適合，當不能專恃支出減少就算滿意，必須同時要將收入增加以求適合，二者固不可偏廢也。

其次，說到滿足欲望，物質是必要的條件，完全不依靠物質而能使欲望滿足者未之有也。別的不要說，即使要滿足道德上或倫理上的欲望，也得需要多少的物質。例如宗教上敬神禮拜，則基督教要造教堂，佛教要造寺院，而且禮拜，也得需要種種的用具。要滿足學問上的欲望，也得需要物質，如研究學問，則需要書籍，試驗室，及其他應用的材料，完全離開物質，則真理之探討固無從下手，即普通的智識，也求不到，中國人過去輕視物質生活而恥談生產，衣履不全而猶自鳴清高，對於「利」

字，絕對避開。所謂「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謂「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足謂「正其誼不計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梁任公先生說：過去中國人不知有「權利」的觀念（見先秦政治思想史一四四—四八頁）。今日若如果也不講權利，爲人斯誠善矣，爲國民則未能盡其應盡之義務也，這種觀念，祇能養成一個好人，絕不能造成一個好國民，是故我們今日應絕對拋開這種觀念，不要以重視物質爲可恥；其實維持並充實生活之物質，我人不獨必須經營，亦且有要求之權利也。

物質生活有用之物曰「財」，精神生活有益之道曰「善」，此二字在西洋用語全係一字，並無分歧；英語曰 Good 德語曰 Gut，法語曰 Bien，意語曰 Bene，蓋不論財與善，均屬增進人類生活而使其向上發展者也。

經濟上之財與倫理上之善，終局應彼此一致，否則無論國家社會或個人均不得繁榮。不顧社會公德而擁巨萬財富的人，往往不能永續，社會上真正致力於德業的人，在經濟上積聚相當富財，亦爲正當，善財一致，始能真正求久促進人生之進步。其實善與財本可一致，爲富不一定不仁，爲仁亦不一定不富。

人們既不能離開物質生活，故爲謀生活物質之增加，以促進人民生活內容之豐富，實爲必要之圖

。中國今日物質生活之缺乏，達於極點，衣食住行，多仰給他人供給，甚至連維持生命必需之食糧，每年大宗由外國入口。不獨戰時供給堪虞，即平時因入超過甚，國家亦將破產，倘一旦白銀盡流之於外洋，紙幣將等於廢紙，彼時雖欲通貨膨脹。亦屬無濟於事。故爲今日着想，應盡量增加生活之物質，物質的建設就是文化的建設，也就是新中國的建設。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就是這種意義。肚子不飽，不能作工，苦工固屬如此，文人也是如此，和尚也要吃飯，道士也要穿衣，故衣履不全，肚子不飽，也是不能創造精神文化的。

四

何以要具有科學化的態度？

然則如何可以增加生活之物質，則惟有出於提倡科學的知識，儘量接受西洋文化之一途。毋庸諱言的說一句：今日一切生活，是以西洋人之生活爲中心的世界，我們固有的文化乃至生活，在今日實已很難維持，我們也無竭其全力去維持他的必要。因爲如果他健全而有益的，則其自身必具有維持與保存之力量，在最近的將來，我相信中國是不會採用吃西餐的，也不會脫去長袍馬褂而改穿西服的。所謂適者生存，這是千古不易之定理。所以我們今日最重要的事，還是在如何實現現代的生活，而要達到這種現代生活，我們必須具有製造這種生活的物質，我們必須具有造出這種物質的技能與本領

；這些物質是用西洋方法造出來的，我們亦必須用西洋方法去造，我們要具有製造的技能，我們必須儘量學習西洋人的方法，故儘量接受西洋文化是不可避免的事，而且亦無須避免。再進一步論之，今日接受西洋文化而能爲己利用者才能生存，不然便要召滅亡之禍。

實在說起來，文化不論東西洋，凡與我之國計民生有益者，我們都應儘量接受以爲己用，不必輕視他，亦不必畏懼他，西洋公共道德好，我們固應採用，日本武士道精神優，我們亦應該效法。反面講起來，西洋日本對於中國文化亦應有同樣的態度。西洋文化，不僅物質方面爲優，其精神文化亦有獨到之處，不可輕視，同時亦不必怕他。跳舞燙髮不一定給社會有多大的危害，上海跳舞場之奇形怪狀，這並不是跳舞本身之害，乃中國人用之而不得其道耳。中國社會崩潰，道德墮落，許多在外國有益的制度，一到中國來就變了形狀，馬上成爲國家與社會之累，此豈其制度本身之過歟？平心而論，和女人跳舞之害，不見得比中國人之狂嫖濫賭更烈。我嘗聞上海知識份子之公餘時間，多消耗於妓院娼寮，他們一出辦公室或寫字間，便溜烟跑到妓女堂子的窩裏去，食於斯，寢於斯，此又豈跳舞之可比擬哉！南京禁娼而又禁舞，私娼依然盛行，這又是何故？我既不會舞，亦不提倡跳舞，我之所以爲此言者，因爲國人往往見到某種外國制度到中國以後的不良結果，就立刻唾罵這種外國制度不良，進而批評外國其餘一切不好，其爲無識歟？抑爲故意歟？我總認爲是建設新中國的大障礙。

接受西洋文化，我們要有二個態度，第一要虛心，不要主觀過甚，不要偏見太深；主觀過甚則不易接受，偏見太深則接受而不能澈底，中國人常以為中國道德厚重，西洋道德浮薄，於是認為家族主義優於個人主義，家庭共產制勝於夫妻分產制，其實這都是陷於主觀的成見。以制度之本身而論，兩種制度都各有各的是處，苦以建設現代國家而論，則西美之道德制度實遠勝於中國，這不是中國道德或制度之不良，乃是他不適用於今日的時代。現代國家是用西洋方法造出來的，我們現在既無高明的方法可以造出特殊的國家，祇有學西洋的方法去建設一個現代國家以與西洋抗衡，故「總理要迎頭趕上去以學歐美之所長者，職是故也。偏見太甚，所學不過皮毛，「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醫治內，西醫療外」，這都是中國人的大徧見。有了這樣的徧見，其所學者決不會為中國之用；跳舞到中國後成為淫亂之媒介，也就是這個緣故。第二要大胆，毋懼毋怯。在初學之時，毋懼功夫要浪費，毋怯所學含危險。要學西洋的長處，自不免有多少之浪費；譬如中國人要費相當的時間去學習外國語，就是明瞭外國的知識，勢不能不花費相當的時間，先去明瞭他們表現知識的工具。又在學習之先，不要胆怯，不要怕危險。假定所學到的知識也許有時有損而無益，亦屬平常之事，不要看做罪大惡極，甚至至有亡國滅種之虞；不要心灰氣餒，仍須努力去學，猶如小孩子初試行步之時，跌倒了要爬起來再走。同時要樣樣嘗試，不要怕不能消化而生出胃病，猶之如我們吃東西一樣，不要天天怕生胃病而不敢

吃東西。在學習西洋文化的初期，不可過於謹慎，不必選擇太苛，必須儘量容納，經過胃囊的消化，然後方能去糟而取精，捨短而選長。故在這個時候，思想界之現出混亂現象，社會之逸出正態常軌。實屬不能避免，也許是應有的現象，毋怯毋慌，虛心坦懷，這是我學西洋的長處應有的態度，「學然後知不足」，愈學愈感不足，愈感不足愈須力學，能迎頭趕上去，然後才能建設新中國。若夜郎自大，徒自矜誇，不但學不到他們的長處，連他人的皮毛也學不到，遑論迎頭趕上去？更遑論建設現代國家？

「獨創文化」，因為吾人的素願，然今日所創的文化，必須為現代式的文化，必須具有現代性，這就是說要用現代知識與現代方法所造出來文化，關於現代知識，中國今日甚為缺乏。其禍為患之烈，令人聞之咋舌，而真能瞭解馬克思主義精髓之人，尚不多見，或許絕無而僅有，中國的共產黨，充其量亦不過是與兵作亂的黃巢李闖之流耳。所以說中國今日還是一個介紹的時代。讀書的時代，批評的時代，距離獨創文化之期尚遠；理論可以飛躍，事實必須步步實踐。佛教入華六百年之後，中國人之創造文化之宋儒理學才能實現，故為今日求建設着想，應儘量介紹西洋知識以為己用，追歐美之長處學到手了，則創造的文化當會自然而然的出現了。

總之，學習西洋法寶之時，自有許多怪現象發生，也許有時因不消化而生胃病，但這點苦痛我們應該忍受，不可大驚小怪，祇要時學時醫，時習時矯，病者治之，編者正之，則怪現象當會自生自滅。

，胃病亦可占勿藥之喜，決不致若大禍臨頭，或將亡國滅種。若這樣優遊歲月，糊塗了事，以大刀就可抵抗大炮之態度，豈祇亡國，將復滅種，又豈是吾人之故作危言耶！

五

何以要一切民衆本位化？

「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原是我們祖宗所昭示的理想建國原則，可是這個信條，雖經過了四千餘年的政治遞嬗，始終未能做到理想標準，這就是爲「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兩句「馬基維利主義」(Machiavellism)所誤了。誠然有幾個皇帝如漢文帝之流，對於民生疾苦，念念在茲，時時以民爲重，然其保民育民之觀念，乃是以彼此治者應該保護統治者的心理，仍不出於慈母愛子的心腸，不是想把每個國民造成爲一個獨立的分子。不是想把每個國民造成爲全體的一個健全的細胞，所以古代政治方式都是要想養成一個順民，不是要他愛國，而是要他忠君。然而現代國家觀念則不同，尤其是在民族國家，國以民集，民爲國基。換句話講，人民就是國家的中心，人民就是主人翁，其統治者不問是君主或大總統，其國家之構成分子，總是以人民爲中心，不是先有君而後有臣。故其國家一切建設，不論政治經濟，或教育與軍事，無不以人民爲本位，譬如在政治方面，設立各級的民意機關，使人民均得有自由發表意見之機會；在經濟上施行社會政策，保護勞工，以救濟經濟上之弱者爲目標；

教育則施行義務教育，強迫人人入學；軍事上則樹立徵兵制度，使人人負起衛國禦侮的責任。總之，一切的一切，就是要把個個人都要造成爲獨立健全的分子，要把個個人都使其能擔負國家的責任，君主在政治制度上，僅不過是國家機關之一部耳。總理爲順應世界的潮流縮短國內的戰爭，要把四萬萬人都造成爲皇帝者，就是這個緣故。

現代國家既以民衆爲本位，個個人都都是構成國家的成員，所以我們今後一切設施，要處處以民衆爲本位着想，要把個個人都造成名符其實的現代國民，這第一是要改變過去傳統的「家天下」的觀念，而代之以「天下爲公」的觀念。過去一切的一切，都是含着家天下的成素，皇帝是把人民當做自己奴才；官吏要把所屬職員做自已下屬；父母是要把兒子當做自己家產的一部份；其他一切社會制度都由這個思想蛻化而來，與路易十四世的「朕即國家」(I am the State)同一路徑。這種觀念一直傳到如今，我們雖已革命至二十四年，但此種觀念依然根深蒂固的留着大衆的腦海，在這種觀念之下是不會造成一個「現代國家」的。換句話講，這種形態演繹下去，是無法與列強對抗的，軍隊若祇認得自己的長官，而不明白他是國家的的捍衛者，那是無法戰勝敵人，祇知爲他的長官而與其他軍隊的火併的。我們今後要以國家爲中心，人民是國家的國民，兵士是國家的守衛人，官吏是國家的辦事人，至於國家一切的建設，不論物質或精神的方面，均要以民衆爲其本位，凡與民衆有利的，則盡力舉辦，

與民衆有損的，則停止不辦。且時時要此養成個個人都有國家觀念，時時要以養成個個人都是國家鬥士的衆念。

總之，我們是要把個個中國人都養成積極戰鬥的精神，迎頭趕上去學外國的長處，充實物質與精神的生活，由老大中國造成爲現代的新中國。

進 步 與 鬥 爭

在沒有社會或政府以前的「原始狀態」（亦稱之爲自然狀態），究竟是戰爭的還是和平的，各人的說法不同。霍布斯（Hobbes）說原始狀態是戰爭的狀態，就是「人人對人的戰爭」（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這種戰爭狀態有三個主要原因：第一、人人爭取滿足同樣慾望的事物；第二、人人恐怖他人的權力超過自己；第三、人人希望他人的崇拜，希望被尊爲人上之人（見 Leviathan Chap. 13 朱敏章譯利維坦七九頁），蒲芬獨夫（Puffendorf）的見解也屬於這一類。洛克（Locke）則不承認原始狀態是爭奪不息的。他說：「在自然狀態中，人類不是像禽獸一樣自相殘殺，和平與理智充滿了大地，那不是個沒有法律的世界，那裏有一部所謂「自然法」來支配人類的行爲。這種法律，是以理智爲解釋者。在這種法律之下，人類是自由平等的，但是人們智識有高下，利害有衝突，所以就是

在最想服從自然法的人們間，總不免發生爭議，所以要組織政府來維持和平，保障各人的權利」(見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洛克以前的格勞修斯(Grotius)與其後的盧梭(Rousseau)，均持同樣的見解。

霍洛諸氏提出所謂原始狀態者，乃是要說明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的構成，說明政治社會的創立，而以原始狀態為前提者也。社會契約是否事實，政治社會是否由社會契約而創設，伯倫智理(Bluntschli)及梅因(Maine)諸人均有批評，其非歷史上之事實，則係一致所公認之結論。我們今天不是要說明社會或國家之起原如何，固不必費辭贅論，但人類在未組成社會以前，確有一個洪荒的時代存在，俗語叫做開天闢地的時代，這個時候縱不如霍布斯說的「人人攻擊人人，人人是人人之仇敵」但也決不是和平無事的安樂鄉，最少像洛克所說的總不免發生爭議，人類生活常引起不安的現象，所以必需有一種人人共曉的確定的法律，然後方能保障各人的權利。由此可知原始狀態決不是一個世外桃源；這個時候是互相凶殺，最少是互相鬥爭，而人類是在這鬥爭之中殺出一條血路出來以求維持自己的生存，繁殖自己的種類。這個時候人類用以為鬥爭之具者是靠着各人自己的氣力與少數的器具，以及團體的結合。今日的社會，熙來攘往，應接周旋，好像是天下太平，彼此相安無事，然此不過其表面也，僅係一時也，而社會內部仍是互相爭鬥，惟易其腕力的爭鬥而代以智力的爭鬥耳，至國與

國之戰爭，部落與部落間之衝突，更屬常見之事也。中山先生說明社會之進化，爲人類鬥爭之結果，而劃分爲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沒有歷史以前的洪荒時期，這個時期，是人與獸相爭的時代，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第三個時期與第四個時期是人同人爭，他又說：「人類要能夠生存，就須有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和養兩件大事，是人類天天要做的，保就是自衛，無論是個人或團體或國家，要有自衛的能力，才能夠生存，養就是覓食，這自衛和覓食；便是人類維持生存的兩件大事，但是人類要維持生存，他項動物也要維持生存，人類要自衛，他項動物也要自衛，人類要覓食，他項動物也要覓食，所以人類的保養和動物的保養衝突，便發生競爭，人類要在競爭中求生存，便要奮鬥，所以奮鬥這一件事，是自有人類以來天天不息的」。

「生活者，戰爭也」，人類社會只要有一天存在，則人類爲求生存而鬥爭，自不能免。哥拉斯瓦柯納有云：競爭者自然之根本法也，凡社會內之一切財產，一切思想，一切發明，一切習慣，與夫社會之組織，無一非社會內部競爭之結果也，於是而優勝劣敗之形成焉，而社會外部之競爭，即國民與國民間，民族與民族間之競爭，斯爲戰爭。社會內部之競爭：爲人生日常所必經，思想感情希望學問及其他種種競爭是也；社會外部之競爭：訴之於國民間之鐵血，戰爭是也。勝負之機，生滅之途，於以判焉。由是觀之，競爭實爲一切事物之創世主，足以培有益而覆無益者也（見哥拉斯瓦柯納著創造

原則之競爭)。

優勝劣敗，適者生存，天然淘汰，久垂定則，自然界之生存競爭，乃是一切健全發達之源泉，凡生存於此世之事物，無一非競爭結果之表示，人類之生活，亦以競爭爲生之大法，是故今日遺存的人類，都是從這幾萬千年的生存競爭當中經過無數次的爭鬥與流血而遺留下來的，可以說今日存在的人們都是優者勝者，決不像西人所自誇的僅僅 *White Supremacy*，只有他們才是優秀者，惟今後之孰存孰亡，誰勝誰敗，要視在這生存競爭之波濤巨浪中孰能盡其最大之努力與奮鬥耳，惟能奮鬥者得生存，惟能盡其最大奮鬥者佔優勝，不然一定滅亡，一定退歸劣敗之地位，此自然之理，進化論所明明告訴吾人者也，天數難逃，無可避免。

人定勝天，世間一切事物都可以用人力去改造的，宇宙的神祕，已經被我們望遠鏡顯微鏡等等照穿了，大自然的威力，已經爲人類的科學武器所征服了，風火水雷都不過是自然界的現象，不是甚麼造物主特意創造出來，地球是圓而會轉會動，不是甚麼天圓地方，物體下墜，因爲地球有引力之故，就是人類亦不過是哺乳動物的一種，和猿類出於一個共同的祖先，並沒有什麼了不得的神祕蘊藏在內，亦不是什麼「萬物之靈」。飛機可以升天，潛艇可以入海，人工可以受胎，雌雄可以改變，宇宙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經過研究而促其改良與進步，世間絕沒有個已經毫無改良餘地的絕對完全存在。即

人類的大腦，因其比較其他動物爲發達，故人的知力最爲進步，但決不是已授進化到極點，發達至無可發達的地步了，達爾文說在自然界裏不過以「和競爭的對手相等，或比他稍高一籌」爲完全的標準而已！

「知難行易」我們要努力求知，研求真理，實地考察，就物實驗，然後才能征服自然，自然才能供吾人所利用，「自然對於袖手不動的人決不白送知識」，坐到沙發上幻想是沒有用處，垂頭喪氣，怨天尤人也毫無實益，跳海投江僅不過供報紙上一日之喧傳材料而已。隨着世運的進行，人類的生存競爭只有一天一天的越加劇烈，世路一步一步的更加險峻，徒抱厭世或悲觀則不能突破這個空前的難關，據研究所得，像一般自殺之徒，其直接近因或如報紙上所載之精神錯亂，家庭不和，戀愛失敗，生計困難，種種各有不同；然而更進一步追尋他的遠因，個個都是由於生存競爭上「適者繁榮，不適者沒有生存餘地」的緣故。飛機也，大炮也，今日歐洲各國國力之強盛，不是憑空的一步登天，都是他們國民腳踏實地費盡心血造成的；電光也，石火也，今日物質文明之進步與發達，直使人望之頭昏目眩，然這也是由於他們苦心鑽究積多年之知識與經驗而始克有成，試觀初步機械之單簡與今日構成之複雜即可知也。一國之強盛與一個民族之興隆，固然需要許多條件，如人民之身體要健壯，意志要強固，道德要端正，而又要勇氣百倍，尤要富於協力一致之精神與有舉國赴敵之覺悟。然而今日實際上

是甚麼國家最得勢呢？確乎是那文明的新知識最爲進步之國家，縱其他一切一切是彼此平等，獨文明的新知識一步占先的國家，今後在競爭場裏勝利必然較多。今日的戰爭，完全是智力戰爭，是知識與知識戰爭，其法實是靠着「科學」與「思考」，肉搏之事實屬絕無而僅有，但也決不會獲着終局的勝利，一二八淞滬之戰，中國之所以敗者，非中國將士之不勇，實由於砲火之不精，且看蘊藻浜一帶之戰地，中國軍隊陣營方面之障礙物如房屋圍牆等等，均被日軍砲火轟滅淨盡，至日本軍隊方面之障礙物，則炸燬不多者卽爲明證。所以無論那一個民族，要圖將來的發展，只有在這知識教育科學訓練上面特別用功夫。說到此地，中國人真要慚愧萬分，中國施行科學教育者數十年矣，而國內依然有人以爲大刀可以抵抗槍砲，有人還相信那肺屬金牌屬土的醫學，香爐灰可以治萬病，茅山道士能捉妖精，諸如此類，充滿大地！而報紙雜誌上所登載的廣告，不是甚麼丸散膏丹一流的狗皮膏藥，就是香烟一類的包包有彩，而且這些東西亦多是外國人所製造的。還有甚麼時輪金剛法會，律師法律顧問乃至看相算命等等胡說八道，滿紙荒唐，比起外國報紙的廣告，如汽車汽船之販賣，煤電的發動機，瓶裝的液體空氣之出售，石英熔化的玻璃器，鑪錠之出租，新發明新考案，爭奇鬥勝，五花八門，文明新知識之進步，一日千里，則真有天壤之差矣。嗚呼，中國人！你將往那裏去！

再以我國對外貿易而論，中國輸出的產物盡屬原料一類的東西，如絲、茶、棉、麻、桐油、菜子

之類，而外國輸入的物品，都是機械或由機械所製出來的工藝品。絲茶棉麻之屬，都是天然的產物，天生下來就是這樣，並沒有加過多少人類的智力在上面；而機械與工藝品均是匠心獨運的製造出來，均是經過人的思考，心血而變換出來，於此可見中國人與外國人奮鬥與研究之程度，中國人真是叫做「靠天吃飯」矣。中國人也歡喜坐汽車，然而爲甚麼不想法去研究汽車與製造汽車呢！我們要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飯，靠祖宗積留的遺產度日不是好漢，同此理由，自己不想法研究，不努力製造，專門享受他人努力結晶的製成品，其可恥也孰甚。今日的中國人，好像一個敗家子，專恃祖宗餘蔭，他人的血汗，而坐吃現成飯的。俗語說得好，「坐吃山也空」，經濟學上稱土地之收穫，有一個遞減的法則，名曰「收穫遞減律」(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亦稱「報酬或收益遞減律」，據李嘉圖(Ricardo)馬沙爾(Marshall)諸氏的說明，謂「在一定狀態下使用於土地耕作的資本和勞動的增加，同時如果農業技術沒有改良，則在大體上生產的增加是在比例以下的」。中國的農產物，年來逐漸減少，連米麥食糧也要由外國輸入，此雖有天災兵燹等等的其他原因在內，但中國人的農耕，不知改良技術，不知應用科學，守死老法，一成不變，是其原因中之一最大原因，試看中國今日養蠶與農耕的方法，與五十年以前的有沒有絲毫的改變？孔子曰：「好古敏以求之者」，聖人之徒，爲甚只知好古，而不知敏求呢！爲甚麼只喜奉行祖宗大法而不講求新的創造呢？近年外國對於中國之產物，研究裁

培不遺餘力，美國對於桐子之栽植，已試驗成功，據說二十年後中國桐油之出口，將與今日之絲茶一樣縮減減少矣。中國市場上消耗的美國橘子，據說其種子原出於中國之湖北省某地方，由一位美國傳教師攜至美國逐漸改良以變成現在的樣子，而中國原地方的橘子仍與從前一樣形小味劣，「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本是中國的格言，爲甚麼中國人只會藍而不會青呢？這種橘子近年在日本已栽培成功，惟其個體不如美國之碩大，中國市場上所售的劣貨都是日本輸入的。嗚呼中國人，今後如仍昏瞶糊塗，不再急起直追，努力改良，則惟一維持國民生命而平衡進口之農產物將亦不可恃矣。

總之，人類社會有一日存在，換言之，人類活着一天，總免不了那種「奮鬥」，「競爭」，「鬥爭」，「戰爭」，真正與敵人砲火相交短兵相接的實際打仗，固然不是常常會有的。和平戰爭最有力的武器，就是文明新知識的應用，科學的發明，故今日唯一建國之道，只有學歐美人之長處——科學，儘量接受西洋之文化——新知識。要具有以錢當雞蛋之研究精神，實地考察就實物實驗之客觀態度，不要鄙棄物質文明，不要過視古代大法，凡看不起物質文明之人，最少是自己不應該點電燈，打電話的。大自然之美，也需要相當的人工來點綴，童山秃嶺不會現出燦爛的美景，必需具有茂林修竹才能表現出峯巒巔翠的色，西子湖穿上了西裝，正可表帶着現代精神的大自然之美了。惟研究自然，征服自然，不能要虛心平氣，而且要有相當的忍耐，尼采說：「要達到認識，途中不能不忍許多恥，否

則認識的興味也就極其少了」。

競爭既爲人類生活之大法，惟有競爭才能促進人類進步，已如上文所述，社會外部之競爭，就是戰爭，故戰爭又實爲生存競爭所必需，我們對於戰爭，不必恐懼，亦毋庸畏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人家殺進門來，恐懼畏怯是無用的。先哲對於戰爭有許多啓發，茲特揭示數則以助吾人之奮發。梅因嘗謂「有益之私戰，可藉適者生存之定律，使人努力超乎並永居他人之上」，斯賓塞 (H. Spencer) 亦同此論調，伯恩哈迪 (Bernhardi) 以行使武力實本乎社會天性，爭鬥使適者生存，實係自然之律，他說：「強權即是公理，如於何者爲公理發生爭執，則可藉戰爭解決之，戰爭能予生理上之公正判決，蓋其判決乃根據物之天性也」，戰爭爲生理所最需要，渴望和平，則反爲生活要義之敵，爭鬥爲普遍的自然律，而引起爭鬥之「自保生存」本性，亦係生存之自然條件，故他說「世間第一定律，即個人獨立生存之維持」，並由此以征伐權爲人類正當之權利。

我們並不鼓吹戰爭，亦不夢想和平，蓋戰爭足以破壞殖產興業，阻礙和平之經濟發達，而陷人類於流離悲慘之境地者，無人敢予絕對否認，故苟能減少戰爭之危險，緩和戰爭之痛苦於一定限度以內，我們亦認爲正當而無異辭。但是我們同時亦不要忘記了戰爭亦可促進人類社會之進步，而要時時刻刻有準備戰爭之意念，國與國之間，固有平和競爭之道，然一旦彼此利害衝突，則戰機之迫來，實無

法可以避免，人類各有向上之感情，而各努力擴張其活動之範圍，則利害之衝突，亦勢之所不可止矣。一、二八淞滬之役，在爆發之當日，我國已有讓步之表示，而日本仍不停止其進攻者，此其明證，中國縱極力避免戰爭，奈日本已萬事準備妥當而不欲中止其屠殺也何！一切交涉中國今日雖處處表示讓步，而日本又何嘗停止其壓迫進攻之行爲，日本人一見到中國人就說到中國排日，或抵制日貨，其實中國早已停止抵抗日貨，日人又何嘗不知，特其故意舉爲口實而以之壓迫中國人耳，由此可知戰爭決不是單獨可以避免的，而和平亦不是弱國可以希求的。是故在和平的時候防着戰爭。準備戰爭，正如農人在豐收之時積穀防飢一樣的重要，俗言有云，有錢常想無錢時，莫到無錢想有錢，正同此意。設國家不圖發展其國力，以戰爭爲大戒，貪安好逸，絕無雄圖，其國民必隨之而萎靡而疲弱，則其國亦必至於滅亡，可斷言也。

鬥爭之於進步，不獨在生活上如此，即在思想界亦然。思想界要有鬥爭，思想方能進步，學者要彼此辨論疑難，學問才能發達，我國古代哲學之發達，就是這個緣故，孔孟與老莊對抗，楊朱與墨翟相峙，而思想之黃金時代出現，至後世而定一尊，以孔子爲大成至聖的先師，以孔子之道爲萬世不易之法，其結果孔子之道亦不過爲專制皇帝之護身符矣。胡適有云：「哲學的發達全靠異端羣起，百川競流，一到了「別黑白而定一尊」的時候，一家專制，罷黜百家；名爲「尊」這一家，其實這一家少

了四圍的敵手與批評家，就如同刀子少了磨刀石，不久就要誘了！故我說中國古代哲學滅亡的有三個原因，就是荀子韓非李斯一系列的專制的「一尊主義」（見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西洋思想史有一個黑暗時代，當時教權極盛，羅馬教王利用教權威臨世界，不論教育文藝，均隸屬於教會之下，一切學問，係證明教義而存在，對於教條教義，不能批評，故真正之學問則不能發達，故稱思想黑暗時代。學問要互相辯難，彼此批評，學問始有進步，真理才能出現，故近代哲學注重「批判哲學」。近代文明國家對於輿論採取自由主義者，也是這個緣故，使國民對於政府設施，政治問題各人儘量批評，以監督政府之處置，以完成國民之責任，政府因畏輿論之指責而先自檢點，人民因鑒輿論之寶貴而發言謹慎，政府與人民互相監督，交相抗衡，而政治進步矣。

由以上種種論點觀之，鬥爭之促成進步，信不誣矣，國人不可貪安好逸而不言奮鬥，不可夢想和平而不談戰爭，尤不可怵於共產黨之鼓吹階級「爭鬥」而連爭鬥二字亦不敢宣之於口筆之於書，「鬥爭爲進步之動力，科學爲鬥爭之工具」吾人今後應向此鵠的而邁進矣。

日帝國主義侵略東省之經濟政策

二十一年一月載日本評論
三日刊第十九期第二十期

居資本主義之世界，凡百事業皆非金錢莫辦，以東省土地之廣，資源之富，多在未開發狀態者，尤有雄厚資本之必要，無論交通耕作工業商業，皆如是也。日人自結東省不平等條約以後，着着進行，不遺餘力，反客為主，處處逼人，茲略述其概況：

A 金融

一 銀行

東省日本方面之銀行，其重要者共有十七間，最初出動者爲正金銀行。自一八九九年於營口設立支店開始營業，至今已三十年之歷史，現有支店出張所八處。當日俄戰後，日政府因欲收回戰爭中濫發之軍用票，乃令該行發行銀貨紙幣，視爲法定貨幣，使在東省及關東州一帶有強制通用力，強迫國人使用，此今日銀票之由來也。及至一九〇七年日本在關東州施行金本位制，滿鐵一切收支及運費計算概改用金幣。因是正金又於一九一三年除原發之銀票外，復發行以金貨爲兌換基準之金紙幣，世人稱之曰老頭兒票，從此正金銀行遂爲日人金融侵略之中樞機關矣。他方朝鮮銀行復于一九〇九年設支店于安東，厥後漸次進展，迄今支店及出張所數達十一，至一九一七年日政府鑒於當下自己競爭之不利，變更侵略方針，採用分工並進，乃將正金之金票發行權及國庫事務移歸朝鮮辦理，而以

正金專司匯兌，至此日人侵略東省之中樞金融機關乃由正金而移至朝鮮銀行也。此外更有東洋拓植株式會社，於一九一七年侵入東省，初在瀋陽及大連設立支店，次及于哈爾濱，專以經營不動產為主，近年其放款金額已達七千萬圓，而借出之主要方面，為建築或購買家屋，改良土地，農業牧畜，棉花栽培，森林採伐，及經營果樹園鑛業等等資金。至民營銀行於一九〇六年則有正隆銀行之設立，名為中日合辦，其實中國人並沒有什麼資本，一切行政亦全操諸日人之手。及發行銀票及金票，以吮吸國人之膏血，歷年發展，其支店瀰漫於東省，為民營中最有勢力之銀行，其次則有滿洲銀行，係于一九二三年創建，勢力約與正隆相等，其他有大連商業銀行，長春實業銀行，南滿銀行，滿州銀行，等十五行，相繼設立，勢如洪水猛獸，簡直無孔不入。

以上將東省日本金融機關之起源及經過約略說明，其事業之目標，今日則以朝鮮銀行為中心，司理國庫（日本）及發行金紙幣。正金辦理匯兌，兼發銀票，東拓經營不動產，成為鼎足之勢，而民營銀行如正隆等則經營商業資本之流通焉。坐是以觀，其規模之巨，分界之明，並轡齊進，各不相侵，而我國東省經濟命脈的金融遂被日人席捲以去矣。現在將主要銀行之放款，列表如右，以比較其發展狀態，單位為日本金類。

銀 行

一九一八年

一九二六年

朝鮮銀行	六、四九、一五	二七、四三、四八
正金銀行	二四、六〇、三三	二四、四九、〇八
正隆銀行	一七、五五、八四	七三、六〇、三六
滿洲銀行	(創立前)	三、五〇、三二
東拓會社	八、五三、六三	七、三四、五六
其他	二四、三八、六〇	一九、七〇、二六
合計	一四、六四、〇七	三、五九、〇九

綜全體而觀之，放款額之增加，八年之間約爲二倍半，其發展之程度，實屬可驚，然而正金專司匯兌，無甚增加，則其各種產業之興隆，概可想見矣。

同時此等銀行，復極力吸收中國人之貯蓄，用以轉借國人，而從中攫收利息，操握金融實權，據一九二九年日方之報告，中國人同年在大连營口瀋陽開原長春安東哈爾濱七地之主要日本銀行存款額達日金五百九十五萬八千五百二十六圓，銀一千三百七十萬八千五百七十五元，合其他各地計之，數約四千萬以上云。茲將一九二九年東省日本主要銀行之營業概況及對於中國人之存款及放款列表以觀，更可知日人操縱東省金融之實況矣。（單位日金爲圓，國幣爲元）

日帝國主義侵略東省之經濟政策

名	稱資本(實收)	公積金	存款	放款	款本店支店及出張所
正金銀行	100,000,000	111,045,757	15,633,163	35,956,128	橫濱 大連、營口、瀋陽、長春、開原、哈爾濱、
(東省各店)			16,615,955	10,151,131	
朝鮮銀行	25,000,000	21,010,000	40,270,953	50,950,355	京城 大連、瀋陽、長春、開原、營口、旅順、遼陽、安東、鐵嶺、哈爾濱、傅家甸、
(東省各店)			1,140,333	1,187,193	
正隆銀行	5,640,375	56,100	50,000,948	60,107,333	大連 營口、長春、瀋陽、旅順、開原、天津、撫順、遼源、四平街、青島、安東、哈爾濱、鞍山、公主嶺、
滿洲銀行	2,926,250	—	3,773,053	4,331,260	大連 全州、貔子窩、普蘭店、鞍山、瀋陽、小西關、撫順、本溪湖、安東、興隆街、公主嶺、范家市、長春、吉林、開原、
大連商業銀行	2,000,000	215,600	1,331,121	2,500,500	大連
興信銀行	100,000	—	15,777	3,491,691	大連
長春實業銀行	500,000	100,000	330,759	1,070,955	長春
滿洲殖產銀行	500,000	8,700	477,326	1,131,255	瀋陽

註一：於存款及放款兩欄內有分兩項並立者，則第一行爲金，第二行爲銀，其只有一行者概爲金。圖又合計項下資本金及公積金兩欄旁附有括弧者，其括弧內之數係除去正金及鮮銀兩行所有之數而爲日本在東省各行之實在資本及公積金，蓋正金及鮮行之資本及公積金乃合全體而計算也。合計之外列有「中國人」一欄者，爲一九二九年中國人在日本此等銀行之存款額及借款額，觀此可知中國人所損失之利益爲何如矣。

又上表所列者爲日人在東省設立之主要銀行，至于日本國內之銀行而設支店或出張所於東省者，概未列入，

二 金融組合

金融組合者，專以侵略農村經濟爲目的，於一九一四年，在關東所獎勵保護之下，有金州第一金融組合及大連第一農資金融組合之設立，次年於普蘭店地方，再次年於貔子窩地方，繼有同樣組合之組織。當成立伊始，關東所除各撥補基本金一萬元外，並於設立後數年間一切經費，給款補助，以助其成，此爲東省日本金融組合之由來也。邇後數載經營，成績卓著，日本鑑此情況，繼欲由農村而及於都市，對於農工業者亦組織金融組合以資發展；地方更欲普及此種施設於關東州及滿鐵沿線，乃於一九二九年發布金融組合之命令，與以法律保障。又於同年九月准許設立「滿洲金融組合聯合會」以

爲調節此等金融組合之資金及其業務進行指導之機關，並由關東所在國庫及地方費項下撥借一百萬圓與聯合會，由聯合會名義借與各組合，以十年間無利息爲條件，惟各組合應借之額，則須得關東所許可，此聯合會現在所屬組合數有十二，其借與金將近六十萬圓。

組合之機關，則由組合長，官派理事，監事及評議員組織之。每戶出資金額，在都市組合者爲金幣五十圓，鄉村組合爲小洋十元，每組合員所借出之資金，在都市組合之担保借款以三千圓爲限，信用借款以一千圓爲限；在鄉村組合者，其担保借款爲一千五百元信用借款爲五百元。至一九三〇年終，金融組合共有二十所，借出金額約達一百萬圓，數年之間，發達如此，其速率不可謂不大也，目前關東州及滿鐵當局，正計劃擴大機能，增加資金，及講求以低利融通之政策云。（下表以一九三〇年末之概況，單位日金爲圓，國幣爲元）

組 合	別 所	數 員	數 政府貸與金	出 資 金	借 出 金	組 合 所 在 地
都市金融組合	一五	一、一六四	七五〇,〇〇〇圓	五五,〇〇〇圓	五五,〇〇〇圓	大連、沙河、旅順、瓦房營、大石橋、營口、鞍山、遼陽、瀋陽、鐵嶺、開原、觀平街、撫順、公主嶺、長春、
鄉村金融組合	五	五、五六	五〇,〇〇〇圓	七五,〇〇〇圓	五七,〇〇〇圓	大連會屯、旅順會屯、普蘭店、金州、貔子窩、
合 計	二〇	七、〇二〇	七五〇,〇〇〇元	一三〇,〇〇〇元	一一二,〇〇〇元	

按上表內在都市金融組合尚有貯蓄金十八萬三千圓及交聯合會保管金二十八萬圓未及列載，又其中關於中國人之參加人數及貨金數額如何，因統計不詳，故未釋明。

三 無盡公司

「無盡」云者，又稱賴母子講，起源殊早，與我國民間所流行之「合會」略同，由發起人糾合多數會員，各出一定數之金錢，定時會合依次抽籤，每次中籤者應得會員全體所合之會金，以至各員皆中籤爲止，名曰「滿會」惟已得會者以後除照納會金並附加相當利息外，不得加入抽籤之列。此爲無盡在過去之情況，輒近則改具組織擴大規模，變爲專以融通金錢之信用組合，在日本國內各處均有設立。近年侵入東省，於一九二一年有曰蓬萊無盡株式會社者創立於大連，邇後旅順瀋陽各地均見開設，勢如雨後春筍。至一九二九年末其規模較大家者共有九家，實收資本有四十三萬五千元，借出金額達一百九十四萬，茲得同年末東省無盡公司之營業概況列表如左：（單位爲圓）

商號	實收資本	積立金	每次應得款總額	每次應繳款總額	信託貯金	借出金	本店
蓬萊無盡會社	11,500,000	3,100,000	1,100,000	1,500,000	—	3,000,000	大連
安信無盡會社	3,000,000	1,100,000	1,000,000	1,600,000	3,000,000	4,000,000	安東

安東晝夜無盡會社	一五,〇〇〇	五〇,七七一	四〇,〇〇〇	四三,〇五二	四六,八〇四	六五,二五五	安東
第一無盡會社	五,〇〇〇	—	四,〇〇〇	六,〇〇三	—	二九,三六六	大連
旅順無盡會社	一五,〇〇〇	三,五五〇	三三,〇〇〇	三九,〇三四	—	五〇,〇〇〇	旅順
撫順無本生會社	二五,〇〇〇	四一〇	四八,〇〇〇	五〇,九三三	二七,五〇〇	一八五,三五五	撫順
共信無盡會社	二五,〇〇〇	三,四六五	三三,〇〇〇	二八,八四九	七〇,九元	五,九四九	湖本溪
奉信無盡會社	二五,〇〇〇	一〇,五二〇	八六,〇〇〇	八五,三四五	—	一九七,九五	瀋陽
泰信無盡會社	一五,〇〇〇	—	七三,〇〇〇	八〇,七五	一七	三,三一一	開原
合計	四三,〇〇〇	三三,四一六	四,六八,四〇〇	四,七,七,六六七	九七,六六七	一,九六,八六九	

四 金貨業及質店

日本經濟侵略之本營，除上述各種設備外，尚有金貨業及質店兩種，銳意經營，扶搖直上，滿坑滿谷，熱如萬馬奔騰，今日為庶民金融上最重要之機關，尤以無產階級一遇金錢之需要，則多賴此項機關為之融通也。

金貨業者，類似我國之票櫃錢莊，專以放款收息為目的，手續簡而進出便，故一般人樂與交易，

年 別	國 別	營業		質 出 額	贖 回 額	流 質 品 額	現 存 額 (一九一九)	所 在 地
		戶 數	額					
一九二七	中國人	三三	五、八〇七、〇二一	四、九六、三三〇	四九、一七	二、〇七、六三二	大連、旅順、貔子窩、瓦房店、大石橋、鞍山、遼陽、瀋陽、本溪、安東、撫順、鐵嶺、開原、順、四平街、公主嶺、長春、(中)營口、(日)蘭店、(日)營	
	日本人	三三	二、五二、三三三	一、九六、八九五	五四、一五	九六、四四		
一九二八	中國人	三三	五、八〇七、〇二一	三、五九、〇〇九	五三、三五	二、七三、八五	大連、旅順、貔子窩、瓦房店、大石橋、鞍山、遼陽、瀋陽、本溪、安東、撫順、鐵嶺、開原、順、四平街、公主嶺、長春、(中)營口、(日)蘭店、(日)營	
	日本人	三三	二、三〇、六〇〇	一、六七、三七一	四三、九〇三	九三、〇七一		
一九二九	中國人	三三	四、五〇、二七	四、八六、四二一	六七、〇七	一、四七、二五	大連、旅順、貔子窩、瓦房店、大石橋、鞍山、遼陽、瀋陽、本溪、安東、撫順、鐵嶺、開原、順、四平街、公主嶺、長春、(中)營口、(日)蘭店、(日)營	
	日本人	三三	二、五〇、八四	一、九二、二四	四三、九八五	一、〇五、五〇		

附註：上列中國人之金貸業及質商，係以日人勢力所及之地互相比較，

非示東三省中國人經營該業之全體也。

五 郵政貯金

東省日本郵局之貯金，係自一九〇六年開始，初原隸于遞信省，歸郵政貯金局兼辦，乃經營未久，貯戶陡增，而於一九一一年政屬關東廳，處理較前便利，至一九二一年為獎勵人民貯蓄起見，設立貯金獎勵委員會，次年復改訂長期貯蓄利息，再次年創設在外貯金制度，近年又改正利息計算法及實

日帝國主義侵略東省之經濟政策

施月付制度，於是貯戶非常增多，每年增加率超過一百萬圓以上，一九二七年之存款爲一千五百萬圓，而至一九三〇年六月貯戶增至二十八萬七千戶，貯金總額達二千五百萬圓，同時極力吸收中國人之貯蓄，一九二九年度中國人之存款約有二十六萬金圓，下將最近四年間郵政貯金之發展概況，列表以供參考。

年 別	貯 戶	存 款 額
一九二七	二三五、一七九	一五、三六一、六二四
一九二八	二六一、七八八	一六、九五七、五一五
一九二九	二八〇、六五七	二二、九七四、三二四
一九三〇	二八七、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郵局除以現款貯蓄外，又兼理「轉匯儲金」(Transfer Savings)，日人名曰振替貯金，每年度之出進額，約達一千萬元左右，此外更有「郵政年金」，發展至爲迅速，一九二九年度之受理契約有三千一百件，而其年金額除死亡及解約者不計算外，尙有四十一萬餘圓，每一萬人中有八十八件，較之日本內地則有三倍。郵局匯兌因關東廳銳意經營，講究普及政策，一方隨人口之增加，商工業之進步，結果成績良好，利用者逐年增加，在一九二九年中，其受入金額爲一九，〇四二，三七八圓，兌出

爲九，〇三八，四二八圓，此內華人之匯款者，數達三百二十六萬，約占全數百分之十二云，以上將日本侵略東省經濟之重要機關，分類摘要敘明，日人在東省之金融勢力，國人當據可想見，然而國人在金融上之地位，究屬如何，尙不明瞭，則不能不略置一言。以爲研究上之比較。

關於我國之金融機關，政府方面遼寧則有東三省官銀號，吉林有永衡官銀號，黑龍江有廣信公司。東三省官銀號係於一九〇五年設立，爲遼寧省之中央銀行；現有支店二十三，其主管事務除辦理省庫，統馭一般銀行外，兼理普通銀行業務，發行奉票及哈爾濱洋票，並經營附屬事業如油坊製粉等。近年因奉票及哈票狂跌，負責甚鉅，幾至不能維持。永衡官銀號設立較早，於一八九八年開業，其經營事務與東三省官銀號略同，亦有吉林官帖及永衡大洋票小洋票之發行，營業成績殊不見佳。廣信公司爲黑龍江省金融界之中樞機關，原於一九〇四年創立，至一九一九年又與黑龍江官銀號合併而至今日，資本爲二萬兩，支店亦有二十餘，亦發行哈票及黑龍江官帖等，最近官帖跌價，業務日見衰退。其次中國交通兩行，在東省亦設有相當數之支店，邇又設立遼業銀行，皆皆處理國庫事務，發行紙幣。民間銀行雖有數家如遼寧商業銀行東北銀行等，然大皆無力，惟近年儲蓄會頗爲興盛，最初於民國三年在鐵嶺有金方農商儲蓄會之設立，積年發達，今日儲蓄會數近一百，合計資本金達五千萬，其目的爲獎勵貯蓄，使貯金安全而用於有利之事業，在庶民金融上佔有相當之勢力，其主要業務，在貯蓄

方面則有「通知貯金長期貯金」「積立貯金」「特別貯金」其他「獎勵金付貯蓄」等，在放款方面，則經營倉庫等保險業及其他各種企業，兼有信託公司之性質。

綜觀以上中國方面之金業機關，除儲蓄會者外，營業大都不良，資本既遠不如人，經營又缺乏敏捷，系統不立，信用不固，儲款無法吸收，生意無從招徠。官立銀行除官廳及官吏之儲金外，人民往儲者僅不過百分之五，而民間銀行之狀況，亦復如是，匪特此也，國人年來貧盛，只有大貧小貧之分，若以人數為比例，個人所有之平均額較之日人尚不及千萬分之一，長此因循，彼以整個組織的力量以臨我，而我則各自為謀以應戰，其勝敗之數，直無待蓍龜矣。茲為便利檢閱起見，將東省中國主要銀行列表如左：（單位為元支店及辦事處以在東省為限）

名	稱	設立年月	實	收	資	本	本店	支店及辦事處
東三省官銀號		一九〇五	奉	大洋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瀋陽	二五
永衡官銀號		一九〇九	大	洋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吉林	三六
廣信公司		一九〇四		一、五〇〇、〇〇〇、			黑龍江	一九
中國銀行		一九〇四	大	洋二四、七一〇、二〇〇、			上海	一六

交通銀行	一九〇七	大洋	八、七一五、一五〇、	上海	一二
益發銀行	一九二六	大洋	二〇〇、〇〇〇、	長春	一
農業銀行	一九二四	哈洋	一二〇、〇〇〇、	綏化	
遼寧匯華銀行	一九二六	大洋	六三〇、〇〇〇、	瀋陽	一
公濟年市錢號	一九一九		三、〇〇〇、〇〇〇、	瀋陽	一
遼甯商業銀行	一九一四	奉小洋	八七五、〇〇〇、	瀋陽	四
邊業銀行	一九二五	大洋	七、五〇〇、〇〇〇、	瀋陽	七
大同銀行	一九二二		二、〇〇〇、〇〇〇、	哈爾濱	
黑龍江官銀號 分行	一九〇九	洋	五、〇〇〇、〇〇〇、	瀋陽	非廣信公司之支店、而係 獨立經營也
世合公銀行	一九二四	大洋	七五〇、〇〇〇、	瀋陽	
熱河興業銀行	一九一七	洋	一、〇〇〇、〇〇〇、	熱河	五
察哈爾興業銀 行	一九一九	洋	二、〇〇〇、〇〇〇、	張北	四

東北銀行	一九二三	大洋	五、〇〇〇、〇〇〇、	瀋陽	
普通商業銀行	一九一九	大洋	二五〇、〇〇〇、	長春	二
浙江興業銀行	一九〇七	大洋	二、五〇〇、〇〇〇、	上海	一
東邊實業銀行	一九一八	大洋	一、五〇〇、〇〇〇、	安東	一
金城銀行	一九一七	洋	七、〇〇〇、〇〇〇、	天津	二
東萊銀行	一九一八	大洋	三、〇〇〇、〇〇〇、	天津	一
林業銀行	一九二七		二〇〇、〇〇〇、	瀋陽	
遼甯民生銀行	一九二九	大洋	二五〇、〇〇〇、	瀋陽	
濟東銀行	一九二八	大洋	五〇〇、〇〇〇、	瀋陽	據云美孚洋行出資有一、五〇〇、〇〇〇元
濱江大同銀行	一九二九	哈洋	一、〇〇〇、〇〇〇、	哈爾濱	
濱江儲蓄銀行	一九三一	大洋	五〇〇、〇〇〇、	哈爾濱	
大中銀行	一九二九	大洋	一、六〇〇、〇〇〇、	天津	一

B 通貨

一 日本紙幣之概況

中國各地之幣制，種類原極複雜，彼此缺欠統一，致使國民經濟上發生極大之缺陷，產業於以不能發達，而此種情形以在東省爲尤甚，東省除中國政府鑄有銀幣銅幣各銀號發行紙幣官帖外，外國通貨復任意流入，汎濫市場，流毒無極，據稱今日東省流通之現貨，共有六十九種，通貨混雜之狀態，當可想而知也。

日本於日俄戰爭發端之際，發行不兌換之軍用鈔票一億五千萬圓，軍人攜至東省，強制通用，日本戰爭之掄出，胥賴乎是。迨戰事告終，於一九〇六年由正金銀行發行兌換紙幣，以爲收回之用，然至今尙有小額流行，擾亂金融莫此爲甚，日人之軍用票固收回也，然其用以收回之工具者仍不外紙幣，名爲兌換，實則強制通行，此項銀票發行種類，有一圓，五圓，十圓，百圓四種，最近之流通額約在六百萬以上（一九一七年爲五百四十萬圓一九一九年爲五百九十七萬圓），在一九一三年正金銀行又發行金紙幣，流入市場，吸收現金，其最高額竟達三百餘萬圓云。降至一九一七年寺內內閣時代，變更對滿政策，以統一金融機關名義之下，謀正金銻銀東拓之分工，仍由銻銀行發行金票，而以正金發

行銀票，今日金票已有前述四種，其流通額爲四千一百五十四萬五千圓，此外更有日本銀行券（在日本國內所使用之紙幣），日本補助貨幣，惟其確數不詳，據稱亦有相當數額云。

今日東省通貨之中，前述日本金票銀票俱佔有擴大之勢力，幾可左右一切金融，日人在各地貿易，無論採辦原料或經商販賣，均以日鈔爲交換之媒介，到處強迫使用，中國人民所受損失之大，竟不可以數計：就商人言之，彼在鄉間採收農產物，需要中國貨幣，而其販賣所得均爲外國貨幣，以幣易幣時常受匯水之損失，而其所受之外幣又常爲金幣，兌換時除受匯水之支配外，復負擔金銀匯兌之危險，故中國商民常陷於不安之狀態，經營事業，殊無把握，惟一任命運之播弄，農民及生產者亦同遭災殃，蓋其與日人交易時所得者概爲外幣，而消費或生產上之需要材料又必須國幣以購求之也。復次東北政府連年多事，濫發紙幣，市場超過需要之額，致奉票及黑龍江官票等一起跌價，日本乃利用機會，從中操縱散布謠言，鼓動人心，使奉票一跌再跌，同時彼大肆宣傳日幣之信用如何確實，準備如何充足，而以日本之銀票金票代交易之流通，使中國紙幣幾於不能立足於市場，觀下表奉票之慘落情形，即可見日人把持東省金融之一端。以下爲最近五年間日本金票百圓對於奉票之比價：

年 次

奉票（平均）

一九二五年

一六九、一九

一九二六年	三五八、七七
一九二七年	九五六、六五
一九二八年	二五〇九、六五
一九二九年	五六八二、六八

二 實行金本位制

日人在東省之金融政策，除發行上項紙幣外，更欲實行金本位制，以期驅逐銀貨之勢力，而鞏固彼經濟侵略之基礎。在一九〇七年日本即在關東州行用金本位，舉凡財政收支及一切公入公出，均以金貨爲出納標準，滿鐵運費亦因之而改用金圓至一九一七年寺內內閣時代，更標榜所謂「內地延長主義」，令朝鮮銀行設支店於大連，繼承正金發行金票，逐年增加數額而減少前所發行之銀票，擴張金幣地位，繼至古賀山縣諸氏，提倡統一金票運動，講究金票普及策略，於是所謂「金建問題」，喧囂塵上，日人對滿問題之意見，亦以金建與否分成二派，而主張金建者，以爲日本內地既早採用金本位，東省可視爲內地之延長，當然應以金爲本位，日人一切投資可獲安全，無論銀價如何變動，不致損失而懷恐懼之心；反對者則主張金銀並用，以中國原爲銀本位國，若強行金本位徒增日人之損失，一九二七年日本在東省之商會聯合會議亦有以金銀兩資本設立滿洲中央銀行之議決，而此問題不獨變成日人對滿政策之中心問題，且復成爲政爭之工具矣，然其後之歷任關東州長官及滿鐵當局，皆苦心於

日帝國主義侵略東省之經濟政策

金本位之如何實行，銀貨之如何打倒，及至田中內閣時代，標懸「滿蒙積極政策」，夙興夜寐，不遺餘力，至今日則東省之金融已全以金票為轉移，而奉票之低落只有加無已也。

日人之欲實行金本位者，其理由前已略有言及，彼以為中國之法貨皆以銀為本位，與日本之金本位利害不盡相同，彼此往往發生抵觸，使日商受意外之損失，而中國商人因於貨幣具獨持之天才，關於金價與銀價之計算，雖非專門智識，戰無不勝利，不論銀價如何起落，皆不受影響，故日人雖專有水陸交通之權及金融資本之援助，而猶不能戰勝華人者，厥為銀本位之所果；日本在滿蒙之不能極度發展者，亦惟此故，然欲完成大陸政策，不能不先確立殖民地之經濟基礎，欲樹立經濟基礎，則不能不迅速實行金本位制也，倘金本位實行之後，第一；日人投下之資金、無須由本國攜出金幣至滿洲購買生產材料時兌換中國洋票，既不受金銀比價之影響，商業可以安如磐石，一切華人所掌握之貿易亦可完全奪盡。第二；如以金為本位，中國政府即不能發行紙幣，金票可以獨霸市場而暢行無阻，日本銀行業益臻發達，從而中國紙幣既不能通行，中國銀行界自然無力與日本經濟抵抗，則全滿蒙之金融自不求而落於日人之手也。田中奏章有云：「滿蒙如可完成施行金本位者，我國（日本以下同）金票可以自由擴張，藉我金票之信用，而廣採各地特產，……中國銀行之紙幣信用如不打倒，則我金票於滿蒙永無發展之日，我欲壟斷滿蒙金融更為遼遠，……我則藉此以擴張金票為本位，以期壟斷滿蒙經

濟財政，進而迫東三省當局聘請我國人爲財政顧問，俾可操縱其金融及財政，打滅彼奉票不確實之力，而用我金票爲本位以代之。」

嗚呼，東三省爲我國之領土也，彼日人倒行逆施，擅發金票使中國人受莫大之損失，致百業不興，民生凋敝，而日人不自覺悟，反謂日人受累於銀幣，中國之銀本位即有害於日本金圓之發達，此何言乎，直強盜入室，反憎主人，而日人之狠毒，則可見一斑矣。

二〇、十二、三十、草於鷄鳴寺下、

國聯何以屈服於日本

廿年十二月載於日本
評論三日刊第十三期

——東省事件與國際關係之解剖——

一 國聯豈認日本之暴行爲正當耶？

國際聯盟爲着東省事件，一連開會三次，各國代表聚精會神折衝樽俎，冀一場紛爭能得和平解決，亦可謂極盡人事之觀矣。而國人於此沉痛悲憤之期中，本諸一會員國之地位，深信國聯能披荆斬棘，排除萬難，謀一適當解決方法，以制裁暴日蠻橫，而伸張國際正義，故日日翹首雲衢屏息靜候好消息之傳來，此國人信賴國聯能維繫和平弭止戰爭之心，亦可謂至矣極矣。然希望仍止希望，事實並不如

國聯何以屈服於日本

八一

此，開會儘管開會，紛糾依然紛糾，各地日兵之暴行慘殺，猶增加無已，而國聯之態度則日趨愈軟，由委曲求全而變爲屈服退縮，由彌縫妥協而變爲延宕搪塞。此何故歟？豈國聯承認日本之舉動爲正當而不願干涉耶？抑國聯畏懼日人之武力而無法以干涉耶？國人對之，迄今猶有不能了解者。

日人此次無故侵入我國領土破壞國際法與擾亂和平，已爲國聯一般所公認，故九月第一次開會之始，即限期逼令日本撤兵；而各國報章詆斥日本舉動妄認之紀載，已屬連篇累幅，觸目皆然，可見國聯之不來干涉日本暴行者，決非因承認其暴行爲正當也。至國聯因懼日人武力而無法干涉者，尤不符合事實，以武力而論，國聯中除暴日外合其他各國武力以對付日本，當然足以膺懲而有餘。或者以爲國聯用武力來解決紛爭，在盟約上既無明白規定，而實際上又缺乏先例，故國聯對於紛爭之解決，惟有出於勸告之一途。此言誠不無片面理由，然國聯除以武力制裁而外，尚有維護和平消弭戰爭之其他方法，盟約第十五第十六兩條之規定，即係爲此而設，可知國聯之屈服退縮延宕搪塞者，非無法干涉實不願干涉耳。

註：聯盟規約第十五條第六項：「如行政院報告書，除相爭之一造或一造以上之代表外，該院委員一致贊成，則聯盟會員約定彼此不得向違從報告書建議之任何一造從事戰爭。」

第十六條第一項：「聯盟會員如有不願本約第十二條第十三條或第十五條所規定而從事於戰爭

者，則據此事實，應視為對於所有聯盟其他委員有戰爭行爲。其他各會員應即與之斷絕各種商業上或經濟上之關係，禁止其人民與破壞盟約國人民之各種往來，並阻止其他任何一國爲聯盟會員或非聯盟會員之人民與該國之人民財政上，商業上，或個人之往來。」

第二項：如遇此情形，行政院有向各關係政府建議，俾聯盟會員派遣陸海空軍組織軍隊以維護聯盟盟約之責。

二 國際聯盟——現存國際關係之基礎

然則國聯爲什麼不願干涉日本在東省之暴行呢？此無他，東省之存亡與他們沒有甚麼切膚的關係，同時他們在東省內部亦沒有多大的利害，所以他們樂得隨便說幾句敷衍話，有效也好，無效也好，與他們絕不相干。他們若不是怕國聯失去信用而有倒台之虞，他們簡直不會來理這一回事。中國人日日盼着國聯鋤強扶弱之佳音，而國聯的後台諸公正在暗中竊笑中國人之昏昧愚蠢呢！老實說一句，今日國際關係，全以「利害」爲前提而移轉，一切國際間之縱橫連合，要皆建築在利害的台基之上，無論關係如何錯綜複雜，總不出此天經地義之範圍以外，甲國援助乙國而抑制丙國，此國聯合彼國而對抗他國，祇有爲利害關係所驅使，絕無義俠的扶助精神湧於其間。而於自國無利無益的事件，決不會勞心耗力去問問。「利害」二字，是現代外交家所奉爲圭臬的金科玉律。弱小民族之呼號，決不能入於

強國之耳鼓，所謂國際正義，世界和平，都是欺人自欺的假面具，而徹頭徹尾的利己主義，狹隘徧頗的愛國心，纔是他們的真實寫照。國際聯盟之過去工作，盡止乎此，今日之作爲，亦不外乎此，

然國聯中除列強外，尙有其他多數中小國家，則以上關於國聯之釋言，似覺籠統概括。此在理論上固屬不謬，而實際上則執國聯之牛耳者，仍不外英法日意數強國，其他中小國家亦不過點綴湊數而已，對於列強所決定之議決案，除人云亦云而依照強國意思表示外，有何方法可以左右之推翻之。『實力即公理』（Macht ist Recht），誰敢曰否。故國聯中一切問題之決定，要視諸強國之態度如何以爲斷，尤以諸強國關此問題之利害關係如何而決定向背。東省事件在國聯之結果如何，祇須將諸強國關於東省之利害關係剖析檢視，則不待開會討論而後始可知也？

三 列強在東省之利害關係

講到利害關係，不外軍事經濟二點，在今日國際競爭場裏，經濟恆較軍事尤烈。東省對於英法美德意諸國，軍事上沒有利害關係，已屬顯然事實，毋庸贅述。至其經濟關係如何，若將近數年間各國在東省之貿易額及投資額比較觀之，不難立即明瞭。

按此次國聯開會，美國亦派代表參加。美國雖非聯盟會員，然其勢力殊足以左右聯盟之決議。故將美國提出。俄國因與目前局勢，關係至鉅。尤其日本對外宣傳，每以赤俄爲題以恫嚇列強。故並舉

討論。

(甲)貿易 東省外國貿易中，將日俄美英四國最近三年間之貿易額列表如次；(單位爲一千海關兩，其括弧內數字，爲各國在東省總貿易中所占之百分率)。

	一九二八		一九二九		一九三〇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輸入	輸出
日本	一三,九四〇 (四·六)	一六,四七六 (五·四)	一三,七五〇 (四·三)	一六,八九五 (四·〇)	一三,四四九 (三·六)	一五,三三三 (四·六)
俄國	一五,九九三 (八·九)	一六,〇六六 (九·八)	一五,七三三 (四·八)	四一,九五五 (九·六)	一五,七三三 (五·二)	四〇,九九五 (三·九)
美國	一九,九二〇 (一六·六)	八,五三三 (二·〇)	一五,八九六 (七·八)	一〇,六三二 (三·四)	三,七七九 (六·九)	六,九九〇 (一·八)
英國	六,七六〇 (二·二)	一三,七五三 (三·三)	九,六一一 (三·〇)	三,六六八 (五·一)	一〇,四四四 (三·五)	一〇,六五五 (二·六)

註：法國數量殊微，故未列入

據上表所載，日本占東省總貿易十分之四。而居第二位之俄國，除一九二九年因中東鐵道發生爭執者外，尚不及百分之十。祇有日本之八分之一至三分之一。至第三位第四位之美英兩國則尤少，僅

國聯何以屈服於日本

占全體百分之二至五耳。若以東省南部之貿易而論，於一九二九及一九三〇兩年間，日本已居六成之數，除英美兩國稍有增長外，其他各國莫不逐漸衰退。去年（一九三〇年）法國在大連港貿易較前年減少百分之三八云。觀此可知日本在東省經濟界占有絕對的優勢，亦可知除日本外其他列強所占之地位爲如何也。

復觀各國對於東省輸出輸入之狀況：日本及俄國之輸入東省者，遠遜於由東省之輸出，美國則反是，其輸入東省之數額，則比自東省輸出多至二倍至三倍以上。英國則輸出輸入兩者相差殊微，卽日俄兩國以東省爲採取原料之場所，英美則視爲商品之販賣市場，此利用關係之不同，可以影響其對東省政策有所差異。至東省輸出貨物中，在其他各國爲大豆高粱等肥料與食糧品，而日本所取者，重要者爲鐵與煤（東省產鐵的九成及煤的五成，均輸入日本）所與日本重工業之發達，關繫至大。此種質的不同，又足以影響政策之本體。

（乙）投資 東省各國投資之數額，適與貿易相對應，日本首居第一。據一九二九年南滿鐵路公司調查課之報告，占有總額七成以上。不惟獨占南部之外國投資，卽在北部地方，日本資本亦居於第二位。俄國之投資雖占有總數二成以上，然皆集中於東省北部，以北部而論，俄國占有百分之八四。第三位之英國則相殊甚遠，尙不足總投資之二分，其他英法諸國僅占一分四外，茲將各國投資數額

以產業分別列表如次：（單位為千元）

業別	國別						瑞典 丹麥
	日	本	俄	國	美	國	
運輸業	四六·二六		三七·六三		一六·五〇		一四·七六
農墾林業	二四·〇〇		一九·五〇				一五〇
工業	一四七·四四		五·三五		二·五〇		二·五〇
商業	一七·七三		一九·五〇		一〇·八七		一〇·七〇
金融業	二四·三六		七·九二		七·〇〇		八·五〇
其他	三五·〇七		一五·一〇		二·七〇		四·七〇
合計	一五〇·七五		五五·〇五		三九·五〇		三·四〇
百分率	七三·二		三三·五		一九		一·三
							一·〇
							〇·一

註：日本以外各國之投資，大體為一九二七年以前之狀況，其貨幣換算率，以盧布及日本金圓與銀元等價，美金為二元，金磅為十元。

上表中吾人所應當注意者，厥惟投資之性質，此與前項利用關係及貿易實質，均係本題之焦點。亦即國聯屈服於日本之所在，故不憚辭煩，詳為論列。日本投資之在鐵路港灣及其他運輸業者有三〇

國聯何以屈服於日本

%，在農林礦（大部分爲礦業）方面有一六%投於工業者有一〇%金融業者有一三%商業則僅有八%。即日本之投資額，在根基淺弱如商業方面者爲數甚少，大部分均屬性質固定之事業。俄國之投資約與日本相似，惟其集中於鐵路，則比日本尤甚，居其全投資中八五%以上；其次關於農礦業及商業者，亦僅各占四%餘。其他諸國之投資，不惟數量微小，而在質的方面，亦與日俄不同，且多爲根基比較淺弱之事業。英國投資三占有四〇%之運輸，厥爲北寧鐵路借款二百三十萬磅之一部，然偏於西南一隅，而又跨越山海關之內外，其次在商業占二七%金融業占一八%。至於美國投資，在商業占二七%，金融業占一八%。至於英國投資，在商業有四〇%，金融業有三二%，工業尚不滿一〇%。法國投資之占有七〇%之運輸業，爲戰前由俄國而投於中東鐵道，今則有名無實。瑞典及丹麥之工業投資。雖有占二五%之數，然係瑞典火柴聯合而於日本大同憐寸者，此外全部殆爲商業投資也。

四 國聯對於東省事件之態度

今日國際關係之利害以爲前提而決定者，已如上文所述，故國聯對於東省事件之態度如何，要視其國家關於東省之利害如何以爲斷。觀上文所徵引之事實，可云東省除日俄兩國外，其他各國如英美德等均沒有多大的重要關係，其貿易爲商品之銷售，其投資爲販路之推進。然商場隨地可覓，販路到處易求，失之於此，可收之於彼，不若原料場所之難於取得而不肯輕易放棄，且夫營商之目的在於牟

利，只問有利可圖，不問區域如何。以有易無，原爲商業上重要目的之一，然英美所取給於東省者，爲肥料及食糧品，但此又非絕對必需而不可須臾缺少者也。英國之糧食，多仰給於印度澳洲，美國則自足自給而有餘裕。至肥料一項，供求殊易，更不足論，而法國之貿易與投資，較英美尤遜。故東省在英美法等國際利害之天平台上，直如鴻毛之微耳，至日俄兩國，則利害關係殊大，一切與英美適成反對，其所取爲工業上所必需之原料，其投資爲根深蒂固之運輸鑛工諸業。倘原料一日缺乏，則其所依賴之工業，必至發生停頓，倘關係一日變更，則經營必至遭受影響，尤以煤與鐵二者，爲日本工業發達之基礎條件。而俄國若喪失中東鐵路，不惟失去東省政治經濟之全部地位，更使海參威港失去大半之價值。故日俄與英美兩方對於東省之關係，正不可相提並論。

東省利害關係，英美既淡薄如彼，日俄復重要如此，故東省在日俄則勢所必爭，英美則無可無不可。匪特今日如是，觀夫過去法庫門鐵路錦瓊鐵路之事件，更可證明此言之不謬。溯自暴日入寇東北，迄今瞬將三月，會議雖開三次，事態仍無進展，中國代表雖力竭聲嘶，而各國態度依然模稜兩可，據此推之，寧非當然之結果乎？蓋東省之存亡與領土主權之移轉，於英美諸國無何損益。東省之屬於中國也，彼等之所求者惟商品市場，一旦易主而屬於日本也，彼等仍可獲得市場，至多亦不過稍受限制耳，根本焉有動搖者乎？又何必援助中國而開罪於日本呢！（此次國聯開會，英國比較同情於中

國，此其抑強扶弱以圖自利之傳統外交政策，而非出於積極主張者也。至俄國態度如何？日俄有衝突之可能乎？此以兩方之貿易及投資觀之，亦不難推斷。日本之利害關係多在東省南部，而俄國在北部，倘日本不圖擾亂北部，俄國當不致出而干涉也（實際上日本天天欲進出北部，惟今日尚不致實行蓋其實力未充足故也）。此國際間彼此之利害關係，日本當局看得清清楚楚，故敢在國聯強硬到底而不肯稍有讓步，奈國人不察，惟冀國聯能主張公道，抑壓強權，伸張國際正義，維護世界和平，其心固可憫，於愚實不可及也。

按法庫門鐵路爲一九〇七年英商鮑林所提議，旋遭日本極力反對，認與南滿路平行而中止，錦瑗鐵路則於一九〇七年由英商與中國政府締約，經日本聯合俄國提出抗議，遂罷其議。

五 自生之路——天助人助不如自助

國際第三次會議已閉幕矣！空洞曖昧之議決案已由全體大會通過矣，國聯最偉大最莊嚴之工作已盡在於斯矣！國人對於國聯尙復繼續要求乎？吾人對於列強猶能滿懷熱望乎？同胞們，我們再不要癡迷昏聩一至於死矣！國聯之主張公道，只有這種典雅式議決案，此外他們再不來管賬了！我們如想國不亡種不滅，我們只有大澈大悟，另闢生路了，此路維何，即「自助而自救」是。以天錫獨優之土地，擁有四萬萬人口之國民，而不能與蕞爾三島六千萬倭寇相對抗者，直我民族之奇恥大辱。「臥薪嘗

胆，生聚教訓，」是勾踐復仇的深謀，遺訓昭然，國人應銘諸肺腑。所以我們要自今日起，下個絕大決心，立定步驟，永矢勿忘，一心一德，始終不懈，以十年五年之努力與準備，則定可戰勝日本，以圖生存，以雪國恥。空號無補於實際，經驗昭示於吾人，腳踏實地，拚命前進，纔是今後唯一之生路。

然環觀目前中國情況，有使我們痛心疾首而不能一刻安心者也，國難到來，瞬將三月，而人民日夜渴望當局一再宣言之統一政府，至今仍遲未能實現，條件紛紜，莫衷一是，外患日亟，內爭猶烈，學生請願，舉國騷然。且因水災奇重，哀鴻遍野，盜匪橫行，百業莫舉，如斯內憂外患，國人若無斬釘截鐵之決心，頂天立地之大志，吾恐國亡之日將不遠矣。同胞們，此次國聯議決案之不利於我者，固有上述之理由存在，然我們不能因此而盡怨國聯之無誠，而中國之政情之紊亂，啓外人之輕視，未始非其理由之一也，前聞國府某外顧問近由巴黎返國答友人之問曰：「日人如此威迫進來，中國統一政府之組織猶不能實現者，實爲外國人所最不能了解之事也」。國人聞之應作何感想？求人莫如求己，惟自助者天助，同胞們！此我們今日唯一生存之路也。

二〇，十二，十三，

國聯調查團報告書駁議(一)

民國二十一年十月載於時代公論
第三十一號第三十二號第三十四號

一

舉世矚目，國人切望之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全文業於十四日發表，全書共分十大章，巨數十萬言，首述中國近年社會政治變遷之概況，次論東三省與中國其他各部之關係，及日俄所佔有之經濟利益，最後提出認為可以調和國際利益，滿足日本要求之解決原則及條件，以建議於國聯行政院。長篇偉論，頗能自圓其說，鑒既往以定將來，據既成事實以求和解，誠不能不謂為國聯最近之傑作，而為調查團諸公苦心精構之產物矣。

在調查團諸公之意見，以為惟能調和國際利益，滿足日本要求，始可防止世界之大戰，並得促進中國之建設。

然則試問國際利益是甚麼？國際利益豈是單獨列強的利益麼？是不應該把中國的利益包含在內麼？假如不顧及中國利益，國民熱望，是不是可以促進中國的建設？又日本的慾望是不是合乎理性？他有無厭足的一日？設對於不合理而漫無節制的日本要求，若不予以嚴厲制裁，世界第二大戰是不是可以防止？世界和平是不是能夠達到？這些地方，調查團諸公似未加以注意，徒斷斷於調和國際利益，

滿足日本要求，而無理的對中國施以更甚之壓迫，對於破壞正義與和平之日本，從不欲設法制止。其公正平允之報告書，應出如是乎？竊思果依報告書之建議，假定國聯不加思索而採納，中國不得已而接受，其結果中國雖啓共管之開端，而國際利益仍不能調和，世界和平仍無所裨益。

何則？二十世紀國際政治的原動力，就是民族獨立運動，民族解放要求。舉凡一切大多數的國際糾紛，差不多都有這種新興勢力醞釀其間，因有這種勢力，故其發展之範圍愈廣，而其伸張之力亦愈大。凡討論國際問題者，或負擔處理國際事務者，對於這種明確的民族運動，而不給以有效的出路，國際糾紛，永遠不會解決。又日本人的野心，祇獨吞併東省或中國全部爲已足麼？否否，吞併東省，不過大陸政策的初步，日本人的最終目的，是在吞併亞陸，雄霸全球。此在田中的大陸政策，已明顯寫出，毋庸贅述。聰明而有理解的調查團諸公——田中對滿蒙積極政策的奏章一書，決不是中國人假造中傷的，諸位不要以爲日本人斷無如此野心，決不敢這樣狂妄。敢爲諸公告者，日本人的軍國主義，是祖宗一派流傳的，千年前的桃太郎故事，就是這個表現。日本人從小腦筋中都充滿了桃太郎遠征的印象，個個都欲以桃太郎自居。諸公今日再不急起直追，以設法制止暴日蠻橫，勢必養癰貽患。至東方愷散 (Kaiser) 出現，世界和平橫遭擾亂的一日，將必噬臍莫及矣。

二

因是，報告書提議之不能解決中日糾紛者明甚。其所以演成如此結論，厥由於開始之認識錯誤，以是循序推演，結果數十萬言之報告書，不特自毀國聯立場，直一無所得，不值半文錢矣。其認識錯誤之點有三：

甲、誤認中國民族復興運動爲排外運動

莫萊 (Morley) 說：『十九世紀政治上最顯著的運動，就是民族獨立運動。民族情感，並非新奇的事情；其所謂新奇者，乃將此種感情變爲政治的思想』 (Political History)

此民族獨立的運動，不僅在十九世紀爲政治上最顯著之運動，二十世紀支配國際政治之原動力，依然是這種運動。德意兩民族之統一運動、固然不出這個範疇，而構成大戰原因之重要部份，以及戰後世界各地起伏靡窮之紛擾與流血，莫不以民族復興運動爲其核心。埃及印度敘利亞摩洛哥等等皆是。故進步的政治家威爾遜氏早已看透這種傾向與趨勢，毅然提出以「民族自決」爲解決大戰之總清算。不幸其方案被頑固而有野心的政治家所擯棄，致第一次大戰之餘腥未乾，而第二次大戰之必來，繼又喧囂人口矣。

威氏提出關於媾和之原則，曰：

第一 人民與土地，不能如單純之動產或如將碁之碁子一樣，由主權者與主權者之間，任意授

受。

第二 與今日戰爭有關係之領土問題之解決，應以關係人民之利益爲主眼。

第三 凡一切明確的民族之希望，應與以充分之滿足，以避免其爲阻害世界和平，人類互相軋轢之新原因。

「民族自決」，確爲今日解決國際政治唯一的原則，任何人都不能否認。倘忽視了這個基礎條件，無論甚麼迎合列強意志，或認爲調和國際利益的方案，都不能造成國際永久的和平，也決不會達到人類共同的繁榮與向上。民族不問過去在事實上是如何構成，而今日於觀念上確具有特別意識——自我意識。民族固爲一定多數之集合，然係別具一獨立個性，而與其成員之個性又不相同。民族團體，爲具有個性，具有人格，具有自我意識的結合。因其有個性，有意識，所以有自由意志，自己可以決定自己的行動，與自己所應到達的目的；因其有人格，有價值，所以有權利，有維持自己生存之權利，保持自尊心與獨立自主之權利。坐是，凡具有明確意識的一個民族——在意識上具有個性之個我，自然而必然的要求與其他同樣民族，平等共立於世界。

這樣要求，是投與國際政治場裏的一個大爆彈，正如十九世紀人民欲脫離專制政治推翻王權的要求一樣，也正如勞動者欲分配企業利潤而同盟罷工的要求一樣。倘當時的專制魔王或頑固的王權神授

論者稍有一點的覺悟，不致因這個合理的要求而釀成許多流血的慘變，也決不會因要求不遂而給民衆處以斷頭的極刑。倘今日的資本或企業者具有相當的同情，決不致遍地發生許多罷工的風潮，繼而引起流血的不幸。今日國際政治的不寧，就是這個必然的砲彈從中作怪，並且時有攪亂世界和平危險。所以聰明的國際政治家，應該及早注意這些地方，以謀防患於未然，不應築堤堵水，致隄潰水決，決而無法防止也。

溯考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垂九十年，備受列強之侵略與壓迫。小者略而不論，僅舉其大者言之，自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之後，繼以一八八四年之中法戰爭，一八九四年之中日戰爭，一九〇〇年之八國聯軍進京。武力失敗，割地賠款，逼訂不平等條約，設立專管租界，並承認領事裁判權及協定關稅，於是內地遂有外兵駐紮，而內河沿海外艦外船得以橫行無阻。至此不特濬屬要港喪失殆盡，且將整個領土，弄到四分五裂。因有領事裁判權，致破壞我國之統治，因遍地設立租界，常助長我國之內爭。在捷足先得者，任意劃分所謂「勢力範圍」以擴張各自之權益；而未霑利益者，復唱導「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以爲對抗之工具。日人更得寸進尺，趁列強酣於歐戰之末遑東顧，提出所謂二十一，強迫要求承認，不惟到處設立警察，且自此以後，高呼滿蒙有特殊權利。

外國勢力之壓迫，既如此其甚，而十九世紀後半，正爲民族運動高唱入雲之際，中國人除非冷血

動物，或麻木不仁則已，倘具有民族意識而爲圓顛方趾的人類，無不崛起而要求獨立。莫不奮發而希冀恢復主權。中國民族所受之各種束縛，既係列強因自私自利而橫遭加害，則中國民族之復興運動，自不能不與帝國主義者相衝突。易辭言之，中國革命的對象，就是帝國主義，中國人民所受之一切壓迫，如軍閥官僚土豪劣紳等等，莫不直接間接以導源於帝國主義者也。中國人如欲解除此種壓迫，設壓迫者不自甘放棄，而被壓迫者祇努力反抗以底於成功而後已。

被壓迫而起謀抗爭，既爲自然之理，是故這個抗爭，決不是排外運動。中國近年來對外抗爭，都是民族復興運動中所應有之現象，絕不能與排外同日而語。這種覺醒運動，正包含着建設的努力，不獨欲挽救中國已衰之厄運，並欲樹立新中國的楷模，使東方固有之文化道德，得以發揚光大，以增進人類的幸福。該報告書中有一段，正道着這層意思：

「新中國之民族主義，爲中國在此過渡期中，所應有之現象。無論何國，若在同樣地位，莫不有此國家思想與願望也。凡一個民族既有國家統一之覺悟，自然願欲脫離外界之束縛」。（見報告書二十三頁。）

諸公既知「中國在此過渡期中，新中國之民族主義爲所應有之現象，且無論何國，處此同樣地位，都有此國家思想與願望」，諸公爲何又硬把中國民族運動視爲排外運動呢？不客氣的講一句，今日

中國的環境，都是列強所造成，今日之紊亂與不統一，全係列強之罪，帝國主義者所慣用的手段，就是分治統率，使被壓迫者自相殘殺，而自己從中漁利也。英國利用印度教徒與在印度之回教徒鬥爭，以減少印度民族之反抗，就是很明顯的例子，而中國之不能統一，也是遭受帝國主義者這個政策所影響，甲國嘗供給金錢以助此軍閥，乙國或接濟軍火以袒彼軍閥，使其互相火拚而從旁坐收漁人之利，過去事實俱在，調查團諸公試平心靜氣回憶之，當知余言之非誣也。

「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來，中國之特點，乃為政變，內訌，及社會上經濟上之恐慌。結果乃使中央政府日漸衰頹。所有與中國有密切關係之國，無不受其不良影響。倘不設法補救，勢必繼續危及世界和平，且為世界上經濟不景氣之助因」（同上十五頁至十六頁）。

直為因果倒置之語，不特喪失公平，且係滅却理性。事實擺在面前，而調查團諸公猶作此語，如非健忘，即為偏頗。

從公平的立場來講，今日之中國，既為一正在進化中之民族，所有其國民之種種生活，均是過渡現象（同上一五頁），則於此過渡期中——民族復興運動中，對於外國人民縱給有多少的損害，或對於外國所稱權益，縱使其蒙着多少的不利，此亦過渡期中所不能或免之現象。各國為國際正義計，為解放民族計，對於這種不可避免的偶發的事變，應抱着相互忍耐的精神，忍受暫時的痛苦，不應以偶

發的不幸，而動輒責着中國違背條約義務，斥中國之所爲爲排外運動的表現。

復次，中國今日的一切建設，當然需要國際友誼的援助，而且需要甚切，固不待言，是故中國近年，尤其是國民黨統治下之國民政府，對於友邦之進言，或友邦人士及在華外僑之勸進，莫不十二分的表示接受。中國政府，除每年選派留學生或考察專員赴外國作實地視察外，政府機關國營事業或各大學校，多延聘外國專家（？）爲顧問技師或教授，以資借鏡。一切事業，如行政法律司法教育衛生等……都有外國人士參預其間，以爲改進之幫助。其他郵政電報匯兌，莫不加入國際合作，以爲他山之助。至於民間事業團體之互相合作，更無論矣。在實際上中國近年新興事業之發展，技術之改良，以及科學之進步，都直接間接的受着國際友誼的援助而逐漸進展。國際合作，雖然是相互有利，而原以互助爲原則的，然中國對於過去國際間所給與之援助或合作，不獨十二分表示歡迎，而且衷心感謝，似此尙謂歧視外國人士，一切寓意排外，不願加入國際合作的論斷，若非惡意陷誣，卽爲盲於事實。

華盛頓會議各國尤其美國給與中國之同情與好意，中國非常感激，設各國尤其與中國有切要關係之各國，能一貫的繼續會期中之精神——同情於中國民族復興運動之精神，則在已往之十年中，當使建設新中國之工作，而有更具體之進步。不幸會議以後，各國不能完全尊重約束，履行諾言：如取

消領事裁判權一項，在開會時，各國均承認在原則上可以接受，惟對於最適宜之時期及實行之方法，意見稍有紛歧，倘各國誠能衷心的願意扶助中國之發展，則此微現分歧的意見，當然不難發現一調和之點，不至使中國因此而蒙受不利。奈事實竟有不然，各國於會議以後，或籍口法典之不備，或以秩序不甯爲口實，一再延宕，迄不放棄，終使中國國民年來之熱望，因以消失，而對於友邦從來所表示之同情，感覺懷疑與悲觀。良以法典之完備與秩序之安寧與否，乃一程度高下之問題，決不能以之爲放棄領事裁判權之絕對的條件也。蓋以中國近年法制之改良，法規之釐訂，司法機關之增設。法律人才之養成，進步迅速，雖不能與先進諸國並駕齊驅，然大致已臻完備。至秩序安否，更乏明顯標準，在外人管理下之租界之盜匪案綁票案，實不較少於中國其他都市或地方，特以其盜匪權攫租界當局之怒，而不敢以搶劫贖綁施之於外國居民留耳。此非不佞之妄語，有確實統計可資憑證。而號稱文明都會如東京紐約等尙常有劫案發生，可見秩序之安寧與否，並無絕對之標準也。而且外國人民多經營商業，多集居大都會，中國管理下之大都會之盜案，殊少發生，此秩序問題實不足以影響領事裁判權之放棄也。由此以觀，外國之不願意放棄領事裁判權也明甚，國際之無誠意幫助中國改革也又明甚，何得謂「中國因採取猛烈之排外宣傳，中致國際合作而解決中國困難之途徑遭遇阻礙」耶？（全上二四頁。）

乙 誤認「國民教育」爲宣傳排外

報告書更認爲排外宣傳，在兩點特殊之處，肆意爲之，以致助成發生現時衝突之形勢。斯即利用經濟抵制，及在學校內介入排外宣傳是也（全上二四頁）。

論介入排外宣傳於學校之點，認學校內之民族主義，卽爲宣傳排外之工具，繼曰：

「一九三一年六月，中國所頒布之臨時約法內，規言「三民主義爲中華民國教育之基本原則」。各學校內均教授孫中山博士之主義，其權力一等於前世紀之經學。孫先生之言論，其受人尊崇無異於革命前之孔子。然不幸在教育青年上，民族主義之建設方面，似不如其破壞方面，能得較多之注意。試一翻閱各校課本，卽使讀者感覺著書之人，罔以嫉恨之火焰燃燒愛國觀念；又欲於仇害之心理上，建樹人格。此種猛烈排外之宣言，初起於學校，繼用之社會生活上之各方面……：。此種態度，既乏有效之內政改革，或國家程度之增進，以爲之陪襯，徒使各國驚駭，對於現時藉爲唯一保障之權利，更增不願放棄之感」（全上二五頁）。

中國在教育上所採用的方式，當然脫不了時代色彩的影響。所謂「時代色彩」者，就是國家本位主義，民族中心主義。在此環境中的教育宗旨，及其應此需要的一切設施，各國不謀而同的齊以「國民教育」爲中心，人的教育，還在其次。日本小學校令第一條，標明小學任務係爲造成國民教育之基

礎，德意志的撒克遜邁雷根小學校令亦有同樣的規定，此皆以國民的立場來植育國民，冀能涵養國民精神，發展兒童之愛國心，以「愛護國家，獻身祖國」，為做人的第一個標準。

國民教育是甚麼？解釋或各有不同，但概括言之，就是國家把國民以國民的立場來教育，涵養國民的團結精神，激發國民的愛國心，在為人類服務之先，要絕對的為祖國服務。換言之，要造成國民的自覺。

茲進論我三民主義之教育為如何。十八年三月二十五日通過之教育宗旨如次：

「中華民國之教育，根據三民主義，以充實人民生活，扶植社會生存，發展國民生計，延續民族生命為目的，務期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展，以促進世界於大同」。

其實施方針有曰：

「各級學校三民主義之教學，應與全體課程及課外作業相貫連，以史地教科闡明民族之真諦，以集團生活訓練民權主義之運用，以各種生產勞動的實習，培養實行民生主義之基礎，務使智識道德融會貫通於三民主義之下，以收篤信力行之效」。

換言之，欲用嚴格之身心訓練，陶融兒童及青年「忠孝仁愛信義和平」之國民道德，注重實科教學，養成專門智識，生活技能，及增進國民生產能力，以期為國家為社會服務。

三民主義的教育宗旨，既如上述。其根本精神，以及近年教育上所採用之方法，與歐美各國之教育方針，適完全融合，毫無二致。就是以國民教育的立場，來教育全體國民。尊重固有文化，美德，及優良之傳統與習慣，鼓吹國民情感，喚起民族精神。並且關於國家體制及組織之智識，盡量授與，以促成國民之自覺。

近代國家的形成與認識，在今日歐美人士的心目中，或以爲不成問題，蓋彼等已完成近代國家必應具備的條件也。雖然，此亦不過時間上的說法，德意兩國統一之告成，迄今僅有六十餘載，十九世紀中葉，歐洲各民族內部分裂之情形，較中國今日猶有過之而無不及。德意兩民族之能完成統一，乃由於先哲非希特（Fichte）黑格爾（Hegel）馬志尼（Mazzini）及加富爾（Cavour）等鼓吹國民精神，提倡國民教育所致。菲氏力言涵養愛國熱情之方法，莫過於獎勵教育者，職是故耳。

中國今日恰如十九世紀中葉的德意兩國一樣。『此種缺乏團結力之原因，實由大多數之國民祇知有家族鄉土，而不知有國』（全上二二頁）的中國，欲使國民覺悟，增加國家觀念，更非從國民教育着手不可。良以『仍須有多數國民從國家上着想，方能有真正國民團結之可言也』（全上二二頁）。在民族競爭激烈的場裏，要保持民族的生存，國家的獨立，當然非採用國民教育來培養民族意識，國民精神不可。尤其在國際競爭最猛烈的如今日一樣，更有刻不容緩之勢。世界各國都經過這個階

段。今日歐美強國而擁有廣大之殖民地者，似在鼓吹世界主義資爲號召，而期減少治下異民族之分離運動。然此不過表面上用以欺人的世情，而其立國精神，仍站自己民族的立場，其教育骨幹，依然是以國民教育爲中心也。世界如是，其正在進化發展中之中國民族，又何獨不然？其正在發展中之中國國家，又何能不與先進國家同一步武呢！

要完成國民教育的目的，自然要盡量發揚舊有文化，光大過去光榮，追憶祖業宗功，保持繼續道德。惟能如是，方期國民感情得以興奮，民族特殊性格，因以造成。在消極上固可免掉民族衰頹，或被異民族同化，喪失獨立精神。在積極上可以發奮圖強，與其他民族角逐爭於世界。因此，在人類知識方面毫無價值之物，而於國民教育，尤其於民族教育，常視爲極有價值之物。如日本有一種「裸體祭」，祭祀時舉凡參與遊行，除生殖器裹以布帶外，全體赤裸，頭上縛以布巾，手持棍棒，猴叫鬼跳。此在吾人則望之作嘔，而日本政府則提倡不遺餘力，此無他，蓋冀以保存特殊傳統而資國民教育之助也。是歷史一科（廣義的），在國民教育立場上，關係至鉅，而三民主義教育之實施方針，以「史地教科闡明民族之真諦」者，係爲貫徹目的而應具之方法，斷非欲「圖以嫉恨之火焰，燃燒愛國觀念，又欲於仇害心理之上，建樹人格」也。且中國近九十年之歷史，都是戰敗，屈辱，割地，賠款，喪權之歷史，此種史實，在歷史地理之教材中，當然無可抹殺，以之教授國民，正與教授其他部分，

如張謇出使西域等意義相同，其非排外宣傳，固不待吾人之嘵嘵辯論也。其與日本教科書中，將滿蒙劃爲中國部分之外，鼓吹甚麼第一生命線，激勵人民對外侵略者，則相差爲如何耶！何以報告書不一言及之，真令人不能不認調查團之態度有失公正也。

試平心論之，關於激發國民愛國之努力與方法，中國今日之不及西歐者遠甚。吾人試一翻閱西歐各國之教科書，或學者著述，其鼓吹自己民族之如何優秀，自己民族生存之如何切迫者，到處不難發見。彼儕常以國家爲「人類最高團體」，而養成國民狹隘之愛國心。以仇視外人，爲獎勵愛國衝動之唯一手段；以向外發展，爲建國立基之根本精神；利用人類「交相妬惡」之感情；灌漑自利意識，利用人類「誇大狂」之根性，炫耀過去榮譽。所以歐美式之國家觀念愈發達，而世界阨隘不安之象乃益著。韋爾斯(H. G. Wells)說，滑鐵爐(Waterloo)戰爭之敘述，同屬歷史家，英國人的敘述與法國者顯然不同。英國歷史家則誇耀戰功偉大，國民武力優強；法國歷史家則謂係天亡我，非人力之不敵。一則誇稱國民強盛，一則歸咎於天，總不外各示其強各諱其弱也。(見The Outline of World History)。英之羅素(B. Russell)在其所著愛國心之功過一書，嘗言「英國人慣用仇嫉外國之卑劣手段，以獎勵其國民之愛國心。最初仇西班牙人，繼則仇法國人，繼則仇德國人，今後又不知將仇何國？」於此可見各國倡導國家中心主義在教育上之用心良苦矣。德國當一八七一年統一告成之後，俾士麥

(Bismarck) 欲維持聯邦之統一，減少國內糾紛，盛鼓勵國民向外發展，發揚大日耳曼主義。佔領非洲之鞏果 (Congo)，爲國民向外發展之根據地，而犧牲其他民族之獨立與生存。是西歐各國，尤其所謂列強，直可謂爲「排外」之國家矣。

再看中國之立國精神爲如何。中國自建國以來，一貫的以禮讓和平爲之立國精神，「忠孝，仁愛，信義，和平」是中華民族之生命。中國所有道德，均「以同情心」爲起點，利用人性「同類相親」之心，期造成大同世界。孟子曰：「離則不祥莫大焉」，荀子曰，「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嫉也，我將頓頓焉日日相親愛也」。此卽所以斥人類離析之不祥，而欲以人類之親愛心，維繫與發展彼此之關係也。孟子又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諸掌」同屬此意。蓋人類惟能相親相愛爲懷，則大同世界，始有達到之希望也。

人類情感原有「妬嫉」與「親愛」兩面，彼則利用妬嫉，樹立對外發展，唯啓發親愛，冀造人類和平，其誰爲排外，誰欲建樹仇害心理，又須何多辯耶！

丙 誤認中國之政變影響於日本之經濟利益報告書有云：

「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來，中國之特點，乃爲政變，內訌，及社會上暨經濟上之恐慌。此種現狀，所有與中國不密切關係之國。無不受其不良影響」。(同上十五頁) 又云：

「夫日本既爲中國之比隣，又爲最大之顧客，故因本章（第一章）所述之擾亂情形而受之損失。自較任何其他國家爲大，僑華外人三分之二爲日本人，而在滿洲之朝鮮人約計有八十萬之數，故日本人數，較任何他國爲多」。（同上三一頁）

照調查團諸公之意見，以爲近年來中國之特點，就是政變，內訌及種種之不幸的事件發生，使一切與中國有密切關係之國家，都遭受這種不幸事件的損害。而日本適爲中國之近隣，且日本製造品多銷售於中國，正爲與中國有關係之最密切者，因此其所遭受之損害，自比其他一切國家爲大。

中國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來，二十年間確爲幾多政變，內訌及種種恐慌事件所包擁，似與中國有關係的國家，尤以比隣的日本，都要受這種恐慌事件所發生的損失。固然，要說與中國有關係的國家，完全不受若何影響，固然是強詞奪理，若謂「所有與中國有密切關係之國，無不受其不良影響」，而尤以「日本所受之損失，自較任何其他國家爲大」者，亦屬過甚之辭。蓋中國雖經年內亂，然其內亂多屬偶發的事變，瞬間即熄，秩序恢復，故對於國際貿易，不致發生十分不良的影響，國家連年多事，農村秩序不甯，「富」與「人口」多集中都市，而都市原爲外國物品之匯集地，都市愈繁榮，而外國貿易愈因之而增進，近年租界之繁榮與舶來品之暢銷，亦頻發之內亂有以誘致之。且從某一點立場言之，亦惟有租界之護符與外來經濟的壓迫之猛烈，更足以誘引內亂之迭發不已也，

抑有進者，在此紛亂之二十年中，日本對於中國之貿易關係，誠獨無些微之進步乎？曰是又不然，該報告書第十章論中日經濟的關係，有一段如次：

「一九三零年間，日本出口貨物之總額，爲十四萬萬六千九百八十五萬二千元日金；其進口貨物之總額，爲十五萬萬四千六百〇七萬一千元日金。而出口貨物中之運往中國（關東租借地及香港除外）者，價值二萬萬六千〇八十二萬六千元日金，或合全數百分之十七點七。至其進口貨物中之運自中國（關東租借地及香港除外）價值一萬萬六千一百六十六萬七千元日金，或合全數百分之十點四。

上述事實及統計足以明示中日通商對於日本之重要。顧日本在中國之利益，益不限於通商一端；其在實業，鐵路，航業，銀行各方面所投之資本，亦爲數甚鉅。且於最近三十年中，所有此類財政經濟之活動，其發達之概況，已呈突飛猛進之趨勢。

一八九八年間，日人唯一重要投資，厥爲在上海與華人合股經營之小軋機一架，約值十萬兩。至一九一三年日人國外投資之總額，計有五萬三千五百萬元日金之多，而其中投於中國及滿洲者，竟達四萬三千五百萬九日金。歐戰告終之時，日本在中國及滿洲之投資，較諸一九一三年增至一倍有餘。……日本在中國及滿洲之投資，於一九二九年幾佔其廿一萬萬元日金國外投資總額中

之二十萬萬元日金」、(同上二頁至一八三頁)。

報告書既自認在此二十年間，日本對中國之貿易，並不因這種政變，內訌而有所減少，且於最近三十年中，所有此種財政經濟之活動，其發達之概況，已呈突飛猛進之趨勢。其於中國之投資，一九一九年較諸一九一三年增至一倍有餘，而至一九二九年則比一九一九年又增至一倍有奇，其對華經濟關係發展之迅速，直超過日本對其他有經濟關係之任何國家。夫又何得謂日本因中國之政變，內訌等所受之損失，自較任何其他國家爲大乎？此不獨報告書之前後矛盾者，顯而易見，其爲欲緩和日人之感情，而強嫁中國以責任者，於此可見一斑。

調查團對於中日間起伏靡窮，藕斷絲連之糾紛，而不洞燭其癥結之所在，不詳察日本懷抱之野心，一味歸咎於中國，始則曰，中國政變之有影響日本經濟利益也，繼則曰，經濟絕交運動之損害日本商業關係也。似兩國間自中日戰爭以來之葛藤，罪惟中國，亦惟因中國之政變，及爲維持民族生存而採用之經濟絕交手段，乃使日本至於不能忍耐而始出以武力的干涉，似其所出之干涉亦隱有不得已之苦衷在焉。故公然表示曰：

「日本既不能希望設有滿意之安全保障，以代替其條約上之權利，故自知無法可以滿足中國之願望，因其他各大國之權利漸形落後，遂使日本在華之權利，尤其在滿洲者日益彰著。日本對於在

中國之人民生命財產所抱之顧慮，曾使其疊次干涉中國內戰或地方上戰事。此項行動，向爲中國人所嫉惡，而以其干涉之結果釀成武裝衝突，如一九二九年濟南事件者爲尤甚。」（同上三二頁）

關於經濟抵制，容闡章專論，至中國政變之影響於國際貿易之爲如何微末者，上文已詳述之，是故日本屢以武力干涉中國內戰者，乃別有企圖，其表面上宣稱所謂保護僑民等等理由，不過借爲干涉之口實耳。

自事實言之，中國過去之不能統一，皆皆犧牲於帝國主義者之分治政策(Division of Rule)，尤以日本之搗亂政策者爲最甚。年來幾多之政變內訌，直接固由幾個野心軍閥與無聊政客所造成，間接無一不導源於帝國主義者之從中播弄。軍閥政客爲帝國主義者之走狗，仰承其鼻息以苟延殘喘，而帝國主義者則爲軍閥政客之太上皇，挾持金錢軍火以遂其操縱之私，彼此狼狽爲奸，於是乎中國之政變內訌，則有增無已也。

帝國主義者之分治政策，不僅加諸中國國民而已！對於一切弱小民族及殖民地。如英國之埃及印度，法國之於敘利亞，日之於高麗，荷之於東印度等，皆一貫的本此方針進行。其採取手段間或有所不同，而其目的則完全一致。目的如何，卽：

第一 使被支配者自相殘殺，不能造成強固的統一，期減少反抗的力量，維持並增進自己的權

益。

第二 利用被壓迫者之互相仇視，各援助其中某一黨一派，以引為帝國主義彼此抗衡之具。

日本之施此政策於中國者久矣，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來，日本惟恐中國民族之覺醒，形成強固的統一。日本在世界上原為後進之強國，當其位侶列強號召世界之時，所有富源及土地均被英法等掠奪殆盡，日本乃無從插足，惟有與其比鄰之中國，因國力衰弱，人民智識幼稚，遂成為其宰割之嚙肉。其立國政策，雖時有積極消極之不同，而其政策的中心厥為向大陸發展。大陸政策的代表，就是陸軍軍人，尤其為左右內閣政策之參謀本部，便是這個政策的核心。蓋日本一切外交方針之決定，都是受支配於國防計劃，而內閣政策，也就受支配於參謀本部。參謀本部在法律上的地位，雖不能支配政權，然而實際上政治作用，確可以左右內閣之成敗。

我們再從中國過去政策的事實來看，英之援助吳佩孚孫傳芳與日本之段祺瑞張作霖，釀成許多政變，都是盡人皆知的事實，其目的無非造成分治統率的局面，以遂其漁人之利。戴季陶先生在日本論上有一段話，茲引錄如次：

「民國五年的排遠運動，日本人是有很大大關係的。日本人何以要排袁，這是知道東方歷史的人所能了解的。」

在中日戰爭的時代，袁世凱駐在高麗，運用高麗的王室和政府排日。此後袁世凱當了政局，雖然一樣是拜倒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權力下面，然而却不是專一服從日本，而且時時要用遠交近攻的政策，這是日本人排袁的第一原因。當袁世凱的倒坍已成了必然的運命，便順着這一個時勢，扶植起倒袁的人來，也是他們操縱中國政權的機會。

爾後在南方扶植岑春煊唐繼堯而壓制中山先生所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岑春煊之回國，回國後之活動，軍務之組織，政學系研究系之聯合，此中關鍵，都在東京參謀本部。在中國中部，扶植張勳，以為後日督軍團運動和復辟運動的伏線。在中國北部，扶助段祺瑞以為後日掌握北京政權，及壓制黎元洪打倒張勳，對段參戰，中日協約種種問題的伏線。又扶植張作霖在奉天的勢力，以為此後幾次奉直大戰和此次奉軍南下的伏線而作來作去，就是不要中國統一，尤其不要中國統一於革命，不要統一於革命領袖中山先生。」（日本論一一四至一一八頁）

帝國主義者之何以如此作為，一言以蔽之曰，不要中國統一，不要中國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他們對於中國問題，事事壟斷，對於中國握政權的人，日誰不許來反抗他。凡與他們親善而願受他們宰割者，他們就去幫助，若與他們無關係而以中國獨立為前提者，他們必設法以排斥之，日本軍閥之必欲去張學良而後快者，也就是這個緣故。日本參謀本部的武官，遍布中國各處重要都會，各方面

的領袖人物，常與這些武官發生關係。他們在平時則散布流言，離間中傷，一遇局面變動，則縱橫捭闔，左右政局，是故中國年來之政變內訌，實受帝國主義者擺布之錫賜，尤其受日帝國主義者播弄之結果，今報告書竟謂中國之不統一而有影響於日本之經濟者，若非認識錯誤，即被日人之惡宣傳所迷惑，可勝浩歎！而日人民近更借報告書此段文字，大做其宣傳工作，一則曰，中國非有組織之國家，再則曰，中國之敵人爲華人而非外人，公然誣毀，目無德義，調查團諸公見之，當作如何感想乎？

總理嘗云：「中國不統一，最大原因，是中國人自己失却了自信力而甘心受制於外國。同時一個外來的原因，就是掌握者最大的兵力財力的外國人，以不平等條約爲工具，以中國人無自信力爲機智，而來中國搗亂。」

帝國主義者一面力造機會以求中國之不能統一，一面又斥中國之不統一而有有害於有關係之國家，良心何哉？不能自愧於衷乎？

調查團惟顧慮日人感情過甚，故處處易陷於只願事實解決，不求原因闡明的混沌的態度，於日本則寬大爲懷，對中國則吹毛求疵，除東北事變，因事變之本身已充分顯明無可規諉外，關於中日間此二十年來之糾紛，處處以中國爲責任的依舊者。此豈獨有失公正主張乎？若今後國際問題之解決，不

先探原因之所在，以定責任之誰歸，徒欲以敷衍因循的態度，保全自己的立場，則不特國際正義淹沒不彰，而國際問題愈將不堪設想矣。此有望於國聯當局今後之亟須矯正者也。吾人對於調查團所稱稜閱各種問題之態度：『對於已往行動之責任，注意較輕，而對於尋求方法以防止將來重生此類行動之必要，注意較輕』者，誠不能不引為遺憾，而於處理東北問題之際，涉及中國內政及排貨等問題，不特超越範圍，實際亦無此必要。徒滋淆亂條理，使世人對於中國問題多增一層惡感耳。茲退一步言之，假定中國年來內亂頻仍，日本就應出以強佔東三省之手段乎？調查團諸公既欲對中日問題作一總觀察，何以於上海事件及日艦砲轟南京之責任問題，竟輕描淡寫以置之呢！此誠使吾人不能不感於調查團之有偏袒於日本也。

五三慘案的禍首，田中義一奏章有云：

「按明治大帝之遺策，第一期征服台灣，第二期征服朝鮮等，皆既實現，惟第三期之滅亡滿蒙，以作征服支那全土之準備，則異族之南洋及亞細亞全體無不畏我而仰為鼻息云云之大事策，至今尚未實現，此皆臣等之罪也」。（田中內閣對滿蒙積極政策奏章）

果然出兵侵佔東北，組織傀儡政府，田中小子，死可瞑目了。此奏章如果是假的，何以如此湊合，難道中國人是預言家麼？狼子野心，調查團猶不置信麼？

丁 誤認抵貨運動爲此次衝突之原因及其與國民黨有關

報告書第七章論日本之經濟利益與中國人之經濟絕交，認日本國土小而人口衆，現在可耕土地之開拓及其耕植之集約，均已達最高之限度，既不能希望其生產較今日更爲多量之增加，亦不能望其能再行容納多量之傭工，故日本不能不採用工業主義，扶植都市人口之發達，以期得一銷售農產品之本國市場，並利用勞力製造貨物以供國內外之用。且欲使工業爲更進一步之發展，俾其增添之人口有僱傭之機會，則出口貿易之發展，與開拓能以吸收數量增添之製造品及半製造品之國外市場，益見重要。同時此種市場，亦可爲供給原料及食料之淵源。

日本過去之出口貿易，其主要之趨向有二，奢侈品及生絲運銷於美，約占全額十分之四強；而大宗以棉織物爲主之製造品則銷於亞洲各國，數量約略相同。此銷售於亞洲之貨物之五分之三，則爲中國關東租借地及香港所吸收，除關東租借地及香港不論外，日本運往中國之主要貨物，爲煉粉，煤炭與棉紗，而日本進口之中國貨物，則爲豆類，油餅及蔬菜乾等物。

坐是，中日經濟及財政關係之廣複，當可想見，因此易受任何紛擾原因之影響並易爲其所紊亂，亦至顯明。就大體言之，日本所仰賴於中國者，較諸中國所仰賴於日本者爲多。故遇有關係紊亂情事，日本較易受害，且損失亦較多（同上 一八〇頁至一八四頁）。

報告書繼續謂就中國商人銀行家及手工匠同業公所之組織而言，中國人素習於抵制之方法，已數百年於茲，晚近則利用全國抵制外貨，以爲對抗外國之政治武器，溯自一九〇五年抵制美貨事件發生以降，迄今顯著之經濟絕交，其範圍之廣遍於全國者，計有十次之多，而十次之中，對日者計有九次，對英者僅一次而已。

歷次經濟絕交運動，對於中日關係，在物質上，心理上均有極重要之影響，而尤以此次經濟絕交爲更甚。在物質上之影響，卽商業上之損失，日本商業統計，雖未免估值過高，然日本經一度之經濟絕交運動而所受之損失，殊屬可觀。至因經濟絕交而及於中日關係心理上之影響，較諸物質上之影響，更難評斷。然以其所引起日本大部份民意對於中國不幸之反響而言，其嚴重之程度，則不稍遜。調查團在日本時，東京及大阪商會，對於此點均極注重。

此次運動是否出於自動，抑係組織而成，在調查團認爲中國之經濟絕交既出於民衆，復具有嚴密之組織，雖係強烈之民族情緒所產生，爲強烈之民族情緒所擁護，然操縱之指揮之者，大有能發收能之團體在。至於實施之方法，誠於等於威嚇之處。在組織方面，雖包括多數各別之團體，而重要支配之機關，厥爲國民黨。

至在經濟絕交運動之行爲中，所採用之方法，是否始終合法。調查團認爲就其所搜集之證據而觀

之，此種運動，常有不法舉動施行，而當局與法院，則未能加以盡量之制止，因此，中國政府對於經濟絕交，不無含有責任。

最後調查團認為經濟抵制問題，爲舉世各國之利益計，希望應早加以討論，並以國防協約加以規定。（全上一八四頁至一九五頁）

據調查團以上之觀察及評斷，對於經濟絕交運動誠不無自相矛盾與偏袒日本之處，請駁論之：

報告書云

「願欲使中日衝突之敘述，臻於準確或完備之程度，猶須論及另一重要衝突原因，即中國人之抵制日貨是」。又云：

「歷次經濟絕交運動，對於中日關係，在物質上及心理上均有重要之影響，而尤以此次之經濟絕交爲更甚」。

依此說法，似中國之抵制日貨，實爲中日衝突之另一重要原因，蓋以其使日人蒙受經濟損失，而有害於日人之情感也，此不特倒果爲因，且議論自陷於矛盾。

茲先從第一點言之，宇宙間大凡一種事變發生，除偶然者外無不各有其誘導發生之原因，由此原因而造成某種必然之結果。吾人研究各種問題，必須結果以探求原因，溯原因以斷定結果，科學之所

以發達者，職是故也。就經濟絕交運動而言，中國過去之抵制日貨，誠有九次之多，然每次運動發生，胥有其必須發生之原因存在。如一九〇八年之抵制日貨，係由辰丸事件所引起，吾人試一檢查該此事件之內容如何，則抵貨運動之應否發生，及中國政府所負責任之限度如何，當不難明瞭也。

一九〇八年二月，日本船辰丸私運軍火，在澳門灣內被中國軍艦檢查發覺，當由廣州海關扣留，依照一八九六年中日通商行船條約，中國乃將該船舶與貨物沒收，該約第五款後段有云：「如日本船舶違反章程，到中國別口非係准停泊之港，亦非准通商口岸，或在沿海沿江各處地方，私做買賣，即將船貨一併由中國罰充入官。」日本船舶既然違反約章，私販軍火，則中國之扣留與沒收，是行使該條約所規定之權利，毫無疑義。而日本適當外戰勝利，一敗中國，再破俄國之後，態度非常強硬，不但不肯認錯，反要求中國政府即時釋放辰丸，賠償損失，對於掉換日本國旗，改用中國旗而並要求謝罪。

斯時中國政府見日本態度如此強蠻，為避免事件擴大計，乃提議將本件交與專為適用海關規則而設置之混合裁判所裁判，或另付託仲裁，在中國總督與駐劄該地日本領事會同之下，由英國遣華艦隊司令官草爾提督（Admiral Moore）仲裁，此項提議，極屬正當，因中日兩國均為海牙和平處理國際紛爭條約之署名國也，然對於中國慣用強硬手段之日本，不惟斷乎拒絕，且嚴重通告中國，謂不得完全滿意，決不欲假借於仲裁者之手，更於三月五日，由日本公使手交覺書於中國政府，以命令的字

句，暗示其爲最後之通牒。中國政府不得已而讓步，對於日本一切無理要求，均予承認。長九即時釋放，處罰視爲有責任者之中國官吏，在辰九拋錨附近，於日本領事面前，由中國軍艦鳴砲謝罪，並由中國政府賠償沒收兵器費五萬三千法郎，及辰九因逮捕而受損失費三萬一千法郎。一切飛來橫禍，於以終熄，一切都是中國的不是，日本人可以不遵守約章，中國則連正當權利亦不能行使，賠款謝罪，忍辱含羞，此何故歟？公理乎！曰否否，強權之力也。

事件經過如此，日本政府態度之蠻橫如此，事實擺在面前，孰曲孰直，誰是誰非，民衆類能判斷。中國國民之情感，受此刺激，遭此侮辱，凡屬圓顛方趾而具有血性者，孰能不憤恨填胸，思將振起以報復之乎？日人之侮辱中國，蔑視條約者，直使任何國民不能忍受。此種以強國威臨弱國之態度，若中國民族性稍有一點存在，其繼而引發相當之反抗者，亦勢所必然也。是故中國人之抵貨運動，實日人慣用之高壓政策有以激起之，亦中國人遭受之重大侮辱而出於無可奈何之消極報復運動也，亦中國之欲使日人澈底覺悟而採取之應懲手段也。日人之高壓政策者，因也，中國人之抵貨運動者，果也，有因始有果，理所當然，如中國之抵貨運動爲不當，爲侵略（日人謂中國以抵貨侵略日本），則日人之動輒出以高壓手段者究爲如何？『剃頭頭的兒子自己好』，吾人固不必強辯，且看世界公論如何，拉或黎爾（J. Laforet）在所著抵貨運動與國際法論中有云。

『讀者諸君！這件抵貨運動（因辰丸而起者）的執拗，及誘發事件與本運動之不平衡，大家不要驚慌，蓋辰丸之事件，僅不過抵貨運動之誘因（Cause Occasional）耳。其真因乃是對於日本專橫所爲的憎惡，恨徹骨髓的侮辱，日本從來的態度，及其欲霸天下之野心而給與中國有侵害獨立之恐怖等等。中國某有力者曾聲明曰：『我們情願中國成英國化，或俄國化，但是排斥日本化。蛟龍不遇的中國，過去雖曾受各國之欺凌，然他日必有爪牙張舞之時』。如上所述，則對於強國暴虐無道的愛國心的反撥，正是中國各地抵貨運動之特徵也』（Lafarriere Le Boycottage et le Droit international dans Rovne Generale L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Tome 55）。

此不過僅指因辰丸事件而發動之抵貨而言，其他每次抵貨運動，都有與此相關聯之重大事件，而出於日本無理之要求或加害，使中國國民至於忍無可忍之地步，然後運動於以發生。是每次運動發生，其責任惟在日本，中國則不過受壓迫而起之反動耳。一九〇九年之抵貨運動，因日本強索安東奉天間之鐵路敷設權而未逞，竟對中國政府有最後通牒，其起因惟在日本，固不待言。一九一五年日本乘歐戰機會，向中國政府提出舉世所無之二十一條要求，遂激動中國人民公憤，起而抵制日貨，一九二〇年係因日本強佔旅大，延不交回，一九二五年日本在上海之紗廠，慘殺工人，行爲狠毒，不顧人道，一九二八年中國革命軍正出師北伐，日本畏其成功，乃出兵阻撓，造成空前之濟南慘案，一九三

一年日本更接連造成韓民慘殺僑胞，唆使萬寶山韓民暴動，繼以中村事件爲口實，出兵強佔東省，此皆爲造成抵貨運動之原因也。觀此，中國人民每起一次抵制日貨運動，必先受有日本之侵凌一次，此點在報告書確已承認，吾人固不必費辭以贅也。報告書有云：

「如將此種經濟絕交運動，詳加研究，則知每一運動之發生，與某項確定事實，事件，或事變有關。此類事件，概屬政治性質，此常爲中國所認爲與其實質之利益有礙，或與其民族之威望有損。是以一九三一年之經濟絕交，係直絕因同年六月間萬寶山事件及七月間韓人之屠殺，方始發生，而同年九月之瀋陽事件及一九三二年一月之上海事件，復使之變本加厲。每一次經濟絕交均有其本身可稽之近因」（同上二八六頁）。

日本每次對於中國交涉，其態度蠻橫，直目無中國之獨立國家，凡遇問題發生，不論誰是誰非，必先對中國施以壓迫，使任何國民不能忍受之程度，不惜採用種種手段，奸詐欺騙，最後非達到交涉勝利之目的不止。設此種待遇加於其他國家，則國際戰爭必立爆發，而中國國民之採用排貨抵制者，乃反抗中萬不得已之最消極手段也。若以此而有害於日人之情感（同上一九一頁）或爲不合睦誼（同上一九四頁），則日人對中國之種種惡辣手段將爲如何乎？日人之行爲又豈止有害華人之情感與不合睦誼而已耶？一九一三年日本大地震發生，中國全國人民正熱心集資捐助之時，東京郊外大島地方忽慘

殺我國僑工會長王希天先生及僑工數百餘人，日本人之狠毒，可想而知，迨交涉開始，日本委爲韓民暴動，雖經調查，一再遷延，終成懸案，查慘案發生時爲九月七日下午，離地震後已六日，戒嚴解除，秩序恢復，韓民何有暴動？據內幕者言，乃日本憲兵及警察所爲，埋屍滅跡，當地人民及餘生僑工所目睹，其目的蓋欲以此減少華工計也。綠地震前一二年，日本對於僑工，壓迫備至，尤以警察干涉特甚，至地震後，日本不惟干涉而已，乃嚴禁工人入國，此豈合睦誼乎？且有違反兩國間之條約也。抑有進者，日本明治二十八年之勅令，排斥華人入國，難道不是侵犯國際條約乎？其狡辯如日本人者，又將何以自圓其說？

總之，中國以抵貨運動，實日人自造之，此因不除，則排貨永無終止之日。倘日本如欲中國人民不抵日貨，惟有大澈大悟。一反以前之行爲，立刻取消偽組織，交還東省主權，排貨運動，自會立即消滅也。若日本仍採取武力政策，中國如一日不亡，亦必採取經濟抵制以相扼峙。

準上所述，則知中國之對日經濟絕交運動，實因民衆遭受日本侵略之結果，至爲明顯，且報告書亦承認『一九三一年之經濟絕交，係直接因同年六月萬寶山事件及七月間韓人之屠殺，方始發生，而同年九月之瀋陽事件及一九三二年一月之上海事件，復使之變本加厲』（同上）一八六頁。是報告書所云：『願欲使中日衝突之敘述，臻於準確或完備之程度，猶須論及另一重要衝突原因，即中國人之抵

制日貨是」，若非敘述錯誤，則爲自陷於矛盾也。

復次：報告書論經濟絕交運動，是非出於自動，抑係組織而成，乃「認爲中國之經濟絕交既出於民衆，復具有組織，雖係強烈之民族情緒所產生，爲強烈之民族情緒所擁護，然操縱之指揮之者，大有能收能發之團體在。而此團體厥爲國民黨」（同上一九二頁）然中國之對日經濟絕交運動，既如上所述，係日本多年侵略政策之招致，自不能以運動具有嚴密之組織，即斷定其重要支配之機關，即爲國民黨。溯自科學發達以來，一切團體，無論政治制度，或社會團體，其組織莫不日臻完密，此爲受科學訓練之結果，亦可說二十世紀的人，都富於組織性。抵貨運動既欲達到其目的，當然非有嚴密完備之組織不可，具此運動既係強烈之民族情緒所產生，如報告書所云：「設無一堅強之民衆意識爲基礎，欲一民族表現爲支持一地區廣闊，時間久長之經濟絕交所必具有之犧牲與合作精神，顯爲不可能之事」（同上一九二頁）則此運動之核心、厥爲民衆自身、一切組織，亦爲出於民衆之自動，決非民衆以外之任何團體的強制所能發生效力，亦非國民黨利用中國人民舊時同業會館及祕密團體傳統之心理與方法、以指揮經濟絕交，事理顯明，事實具在，而報告書偏欲將抵貨運動與國民黨拉在一處，則調查團諸公之昧於事理，忽於事實，於此可見一斑。國民黨員亦爲中華民國之一份子，其受人侮辱，當然要起而反抗，吾人不能因其爲國民黨黨員而有抵貨運動之行爲，即斷定國民黨爲該項運動的操

繼者，更不能因此而斷定政府含有責任，今日中國，無論任何團體，任何黨派，除共產黨外，都參加抵貨運動，都一致反抗日本，更決非國民黨之單獨政策也。調查團諸公，須知抵貨運動，為今日中國國民之自衛手段，為民族求生存之唯一途徑，有何可以非難哉！

一 兩不討好的國民代表會

二十一年五月載於時代公論第八號

國難會議於禦侮救災綏靖之外通過了一個重要政治制度改革案，就是請政府設立中央民意機關，曰「國民代表會」。他的職權是議決預算決算公債及重要國際條約，他的產生方法是由各大都市職業團體及各地方人民，所選出之代表三百人組織之。惟國難會議之議決案不能拘束政府，本案欲使其發生效力見諸實施，尚有待於中央執行委員會之通過。聞中央業已付諸討論，贊否各有其人，在野之政治家都發表意見，以備政府採納。在全國人民不與聞政治不討論政治的今日環境當中，有這樣新興的異力來突破這種沉悶的空氣，誠不能不歸功於國難會議給大家一條開展的道路，正如陶希聖氏所說的「爭出政治上方向轉換的道路出來」。（見時代公論第六號）

然這種國民代表會——並立於黨治之下，祇握有不徹底的財政權的國民代表會，就國民黨的立場

觀之，或就國民的立場之日，是否有即刻設立之必要，倘如設立，則其前途如何？結果如何？以及其影響於將來之憲政如何？實有從長探討之必要。

二

先自黨的立場言之。此可分二方面來觀察，第一，從國民黨的理論，第二，從黨的訓政與國民代表會的矛盾。

第一、從國民黨的理論：國民政府建設程序，分爲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軍政時期是政府以武力掃除國內障礙的時期，爲要建設一個新國家，當然非先以掃除障礙着手不可。訓政時期爲訓練人民之憲政知識與啓發誘導民衆在政治上之興趣，以及辦理行使憲政與發表民意上所必須具備之基礎條件，如調查人口測量土地等等工作的時期，蓋能如是，則他日之憲政庶可暢行無阻。憲政時期就是實行憲法政治時期，亦即政治改革完成之時期，此後政權操諸人民，人民爲政治上之原動力，故必須有國民大會或國民代表大會以行使中央統治權；坐是以觀，國民代表會必須於憲政時期始能設立者，非特建國大綱規定至明，理論亦屬一貫。

論者或以爲或太拘泥於理論，而不知將理論隨實際政治狀況而運用。然此言似是而非，關於此點我不能不稍作詳細的說明。

訓政時期 總理視為建國程序中最重要之時期，亦即國民黨必須實行黨治之點。彼於建國大綱中痛切申明曰：「不經訓政時期，則大多數之人民，久經束縛，雖驟被解放，初不瞭知其活動方式，非墨守其放棄責任之故習，即爲人所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繼曰「訓政時期之宗旨，務須指導人民，從事於革命之進行，先以縣爲自治單位，於一縣之內，努力於除舊布新，以深植人民權利之基本，然後擴而充之，以及於省，如是則所謂自治，始爲真正之人民自治，異於僞託自治之名，以行其割據之實者；而地方自治已成，則國家組織，始臻完密，人民亦可本其地方上之政治訓練，以與聞國事矣」。然則革命何以必須如此進行，何故於軍政之後必須經過訓政，又何故必須訓政完成始能召開國民大會頒佈憲法實行憲政呢？請申論之：

原來中國的革命，並非一般民衆覺悟之結果，而革命後政治制度之必須採用民權組織者，亦非一般民衆之所要求，乃先知先覺者鑒於世界情勢國內狀況，知非革命不足以圖民族之生存，知非實行民權不足以立足於世界。總理在三民主義有言曰：「我們在中國革命，決定採用民權制度，一則爲順應世界之潮流，二則爲縮短國內戰爭」。然民權制度是以人民爲國家之主人，以民衆爲政治上之動力，故必須人民親身參加政治願意參加政治以及能夠參加政治，則民權政治有真正意義，制度機能始克運用靈敏。倘若不然，儘管先覺者如何呼號，而一般民衆若置若罔聞，其結果若非呼號變成流水，即

實現亦僅徒有其名，蓋民衆自身原無民權政治之覺悟，而又強欲其實行民權政治，此種企圖若非緣木而求魚，必爲畫虎不成終類犬耳。此所以有訓政之必要，而訓政時期實爲實行民權政治之重要關鍵也。

或以爲我之言太不顧到事實，而將以下之言來詰問亦未可知，曰：「歐美民權革命成功之日，即產生議會制度，無論其形式或內容如何，皆是以人民所選出之代表來組織議會，而監督政府參加實際政治，歐美即可行之，我們又何必一定須經過一種訓政的時期呢？」然此種詰問未免太過於皮相觀了！蓋問者祇見到表面所浮出的事情而未洞燭這些事情的內幕。歐美革命成功之後，固然即刻實行憲政，並未經過訓政的中間階段，然實行憲政而參加政治之民衆，即爲當時斬木爲兵揭竿爲旗的革命民衆本身，當時的革命是他們所發動的，反抗君權解放民衆是以他們心坎中發出口中呼號出來的，殘暴壓迫的君主是他們送上斷頭台的，民主政治議會制度是他們熱烈要求的。他們既然得到勝利，他們當然要求參加政治，正所謂「成者爲王」之結果矣。試再進一步論之，請看當時的革命民衆是何等人物呢？他們當時自稱第三階級而以別於第一階級之僧侶及第二階級之貴族，（註）他們自從中央集權國家成立與產業革命發生以來，在社會之勢力蒸蒸日上，富力天天增加而已凌乎貴族之上，他們的物質生活比貴族更舒服更奢侈，他們的知識他們的學問在在足以與貴族相抗衡；因其如是，他們自然不願屈居

於貴族之下而要求革命，革命既告成，他們當然要求參加政治，何況其實力又足以參加政治呢！試觀當時採用之限制選舉制度即可知矣，當時的選舉資格是以教育與財產為基礎條件，凡具有一定之財產與受有相當之教育者始有選舉權，就是明明說須與他們有同樣財力與知力之人始能參加政治，而非將政治界與一般下層民衆者；易言之，他們所主張的民主政治是以有財有知的人來參加的民主政治，而非以人或人格為本位的民主政治。此種政治，自今日視之，固可警議，然在當日情形而有不得不然者，蓋一般下層民衆既無民權政治之覺悟，而又無參加政治之能力，縱畀以政治上之權利，然亦不欲來享受，縱或享受亦不得其享受之道，此正猶之腹之未飢而強與以食物之為無益而有害相等也。故我嘗言「制限選舉制度」，在當時不特甚為必要而且深有意義。至歐美今日所採用之普通選舉，係一般下層民衆經過數十年政治教育與權利訓練而覺醒之結果，同時他們亦熟悉其運用之妙法，故實行以來，機能發揮自在，政治日趨光明。我國則如何？承數千年專制政治及「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之政治思想之後，大多數人民皆缺乏政治常識，不知國家為何物，政治為何物，選舉如何運用，民權有何利益，今若一步登天，不待訓政之完成，而即欲實行採用普通選舉及惟在憲政時期始可實行之國民代表會，令人民即刻參加實際政治者，其為躐等也孰甚，其不可能也明矣。

（註）封建制度推翻，中央集權國家成立之後，諸侯已漸失去政治上的勢力，迨至產業革命發生，諸侯所有之富力都漸移向平

民權主義與德謨克拉西兩者性質不同，其實行方法故有如是之差異，理所當然，毫無足怪。今以國民黨之立場論之，若舍棄此基本理論而不顧，爲欲敷衍異黨緩和異派之反對針，爲欲滿足一部分人士之野心計，而驟於訓政時期設立國民代表會，在理論上固自陷於矛盾，在實際上顯係自殺政策，是可爲，而對於取消黨治之要求又有何不可承認？若以爲今日除國民黨之外再沒有擔負國家大事的黨派存在，國民黨祇得勉爲其難仍肩鉅任，此言實未免小視天下，若日己不克支持而又強不欲去，有失其政治上的紳士態度。所以國民黨如不願意放棄自己主張——黨治與訓政，斷不可於此時召開國民代表會。

第二、從黨的訓政與國民代表會的矛盾：全國代表大會及其閉會期間之中央執行委員會爲國民黨的訓政時期之最高指導機關，國民政府受其委任而掌握統治權，一切政策之執行均受其指揮與監督；換言之，國民政府是由國民黨所產生，故國民政府必須執行黨之政策，必須對黨負責。政策原是多方面的，而政策之實施必有賴於財政之先導，今國民代表會既握有財政權，則黨的一切政策必要受其控制，以有訓政之必要，國民黨的執政始有合理性之基礎，若一面要訓政，一面又事事受人宰制，則國民黨根本既陷於理論的矛盾。姑以實際論之，如雙方對於問題之意見能夠一致，不問理論上之矛

盾如何，在實際上固可含混渡過，如雙方意見相違，由國民代表會與政府之衝突，勢必變成國民與國民黨之對抗。而受不信任之政府——政府之預算案被國民代表會否決後——之去留又成爲問題矣。此點薩孟武氏在「怎樣解決國民代表會與訓政的矛盾」一文，（見本刊第六號），說得至爲詳盡，爲節省文字計恕不多言，這種矛盾與衝突，是絕對不能解決的，而薩氏所提供的解決，是言而不能行而無意義的。蓋政府的預算案若被國民代表會否決之後，政府仍可將預算案交中央執行委員會議決以求一疏通之道，然後再定政府之去留或國民代表會之解散與否，則以下之結果必定發生。

（甲）在事實上，國民黨對於自己所委任之政府，對於執行自己所定政策之政府，一定出於袒護的態度，若如此而國民代表會所有之重要職權之預算權必等於零或近於零，這不是說國民黨不公正，蓋對於自己選出之政府，其信任程度一定高過於國民代表會，其所以袒護者乃理之當然也。縱國民黨是聖人再世，絕對大公無私，而其對於自己的政府之財政政策一定非常諒解，政策原無絕對好壞，惟因此諒解之念一生，而審視國民代表會之意見，必發生毫釐千里之隔矣。然人類並非絕對理知的動物，判斷之構造難免不滲雜以感情，倘再加上感情問題，則前途如何，更有不堪言狀者也。

（乙）國民代表會既擁有預算權，政府之預算案自然可以任意削減或變更。如已受削減或變更之預

算案仍須交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通過，如國民代表會之變更案被中央執行委員會否決之後，國民代表會必須解散重，問民意所在，則國民代表會不特其財政權等於虛有，而且年年有被解散之可能性。

(丙) 政府之整個政策既要遵中央執行委員會之命令，政府之財政政策復須受國民代表會之監督，然一國之財政政策如何，與其整個政策至有關係，兩者也可以說是絕對不可分離的，當此時也，政府究竟是迎合那一個意志好，真是二姑之間難為婦了。政府若欲避免衝突，勢非敷衍彌縫不可，結果必定一事無成，其於訓政固無益，而於國民則有害。諺云「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政治之最高組織原來要一元的，政策始可實行，主張於以貫徹，試視今日各國之政治制度，除美國（註）有時議會與政府各屬一黨外，其他各國斷沒有這種二元式的組織。有人或以為這種問題在實際不致發生，殊未免過於樂觀，請看中國今日之政況如何，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雖然能夠始終保持意見一致，而各地黨部與各地方政府則時常發生齟齬，互相攻訐，然各地黨部與各地方政府統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所產生，以其來源相同而且同立於一個旗幟之下尚有這種現象出現，何況國民代表會與全國代表大會之來源不同而各有各的背景呢？

所以我說這種矛盾與衝突是沒有方法可以解決的。黨治與國民代表會兩者，正猶水火之不能相容

，如要行國民代表會，自非取消黨治不可，如不放棄黨治仍舊實行訓政，則不能夠談國民代表會，若謂兩者可以並行不悖，實不啻「三教同源」一類之主張耳。宗教本是絕對排他的，故歐洲有因宗教信仰而發生極激烈之鬥爭，中國人對於儒釋道三教既能認為同源，更有甚麼東西不能「冶於一爐」呢？

（註）威爾遜第二任大總統之晚年，就有這種現象發生，當時政府屬於民主黨，而議會屬於共和黨，兩相對立，致威爾遜禪讓心力所考察之國際聯盟，議會竟不予批准。國際聯盟之組織，原是美國提出的，而美國至今仍未有參加，於此可見對立式政治組織之不真也。

三

再從國民的立場言之。此亦可分二方面來觀察，第一，從社會實際情況，第二，從民意機關的國民代表會。

第一 從社會實際情況；從今日社會實際狀況言之，真正民意機關是否有設立之可能性，不無疑問。民意機關如要設立，其構成此項機關之份子——代表——應如何產生，當為首先討論之問題。國難會議之議決案謂「國民代表會之代表由各省區人民選出之」，然以中國今日之現狀而論，是項代表能否依法如期選舉，無論何人自不能不發生疑懼。蓋以中國幅員之大，若非交通機關設備至相當程度，決不能實行真正普通選舉，若人口調查之工作未完竣，誰是有選權者必無法可以判別，土匪遍地

，商賈裹足，少數軍隊經過尚有繳械之虞，誰又敢去辦選舉？誰又願去投票，國民代表會當不能將江西一省除外，究竟誰是江西人的代表，充其量亦不過南昌九江等市之游民式的紳士階級耳。殷鑒不遠，去年國民會議之農民代表，有離開鄉井數十年而從未與農民謀面者，如詢以農民的要求是甚麼？恐彼必瞠目閉口無以對矣，再以農民本身論之，農民知識幼稚，目不識丁，決不能參加選舉，農民飢寒困逼，求生不遑，亦不願來參加選舉。去年國民會議時太平門外一帶農民，由農會派人請至中央大學來投票，他們迨票投畢而仍齊集空場鵲候，喧嚷嘈雜，至晚不散，後問以何故？他們齊聲曰：「他們——候選人——請我們來投票，連一碗麵也不給我吃，倒要我們辛辛苦苦跑來一趟，不管我們忙不忙，下次這個還幹呢？」我是辦理選舉之一人，這是我親眼見的，事實勝過雄辯，難道不是一個絕好的明證麼？

以上專以農民申論，蓋中國大多數人民都是農民，自不能不以農民為主也。至中國工人，其智識淺薄與生活窮困實與農民相等。

總之，在國民方面，今日不能成立代表會，亦不要代表，事實如此，無可諱言。倘若贊成論者不顧以上的事實而強欲設立國民代表會，除尋找族譜（註）來偽造選舉有權人的名冊以外，再沒有其他辦法，沙上建樓閣，風吹必倒台，倘如不信我，且看大風來。

兩不討好的國民代表會

兩不討好的國民代表會

一三四

(註) 聞說浙江某縣在民元選舉參議兩院議員時，把祠堂族譜和廟宇石碑上的名字抄出來，作為選舉有權者的名冊，因為辦理選舉人一時想不出許多名字來假造。

第二 從民意機關的國民代表會： 國民代表會之職權，是議決預算決算公債及重要國際條約？假定國民是需要民意機關，是否僅具有這種跛形式財政權的國民代表會，人民即可滿足。民權國家乃是人民的國家，人民縱不能享受全部民權，如林肯之所主張：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政治，最少須依照人民之意見為人民利益而統治，即使過渡時期的民意機關，也必須有這種最少限度的權限。蓋既曰「民意」，則財政以外之民意是不是要上達政府？既曰「人民利益」，則財政以外之人民利益是不是應該主張？故不欲設立民意機關則已，如欲設立民意機關，須具有立法權質問權，其以人民之意見而反映於代表會之實益，始能達到。如若不然，政府要把郵資加價也好，懲治盜匪條例延長也好，人民徒有代表會而不能干涉，實行鴉片公賣也好——兩湖豫皖都設有特稅局，災民十六省祇發一千萬賑債也好，人民徒有民意機關而不能將民意上達政府。此而曰國民代表會，此而曰民意機關，直等於給兒童的竹兵木馬一樣，非欺騙民衆而何？

試退一步論之，有人說各國民權發達的順序，人民之有參政權，都是先拿到財政權，然後再拿到立法權。請論者不要忘記一二一五年英王約翰承認之大憲章 (Magna Charta) 有「凡徵收租稅不可不

經國民全體之同意」的一條，及其後之權利請願書（註）（The Petition of Rights）與權利章典（Bill of Rights）亦有同樣之規定，却爾斯一世之被議會判處死刑，是因他爲着了蘇格蘭事件要徵收船舶稅（Ship Money）未得議會通過竟目領軍使入下院之結果。可見財政非僅豫算決算公債而已，故欲要拿到財政權，非將財政立法權亦拿到手不可，若僅議決預算決算及公債，而關於財政立法事項，如徵收新稅變更稅則等等都沒有，結果所謂監督財政亦不過有名實無耳。若論者以公債較租稅更重要，故令代表會有監督政府發行公債之權，目因此項公債多使資產階級——銀行界——負擔，爲使此監督有效起見，更令都市之代表要等於地方之代表，此言殊未免太偏於都市之資產階級。第一，中國今日國庫之收入，是以田賦爲大宗，政府動不動就要創立新稅，增加稅率，浙江爲欲實行建設，田賦增收建設費；最近爲軍用起見修築長興至廣德之道路，又另加田賦特捐。第二，即以公債而論，今日公債的負擔者決不是完全靠着都市，每次發行公債一部分是向各地方農民攤派，而且銀行界的承受是有折扣，而農民所派受者都是十足。

（註）權利請願書有「不得議會同意不得向人民徵稅」，權利章典有「不得議會同意增加賦稅視爲非法」之規定。

如要設立國民代表會是否都市代表至少須占全數之半，關於此點，原提案既是如此要求，而副署的梅思平氏更屬堅決主張，此言是否合理，不得不略述一言。國家收入來源尤其國內公債是集中於大

都市一說之謬誤，上文已略加說明，不欲贅論。關於民衆知識一點，若謂國內知識份子，都市比鄉村多，或係實謂都市人民之知識比鄉村社會更高，此言未必盡確，中國人的理想生活是以田園爲歸宿，故陶淵明有「田園荒蕪胡不歸」之語，山林隱士，代有傳人，臥龍崗之諸葛亮，卽一明證。此風現在雖不如昔時之盛，要中國人民終未脫此理想，何況今日政治混亂，一般滿懷經綸之士，多有不願奔走權貴之門，磨居塵囂之市乎？或詰以中國今日土匪橫行，有知識者安敢逸居林泉呢？是又不然，此等士子雖不敢深居山林，要亦不願磨居塵囂擾攘之都市，而多匿居於縣城或較大鎮市之中，然論者之所謂都市當非包括此等城鎮在內也。抑有進者，都市人民的知識或係多而高，而都市人民的不良知識也比鄉村高且多，何況近代都市又是流氓分子之匯集所呢！我們不要單記得鄉村的土豪劣紳，而忘掉了都市的洋奴與買辦啊！

國民代表會既是民意機關，務使全國人民意見充分表現，自不能以知識爲選舉制度之基礎。都市的知識份子是否能洞察農民之利益，雖不必十分顧慮，然國民代表既是代表國民全體的利益，不是代表各個個人的利益，又何必定要都市代表至少須占全額之半呢？民權政治決不是要把特殊能力之人，除外，但國民代表也決非要求個個都是有特殊能力的人，祇要在少數特殊有能力的人指導之下，而有理解之民衆爲後援，實行其民意政治可耳。馬及尼氏有言：“The progress of all, Through all,

under the leading of the best and wisest”。

代表之選舉，有主張職業代表制與地域代表制兼採並用者，兩者之利害如何，贊否各有其人，理論問題，姑不具論。就中國之實際情況而言，中國之職業團體，大多數是有名無實，會員甚少，由極少數人操縱把持，同一職業而相互又不能和衷共濟，故以中國今日而採用職業代表制，實不無危懼也。

四

綜觀以上所論，此種國民代表會——並立於黨治之下而惟有議決預算等權之國民代表會，無論就國民黨立場言之，或就國民的立場言之，今日均無需乎設立也明矣。今日國民的要求是甚麼？全國異口同聲曰：「安定與秩序」。他們並不要求政府理想的積極的政策，如何如何的設備，他們只要求能「安居樂業」，他們就可以「仰事俯畜」。此最小限度辦不到，遑論其他。

北伐告成，內戰繼起，兵匪遍地，民不聊生，政府苛捐雜稅，罔恤民艱，人民流離失所，不謀救濟，今日之國民，不特唯「貧」而已也，半數以上之人民幾頻於餓死狀態，似此而若不速以根本講求救濟，徒高談民意機關，直舍本求末之計，結果非至同歸於盡不止。中國年來領導民衆運動之輩，一談民衆運動，即欲辦理民衆學校，設立民衆閱報所，而學校則無民衆來讀，報紙則無民衆來看，蓋以

兩不討好的國民代表會

其不知民衆痛苦而下藥不對病症也。然則救濟之道爲何？曰停止內爭，肅清匪共，扶助人民生產，努力訓政建設。

我的意見是國民黨還有二年的訓政期間，應使其務於此期間內完成訓政之必要工作，完成憲政之基礎條件，第一，不要分散國民黨訓政的力量。第二，不要舍本揣來的弄到同歸於盡。

最後尙有重要一言，就是國民黨要速行取消黨禁。在此期間除極左之共產黨與極右之復辟派外，無論何黨何派，須讓其自由活動，公開主張，一則可彙成健全之政黨，以備憲政時期之用；二則可分任訓練人民政治知識之工作。民權政治是以黨爲前提，亦惟有健全之政黨始能實行民權政治。黨爭——標明主張，以「口」與「筆」爲鬥爭之工具；並不是壞的事情，最壞的是「以槍相抗」。

人心不同，猶如其面，而人各有志，志自不同，政黨之發生，乃人類因利害相同而團結之結果，若任其發展則有益，如阻其行動則生害。柳宗元論封建制度曰：「封建者，非聖人之意也」，余曰：「政黨者勢也，非任何權力之所能阻止也」。今後之政治，要把社會的中心勢力，「以槍桿移到投票」方向去，此尤賴於政黨之作用也。

高考及格人員的呼聲與考試制度

二十一年八月載於
時代公論第二十號

日前第一屆高等考試及格人員朱雷章等，呈請中央政治會議一文有曰：

『竊自奉府令分發以來，多數機關，均未按照府頒規程依次任用，疊經呈請國府暨行政考試兩院予以維持救濟在案。乃在再數月，迄無辦法！最近各機關藉口政治之更張，非特有缺不補，投閒置散，甚且隨意罷免，無故停職，前途茫茫，殊不堪問。』

湖自考試院自十七年成立迄二十年，籌備經營，歷時三載有奇，始有全國各省檢定考試及中央第一屆高等考試之舉行。檢定考試自二十四年四月至六月，各省市區次第舉行者：有長江流域七省，黃河流域六省，珠江流域閩滇桂三省，東三省及熱察綏寧青五省，暨京滬漢平青威哈七市區。計各地應考者四千餘人，錄取者百餘人。第一屆高等考試，則於同年七月中旬在首都舉行，分普通財務教育警察外交五組，歷時一月，錄取百名。統計公家方面，高納考試直接動用經費，連各省市區檢定考試經費在內，約國幣一百二十萬元，又三年來，考試院籌備所費，約國幣一百十萬元，共費國幣達二百三十萬元，私人方面，四千餘檢定考之應考人，及二千餘高等考試應考人，食宿旅費約七十萬元。公私所費，達三百萬金。

不意考試甫畢，政潮遽起，羈延數月，勉獲分發任用規程之布，其敝用無論較之政府當局舉行考試時之諾言，已有上下床之別，即揆之現任公務員甄別審查條例，亦覺待遇維奇。此最低限度

之任用，各院部會仍未能切實遵行。及格人員之分發京內者五十餘人，其分發各省者亦四十餘人，被分機關當局，除少數賢明長官及與及格人員者特殊關係者外，每以最低待遇，隨意位置，畜魚於樹，棲鳥於泉，閒散曠廢，比比皆是。規程中所定，以薦任官儘先實授試署者，始則有缺，懸而不補，繼則出缺，另補他人。及格人員之派在某司某科者，非特他司他科有缺不予敍補，即本司本科有缺，亦不予敍補。反之，長官之親故，要人之姻婭，一紙八行，翩然而來，欲薦則薦，欲簡則簡。雖一時無缺，不難沒法調委開缺以補之。尤以國府改組之後，職務之更調紛紛，各院部會每週呈薦職官無慮數十，固未嘗於銓授之際，顧及及格人員徘徊下筆，甚或乘國難之機會，藉緊縮之名，停職者有之，罷免者有之，而干謁倖進依阿取容之徒，乃得取而代之焉。以數千餘士子競爭拔擢之結果，曾不如一親故口角立談之提挈首屈如此，二屆三屆可知！高等如此，普通特種可知！政府昔日所稱海內外聞風爭相磨厲者，今將望然鄙而棄之，復歸於奔競請託趨炎附勢之途，影響所及，豈特考試制度將永無確立之日，即最近中央整飭吏治注重治本之決議，政府登庸禁止干謁，罷免須憑考核之命令，與夫黨國諸公用人行政只計人才不問黨派之宣傳，皆將爲有識者所齒冷矣！』（以上係節錄）

第一屆高等考試錄取者不過百人，而實際薦補者據聞尚不及三分之一，首屆如此，誠然將來可知

！前據調查概計，中央政府，薦任官數近一千，合各省足有五六千人之多，（實際上或不止於此，因調查尚未普遍也），較及格人員之僅有百數，相距何啻天壤，且自去歲分發以來，迄今已十閱月，若各機關長官能誠意薦補，固何待彼儕今日之呼籲哀懇憤激陳詞耶！政府甘食諾言，長官藐視法令，其錄而不用者，或用而不當者，又豈及格人員個人之損失與不幸而已耶！

我國今日政府之用人，誠如呈文所云：『舉凡長官之親故，要人之姻婭，欲薦則薦，欲簡則簡』，一憑長官之自由選擇，而缺乏一般的客觀之標準。世人之有譏此種政治曰「血統政治」者，其言雖近於刻簿，要亦描盡政府用人之實態，與美國從前之所謂 Spoil System 者，正復相若也。

事實誠然如此，但在考試制度未實行以前，此法殆無可避免，而且爲用人之唯一方法，吾人固不必嚴格非議。唐宰相崔祐輔答帝問曰：『若非親戚朋友，何從知其賢不肖』，職是故也。惟一旦設立考試機關。舉行考試，同時以「政府用人專憑考試」之意，昭告於天下，公布「以及格人員儘先叙用」之規程（註）則，政府爲自身威信計，遇各機關之有官吏出缺時，應將及格人員，儘先叙用。政府的威信，要靠政府自己來確立，倘政府言不有信，行不顧法，徒責公務人員之不得譏評政府設施，其於確立威信裨益何！今日阻礙政令之施行，伊誰之咎，望政府痛省之！

註：十八年國府公布之公務員任用條例第八條（尚未施行）及二十年公佈之第一屆高等考試及格人員任用規程第一條第二條。

★ ★ ★ ★ ★

一國之政治，不外「事」的方面與「人」的方面。事的方面，便是國家行政，如財政外交交通之類，人的方面，便是掌理事務的官吏，如科員科長司長之類，兩者相互結合，政務始能運轉，配置適宜，運轉能靈敏。關於前者，必須將一國應行之職務，視其時代需要，用合理的方法來分類，在可能的範圍內，配置恰好之機關。迨分類既定，其個個事務，以及進行方針如何，又必須以法律規定之，庶有一定標準，行之者既有所準繩，運用更不致因人而廢，法治勝過人治的意義，即在於是，惟此涉及組織方面，與本題無關，姑不俱論。關於後者，須視事務之性質如何，而以相適之人去配合，使以適當之人，執行適當之事，擇以適當之才，置於適當之用，所謂「爲事擇人」，「適才適所」，意存乎是。能如此則所事始有進步，個人得以發展。蓋個人之性質與興趣，既因天賦而各有不同，各人所具技能，復因其所習而彼此互異者也。孟子說：「徒法不能以自行」，行法不惟要人，並且要適當的人，中國今日之不能成爲法治國家者，行法之不能勝任，實其重要原因之一。此而爲因，政令施行阻礙，威信不能確立，而政治則愈趨愈亂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也就是這個意思。豈獨政治如此，天下凡百事，莫不相同，若以書生而耕田，縱田盡膏腴，未必即獲佳穫也。然則適當之才，果將何由而產生之？曰惟有「考試」而已。考者考查，試者試驗，考查其所學，

然後試驗彼是否符合所需要之標準。此考試之結果，利益有六：

(一) 合於爲事求人的原則，進而造成專家政治。

國家之所以用人，原爲辦理國家事務起見，既非增加某個人之羽翼，亦非怕國民之沒有飯吃，用人必先以事務爲標準，然後以此去求適當之人。惟國家行政，萬緒千頭，分門別類，職各有專；而人之才學，既不相同，個人志趣，彼此互異，欲使兩者配合得宜，祇有行考試以測驗，庶能人盡其才，才適其所也。

(二) 拔取真才，爲國服務。

在考試制度未實行以前，政府用人勢必由於「薦舉」，或由個人介紹，或由團體薦舉，姑不問何種，第一，須舉薦者有力量，第二，須被薦者與推薦者認識。如缺乏第一條件，推薦不生效果；如缺乏第二條件，個人縱有「登天本領」，亦徒喚奈何。觀諸今古事實，昔時所行之「由郡國薦舉」者，多門閥爲標準，故所薦所舉者，「唯能知其閥閱，非復辯其實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然寒士」(註一)，今茲所介紹者，若非親故，即係門徒，不問才學，只論瓜葛，於是所謂選賢與能之意，蕩然無復留存者也。故欲拔取真才，爲國家服務，惟有實行考試而已。

(三) 國家用人，其有客觀標準，不致隨長官之喜怒好惡而進退

高考及格人員的呼聲與考試制度

今之法治國家，在於國家一切措施及國民行動範圍，有一客觀的標準，治者及被治者均有所適從，不致因個人之主觀而有所變異。考試制度在於用人行政而有一客觀的標準，以免去長官之主觀行為。是故考試制度，謂為國家用人行政之法治主義，固無不可，今日我國不欲實行法治則已，若欲依法治國，用人自非厲行考試不可。試觀今日世界之法治先進國家，孰不以考試為用人之標準（註二），遑論設立專院以司其事之我國乎？

（四） 人人有平等參加國家事務之機會

考試制度之目的。乃是「祇論人才優劣，不問代族尊卑」，無論販夫走狗，布衣寒士，皆有平等上進之機會，皆有憑藉自己能力以求上進之機會，「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一語，最能道明此義，縱係名公子孫，亦必藉此以為榮階之路，「裴子野有云：『天下無生而貴者，是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代族，雖名公之子孫，還齊布衣之士』。世有論「中國永久世襲貴族政治之破壞，實係考試制度之恩賜」（註三），余更進而言之：考試制度者，實為國民參加國家行政之民權主義，蓋廣義的參政權，應包含有人民「參加官吏公職」之權利在內也（註四）。此種民權主義，我國今日雖未實行，過去則有數千年光榮之歷史，總理嘗以我國古代政治哲學凌駕厥美而以之自豪者，職是故耳（註五）

(五) 杜絕夤緣請託之習

政府用人，既憑推薦介紹之一途，則無論所學如何，才能如何，勢必奔走權要之門，夤緣請託；趨附炎勢之下，干謁鑽營，結果有才者不屑爲之，而庸碌者得以倖進。而爲主管長官者，每日受求職者之包围，苦無位置以應付，所事既無法推行，精力徒消耗於接見，似此而欲政治清明，政府廉潔，烏可得乎？倘若實行考試，此弊縱不能完全絕除，當可減少大半。

(六) 造成廉潔政府

機關用人，既由某一長官個人之主觀而決定，此長官之去職，全體職員勢必隨之而去，此乃理論上自然之結果，而後任長官決無必須承認前任長官個人私意之責任也。若謂國家之機關，應有連續性，職員不應隨長官個人之去留而進退，則機關之職員亦不得隨長官之私意而任用，此又爲當然之邏輯也。實際上今日政府用人，來隨長官來，去隨長官去，正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宦海猶如走馬燈」。因其如是，職員感於地位之不安定，咸存五日京兆之心，所以在職一日，凡有財可取者儘量取之，儲爲他日失職生活之用，結果貪官污吏，充滿政府機關，賄賂瀆職，報紙連篇累載。揆其原故，實由於用人之未經考試也。蓋不考試則職員無保障，無保障則地位不安定，不安定則自易於貪污。是故造成廉潔政府，惟有實行考試而已。

以上略論用人依據考試之利，所以世界各國，不論政體爲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亦不問制度爲兩權三權五權，其用人必依考試，升遷悉憑成績，其有不然者，惟絕無而僅有之我國耳。倘不經考試，則孰爲有能，孰爲無能，既漫無標準之可言，真才便難保不因之而埋沒，假令政府用人，一秉至公，絕無援引私人之意，而亦先苦無法知悉孰爲有能之人。結果優劣顛倒，庸愚倖進，國家之事務，既無法以推進，同時人才復遭淹沒，國家個人，兩受損失。是故考試制度，在消極方面，爲防止人才淹沒，以免釀致社會之不平，在積極方面，可以甄拔真才，爲國服務。

〔註一〕文獻通考選舉考。

〔註二〕White, Civil Service History of England, 1884. J. Goodnow, Comparative Administrative Law' 2 Vols, 1893.

〔註三〕高一涵著政治學綱要第十四章三五三頁。

〔註四〕G. Jellinek, System der Subjektiven Offentlichen Rechte.

〔註五〕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第四講末段。

自純理論上論考試制度之利益，已如上文所述，須就中國實際社會及其病態考察之，尤覺欲澄清吏治，造成廉潔政府，肅清亂源，昇政治於正軌，非立即實行考試不可，其重要性與實行法治之要求，正

復相同。

溯我國自清末以遠，用行政既失去客觀標準，而產業落後，人才復集於政界，故社會上形成兩種現象：一爲「人浮於事」，二爲「事浮於人」。因謀事之人，往往不能勝任，致現有之事無人辦理，便發生事浮於人之現象。若係單純事浮於人，正是用人之機會，惟因人浮於事而有許多事件仍辦理不通，則政府能率既低，政治愈陷於混亂，是故今日欲政治走上軌道，必設法先肅清政治亂源，始克有濟。其法惟何？當不外以下二點：

提倡產業，增加位置。

實行考試，適才適所。

前者超出本題範圍，姑略而不論。然則何以實行考試制度，便可以肅清亂源呢？試申論之。

第一，青年學子，正屆學成出校之際，首須解決者厥爲職業問題。十載寒窗的苦學，當然希以問世，父兄節用培植，更望子弟而能行，所以謀事之心，倍增急切。倘謀而有成，一切可以解決，所謂「衣錦還鄉」，載榮而歸，父母歡心，親隣屬目。如所謀不就，不特個人懊喪，歸家尤無面目，於是蠅集都會，逆旅爲家，東奔西投，徬徨無所。遇有間路可尋，不惜千方百計以營之，所求之結果如何，仍未可料，徒損有用之精神，虛糜少年之壯志，馴致不平之聲，瀰漫社會，失業之浪，突奔市城，似

高考及格人員的呼聲與考試制度

此國家安有不亂？社會奚望能安？返觀我國今日社會，正復如是：學生自畢業後，居家不上半年，縱父母不加催促，親隣亦咸以「爲何不出外謀事」相詢問，倘在家一年二載，親友必笑其無能，蓋因政府用人，徒憑援引，欲獲此援引，惟有出謀之一途也。是故彼等爲環境所逼，當然不能株守家園，安心靜候，明知出外無益，爲避親友之譏笑與詢問，非藉名謀事而匿居都市不可，今日政治中樞所在地，謀事之滿坑滿谷者，亦由於是。

然則何故致此？曰，無他，考試制度之未能確立是也。倘政府用人，專依考試，彼儕自然可考試正途出身，畢業而後，爲準備次屆考試，仍可家居用功，毋須奔趨權貴，夤緣請託，而親戚朋友，亦不以爲怪，蓋皆知其預備考試及第之後，始能獻身爲國服務也。清代考試制度之弊害，吾人固不能否認，然其社會之賴以能安者，自不容一概抹煞不顧也。

第二，彼此廝集社會，遊手好閑，心旣不平，走又無路，同病相憐，相在吸引自易，怨天尤人，彼此如同轍。於是終日聚會，高談闊論，批評政府，發洩悲憤，因謀事之人愈多，而所聚者愈衆，由所聚愈衆，而醞釀之事亦愈多，或組織團體以求活動也，或祕密結社以求出路也，皆在計劃之中；甚或辦小報，終日罵人，出刊物，冀圖煽惑；於是團體愈多，組織愈衆，而社會之亂源，亦隨之而層出不窮也。

青年者，血氣旺興，性情好動，爲發洩個人之精力計，不專於此必事於彼，其組織團體之始，或無搗亂之陰謀，惟因其好動而純潔，往往所組織之團體而爲他人所利用，結果則貽禍於社會。倘考試制度確立，彼等明知考試爲進身之階，自不得挺而走險以謀出路也。

抑有進者，政治上最緊要之祕訣，便是「公平」二字，不公平則各種紛亂以起。今日用人，既漫無標準，勢必發生不公平之現象。一面既多倖進之徒，而懷才不遇之士，自然積憤填胸，彼等爲發洩積憤計，往往不惜利用種種手段，以與政府對抗，其最後之目的，仍不外推倒現政府以謀己身出路耳。試觀今日我國團體形成之由者，即可知其大概矣。

第三，更就政府當局者論之，今日每逢長官登台之際，除直接面求位置之外，各方之介紹推薦者，動輒累百盈千，而一機關所可補用者，少則十數，至多亦不過一二百，於中採取，選擇爲難，一面既須考察被薦者之才能，他方復須顧及推薦者之勢力，避重就輕，強爲安插，所謂「爲國服務」之意，反不能顧。

不特此也，現有人員既無法安排，而各方介紹仍源源不止，雖經登報一再却謝，奈謀事者之不憚煩勞，於是長官終日爲求職者所包圍，應付耗擲精神，致所負之責則未克達到，爲害國家，莫此爲甚。美國從前有一位大總統，當就職之日，與要事者握手而至手腫云，Spoil System 爲害之烈註，當

可想像及之。

又介紹之來，一紙八行，不問誰何，一律曰「品學兼優」，「辦事幹練」。實際是否兼優，不得而知，辦事是否幹練，更無從知悉，甚至介紹者，一面未謀，輾轉相託，及既用之後，品既不善，學亦不優，幹練更談不到，介紹者既不負責，萬一發生差池，惟長官受其累耳。

次就介紹者方面言之，因其制度如此，凡具有介紹之能力者，否之，凡是一個人，都有人找你介紹，竟無法可以推辭。此種應付，想無論何人，都同有此感。

以上都是造成今日政治紊亂之源。其所以致此者，厥為用人不依考試之故，是今日之確立考試制度者，固不僅為國拔取真才，造成廉潔政治而已。

馬端臨在文獻通序有云：

「至於隋，而州縣僚屬皆命於銓曹，縉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勸籍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勸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無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濫者愈不可澄汰，亦復何哉？」

觀夫以上所言，其考試制度之影響於政治前途者爲如何，可以見矣。

（註）美國於一八七一年未實行公開競爭考試之前，一國官職，盡爲政黨之掠奪品，所謂「誰勝利誰來分贖」(To the victor belongs the Spoil)、Spoil System者，由此得名。

至於考試制度本身有無弊害，國家用人是否皆依考試，以及考試及格者是否即可任以薦任官之職，容後再論。

法治國家的真諦

二十一年七月載於時代公論第十七號

一

人治法治，在人類歷史上鬧了幾千多年，時至今日，世界上無論那一國家都是實行法治，而中國仍不能確立法治走入法治軌道，真堪痛心。然而今日信仰「人治」的人一定居少數，一般國民悉皆以爲建立國家祇有主張法治，改革政治祇有實行法治，排除國難祇有尊崇法治。

近來要求制定憲法實行憲政之聲浪，瀰漫中國全土。所謂憲法也者，係具有制限的性質之物，即將政治的權力之上設定一種制限，其擁有政治的權力而從事於一社會之支配及經營之政府，惟有在憲法範圍以內始能行動，是故憲法政治，非尙人治乃法治也。然則中國今日之不能實行法治者，其故安

在？因未制定憲法而缺乏行動之準則歟？抑有其他根本原因歟？我人於此不能不下深切之考察與痛切之反省。

中國雖無成文之憲典，而有實質等於憲典之憲法，遠者如民元約法天壇憲法，近者如政府之約法保障人民權利等等規定。此外如規範政府行為之各種行政法規，雖不能說應有盡有，然亦相具規模，儼歷來政府能尊重之推行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兢兢而不敢稍有所違，何嘗不可走入法治之軌道，奈國人明知故犯，上下一心，視法令如弁毛，以守法為笨伯，狗情權變，視為大經，縱私枉法，恬不足恥，致今日頒布之法令明日即成具文，法規彙編固多一條規，而國民心理則毫未留有痕跡，設此根本不去，國家縱有憲法之發布，政府一切行動縱有法律之規範，不特無補於實際，恐永遠不能走上法治之路，此我人所敢斷言者也。

一一

怎樣叫做法治？怎樣纔算得法治國家？拿班特 (Talard) 說：『法治國家之特徵，要在「國家對於人民，非依據法規不得要求作為與不作為，亦得有命令與禁止」中求出來』。這個定義分析起來就是：

第一，最高權力所有者的國家，其行使權力非依據法律不可。

第二，國家的法律不特要拘束個人的國民，同時且要拘束政府的統治者；統治者如有違法行為致使個人的權益受侵害時，被害者的人民可以提起訴訟，要求公平之裁判。

三

職是之故，法治主義的第一個原則，就是「人民不觸犯依正當手續所制定之法律則不為犯罪，不依法律不得逮捕監禁審訊或處罰」。即先有法而始有犯罪，基於法而始得處罰。

孟德斯鳩說：「國民的政治的自由，就是各人自以為安全而生的心的安靜之謂」。然國民如何能獲得「心的安靜」，要如何始構成犯罪，法律如何處罰而有明白的規定，怎樣可以逮捕，怎樣纔能監禁而有客觀的法律？不特此也，這種法律不問誰人都要一律遵守，不論治者被治者要同等待遇，所謂「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我國的舊刑律與現行新刑法，原有同樣的規定，而實際上亦在實行，但政府為便於應付起見，往往以架空之罪名而陷人於罪，軍閥時代稱為「辦亂黨」，革命政府名曰「治反動」，詢其所謂亂黨，則含義模糊，實以反動何義則晦澀難解，人民對於政府之意見，無論其歌功頌德或直言規諫者，政府當令其有自由發表之機會。凡一切反對政府之議論，自不能一律視為惡意的詆毀與漫罵也。

一個國家非屆非常時期，不得隨便宣布戒嚴；不在戒嚴的時期，不能停止普通法而適用特別法，

尤不得將普通人民交付軍事裁判，這是法治主義應當遵守的原則。近觀中國今日則如何？動輒以軍事爲名宣布戒嚴，盤詰行人，檢查行李，使人民感受種種之不便。而且不在戒嚴之時，對於政治犯或其他的嫌疑者，往往不依正當手續而遂行逮捕監禁，不經正規法定而遂行審問處罰。軍事法庭，軍法會審，已成普遍之現象，似此而言法治，烏可得乎？

軍事裁判，手續誠屬簡單而敏捷，但簡捷而要不得冤屈人命纔是應該，審判之手續過於簡捷而欲其不有冤屈者惟恐未必，刑事訴訟法規定手續之繁複者，特恐過簡而有草菅人命之危險也。

實在說起來，審訊官司決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一個複雜而曲折的案件，倘法官不能平心靜氣的苦苦探求，反覆尋思，很不容易審得水落石出；此猶之科學者探求真理一樣，若非詳細觀察，思索考究，亦不易覓得一個結果。中國人最大的毛病，是不忠於職務，尤怕事件麻煩。遇到事情就是馬馬虎虎，含糊了事，犯人最好是提到就槍斃。

中國年來除爲內戰而冤死者外，以強盜共匪等等名義經政府處死者，若有確實統計，殊足以駭人聽聞，我敢說中國半年中所殺的人數，要比世界上各國合起來一年所殺的更多，而中國所殺的大多數都是二十歲以上四十歲以下的青年中年，正爲一國生產界之生力軍。

「亂世用重典」此我國古代政治家之遺言，亦今日當局之奉爲金科玉律者也。然亂源不澈底肅清

，而且製造有加不已，重典有何裨益？屠殺有何效力？今日招兵，明日遣散，土匪安望減少？

四

復次，法律不特要拘束人民，同時要拘束政府，而人民權利被政府損害時要有方法來補救；此而如不能做到，亦不能稱為法治國家。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以及人民相互之關係，今日都有法律規定；以言土地一項，有土地法土地收用法等，但政府之收用土地，是否準是而行，不無疑問，不佞月前返里。鄉民羣相告訴，謂『政府此次爲抵抗暴日起見，在長興縣東門外建造飛機場一所，當收用民田數百畝，分文未給補償，軍令如山，誰敢曰否，強迫遷徙，莫可奈何，然在國難方殷淪戰正酣之際，人民之毀家紓難，固其義務所在，政府給價與否，固然不成問題。迨後停戰協定，暴日宣言撤兵，機場於以不用，建造工作亦止，惟既不用而又不予發還，人民一再要求，政府置諸不理，春種誤期，空過一年，政府無益，人民有損，甚謂縣政府傳稱須原主每畝出洋十元或七元始能領回云』。此種傳說之荒唐，吾人固未敢深信，第異口同聲，不能全謂無因，在今日情勢之下，個人權益之不能給有效的法的保障者，亦係顯然的事實，例證甚多，毋庸縷列，此不獨有損國家之威信與個人之利益，其關係之大，乃足以影響社會全體之福利。中國今日實業之不發達，而國家不能給與企業者以有效的法律保障者，實其重要原因之一。資本家懷資而不敢樂投，企業者裹足而不敢前進，馴致百業凋零，生產衰

退，此而爲因，更使社會不安，政治紊亂，致有效之法而不能推行，因果循環，遂釀成今日之局面，然則答將誰歸，試申論之。

五

率直言之，中國今日之不守法者，爲首就是政府。法律之不能確立威信者，責任亦在政府，原來『王子犯法，庶民同罪』，惟中國祇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誰都知道今日貪官污吏充斥盈廷，革命的目標原是要打倒貪官污吏，革命政府也三令五申的要懲辦貪官污吏，在制度上爲檢舉審訊迅便起見，設立監察院專司彈劾，設立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專司審判；更嫌普通法院之迂緩，置懲治貪污專庭以便從速處理，復恐司法官之不明行政現況，而於專庭中置政府代表以爲司理之助，政府之用心，可謂至矣盡矣！無如制度自制度，事實自事實，貪官污吏自貪官污吏，訓政四年從未見辦有多少貪官污吏，某某因貪污之控案過多，而政府特易職他調，某某因瀆職被監察院彈劾而去職，然不久又爲政府之最高機關所用，報紙喧騰，事實俱在。據聞監察法之表示，各地所送到之彈劾案積壓如山，因政府不能實行，而且不能提出。監察院成立迄今，所提出之彈劾案，僅不過撤職幾個縣長而已，似此而言造成廉潔政府，似此而談法治國家，自欺乎？欺天乎？

一國之財政監督，預算決算最爲重要，此盡人皆知，毋俟贅述。中國今日法律上有豫算編造條例

，監督機關有審計部等，據理而論，各機關應切實遵守，一力奉行。然實際上試問有幾許機關之決算，送至審計部審查，請查審計部之收發文簿，當不難一目瞭然也。

各種應有之法規，大都已制定頒布，前已言之。若由法律製造之發達狀況言之，中國可謂已走上法治的正軌，至細察實際則有大謬不然者，其故安在？政府機關之不肯努力奉行是也。「法之不行，自上犯之」，這是先哲鑒於政府之不肯守法而思有所諷誡，中國今日之法律，大半在僵臥狀態，而無生動潑刺之效力者，亦由於此。「法治不立，政府之罪」，老百姓是不能負甚麼責任的。

是故要造成法治國家，不在制定法律，而在實行法律，要走上法治道路，不靠編訂法典，而要靠奉公守法。

法律貴乎實行，望公務員勉之；

知之不能行之，實明知而故犯。

國營事業之我見

近代國家之強盛如何，要視一國產業之發達隆興與否以爲斷。故中國今日欲謀國家之富強，必先設法開發利源，積極講求生產之道，使國民全體富量增加，所謂民富則國自強也。然如何利源方能開

發，如何產業始能進步，則資本之來源及經營方法，又必須首先決定。

關於此點，總理鑒於歐西生產方法不良，釀成資本主義專制，勞工遭其剝削，政府受其控制，生產之利益徒爲少數者所享受，致使社會全般感受不安之現象。乃主張以「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爲生產之二大政策，以「民生」爲社會一切活動中之原動力。其目的固不特欲增加社會全體之富，並欲使此社會全體之富而爲社會全體人民所有也。故於節制私人資本之外，並且要積極發達國家資本。彼曰：『中國不能和外國比，單行節制資本是不足的，因爲外國富中國貧，外國生產過剩，中國生產不足，所以中國不單節制資本，還要發達國家資本』。又曰：『中國人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特殊階級，祇有一般普通的貧……可見中國通通是貧，並沒有大富，只有大貧小貧的分別』。中國全體社會生產不足，物質缺乏，要謀開發國家，當然要集中全國力量，儘量增加生產，使大衆物質生活均能得到相當的滿足，其他一切問題如建設精神生活，創造藝術文明等等始能談得到，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後，根據總理既定原則，力謀產業開發，將許多生產事業，由國家直接經營：如整理招商局官營長興煤礦等等，由民營一變而爲國營。其防止私人資本之跋扈壟斷，用意固爲深善，惜乎着眼不大，政策乖謬，經營結果，毫無改良。對於私人既投資本，又不講求善後，徒使國民

怨望，懷疑政府，致使新興事業之經營，有束手而不敢向前之感，此失去政府人民通力合作之精神，實爲開發之大障礙，然而建設方茲開始，若能知弊而立改之，尙未爲晚，以下略紆管見，聊貢一得之愚。

中國今日只有大貧小貧，並無大資本存在，已如總理所言。而今日物質生活之缺乏，可謂達於極點，一個中國小資產家之享受，遠不如一個美國之勞工，一切製造品均仰給外人，日紙不來，報紙減幅，天天抵制日貨而日貨源源來之不絕，致抵而不能收其效。抵者抗衡之謂也，人以刀來，我以槍禦，始曰抗衡，若亦手空拳而談抵制，縱抵制成功，亦不過爲英美貨造機會，其如我國實益何？故在中國今日而言振興實業，惟有上下一心，集中全國精力物力，通謀合作，從多方面一齊開始前進，政府不惟須自己着手經營，且須誘發人民企業之心，扶助獎勵民間事業，使人民自動的努力生產，加入合作，則在短期間內始可收相當之成效，

然則何者應由政府舉辦，何者應由人民經營，換言之，何者應由國營，何者可由民營，其間不能規劃一定之界限乎？曰，是又不然，兩者不惟有界限可劃，且應早早決定以宣布於人民，使雙方共同遵守，則開發步驟不致紊亂，產業前途，庶有方針可循。至國家經營之事業究屬爲何？第一，國營要選擇大規模之產業爲人民力量所不能及者；第二，國營要在人民現未經營或着手者。易言之，小規模

而人民力量可舉之事業，儘管讓人民集資興辦，而人民已辦之事業，政府更不宜插足，以免與人民爭利，政府須另闢途徑，開發新興事業。

據此而論政府之整理招商局經營長興煤礦等等，在政策上實益上實有相當討論之餘地，年來（十七年以前）招商局務之腐敗惡劣，負有監督責任之政府，自應派員整理，此間無可置評，然止於整理者可也，由整理而接收經營，似乎不可，接收而對於私人所下資本不予清還善後，則尤其不可，若不如是則影響開發前途、實非淺鮮。蓋私人見政府如此作為頗不敢再集資本以經營事業，惟恐事業成功又蹈政府接收之覆轍。余嘗名此種政策，為「建設上之自殺政策」非從速設法不可，而國營事業，第一切戒與人民爭奪利益，國家必須抱定方針始終不渝，毋造成人民懷疑戒懼之心，以貽誤產業之開發。

事業既由國家經營矣，則國家應有一貫政策，政策既立，則應以全副精神勇猛精進以底於成，不得受政潮之影響而轉變，尤不得朝三暮四而妄行改動，蓋一種政策必經相當試驗始能判斷，必經相當時期始見成效，若在試驗中即行轉換，則反覆循環而終不知於結果如何也。其負責人員，不惟要才識兼全，且須地位安定，長期主持，基礎始能鞏固，事業始能進展。今日之招商局自十七年改組迄今，缺乏一貫政策以資遵守，致在萬數載，一革莫興。而負責人員屢易，幾視局務如傳舍，主管機關由交通部而轉屬國府，開世界未有之創例！今固又隸屬交通部矣，亦僅能改正其系統，此而號曰國營，又

與私營何異！（關於招商局之不應隸屬國府，余曾於現行行政組織改革芻議中痛論之）總之似此政策浮沈不定，負責人員隨政波而逐流，無論如何之大有作為者亦必不能實現其抱負，故國營事業第二要有一定方針，其負責者不可受政潮之牽動，隨主管機關長官之更迭而同其進退。

國營事業機關之人員，長官固不應隨政潮變動，既如前述，長官以下之服務人員，其採用升遷任免等等，要經一定手續，不得由長官任意荐引或黜陟，而服務經過一定年限之後，身體衰弱或不堪任事者，有退休金等等以為晚年生活之依靠，如此服務人員一定情願竭盡忠誠，終身服務，而我國國營事業，官長更動既繁，每經一度變動，恆撤換大批職員，濫引私人充任，職員咸存五日京兆之心，於事多所敷衍。觀招商局年來債務日益加重，局務惡劣如故，輪船肇禍，時有所聞，糾紛重重，怪象遍現，事業停頓，航路日減，揆厥原由，此亦一端。故國營事業，第三其職員除主管人員外，應由考試以採用，按成績而升遷，非有過失，不予撤換。

最後為國營事業之必須注意而尤為中國今日之不可須臾疏忽者，蓋中國人血液中一般都隱有兩種劣根性，即貪財好貨與不負責任是也。中國人之括財中飽吞蝕自肥之本領，要比西遊記中孫行者的本領尤高，不問何事，一經插手，即可發財，而國營事業，除為公共福利外，原含有營業性質，贏餘獲利本其重要目的之一，若年年虧蝕，國家將不勝其累，其損失結果，仍歸人民全體所負擔，遇事推諉

，做事敷衍，簡言之，不負責任，既爲中國人之根性，而爲事業發展之阻礙，莫過於此。中國輪船業年來肇禍之多，駭人聽聞，其負責人員事前多疏於防患，事後又不能克盡厥職，輪船一出險，職員必先乘客而逃，馴至善後無人主持，危險範圍愈加擴大，乘客每遭無謂之犧牲，國家則受莫大之損失。此二種劣性如不剷除，國營事業根本不必談，談亦無益於實際。余對於國營事業之不敢率爾主張者，亦由於此。其剷除之法惟何，第一，須注重人選，第二，厲行會計檢查，第三，賞罰要嚴格而公正。（此點當非如此簡單可以做到，惟求逐漸改善耳。）

以上略將國營事業亟應改革之點，略加論列，惟所舉之例只取招商局，其實中國今日凡國營事業皆有上述之弊端存在。絕非限於招商一局而已。以言交通，京滬線則聯絡京滬，重要固不待言，且逼近首都，中外觀瞻所繫，無論平時戰時軍運甚少（除此大對日戰爭外），而其內部惡劣腐敗，處處與乘客以不愉快與便利。自座位言之，三等座內黑暗發臭，小販時時叫囂，乘客痛苦，可想而知。而車子一到車站，搬運行李夫役，蜂擁而上，使旅客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夾擠中間，橫身冒火，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其最大不良，厥爲車不按時而到。特別快車甚有遲至五小時以上者，每日通車幾以遲到爲原則，以準時爲例外，管理者視若常事，毫不爲怪，京滬線尙且如此，其他固無論矣。余嘗與鐵道部某司長同車返京，適遇車又誤點，詢以何故常常如此？鐵道部何不整頓？彼答曰，此要問路局局長

，非關部事，其言雖戲，要亦可見一般矣！

交通事業及帶有獨占性之事業，爲防止資本主義之流弊，當然要採用國家經營，毫無疑義。而中國國營事業之結果，無一不與願期相反，今後若實行總理主張，則國營事業之範圍愈廣，而大弊端必須如何改革，當爲講求開發之前題，尙望國人有以教之。

統一先從小處做起

淞滬創痕未復，瓊粵內訌又起，宣言通電抗日，始終未遣一兵，兄弟鬩牆之爭，採取斷然處置，外戰敗不足羞，內氣忍爲可恥，國民良心如此，當局自負如此，夫復何言？！更有不惜辯明者，曰『此係局部問題，地方問題，無關大局』。內爭之界說如何，上海之廢止內戰同盟，自有定義，然此足以表示不統一之狀態者，綽然有餘。吾人何不幸而生於中國。更何不幸而生於今日，凡良心不泯而稍有覺悟者，觀此情況能不由內的心慚愧以窒息至於死乎！

中國今日之不統一，無可諱言。這種不統一的現象，成爲整個的普遍的現象，無論在何界何處，亦不問在國家或社會，都是赤裸裸的表現出來，即於個人生活方面亦有所不免。而今國民希望政治統一之心，比任何爲痛切熱烈。

統一先從小處做起

所謂政治上的統一，就是說國家在統治上應該一元，政令不可分歧。各省政治不特形式上要屬於一個首領統屬之下，凡實質上之一切設施，都要接受中央政府之命令，和衷共濟，協謀同作。然以中國今日之情勢論之，凡不喜於誇張粉飾者，莫不承認政治統一無望。近日廣東事件，即爲明證，愚意欲謀政治統一，當從政府之力量可及者先行做起，然後以及於全體的統一，整個的統一，所謂從大處着眼從小處着手，這種小統一如可以一一做到，則全體的統一似亦不成問題矣。

現在中央政府本身，在表面上固屬統一政府，而關於各個行政事務處理等等，彼此各自爲政，殊不一致，分庭對立，此亦有目所共覩者也。

國難發生，收入銳減，財政困難，政費無出，於是行政官吏之俸給，經從新釐定，分別等級，令全國一致通行，乃自新制發佈之後，命令則自命令，施行即生歧別。夷考各機關發薪之實況，有摒除新辦法不用而依舊俸給法發薪者，有適用舊法而予以八折或七扣者，又有於新規之外給以借支或津貼者，更有少於規定而獨樹一幟者，巧立名目，私相授受，形形色色，不一而足。在有直接收入之富機關，固可任意分肥，而於無財源之窮衙門，徒生咨嗟怨戾，當事雖授受無愧，民間則議論紛紛。中央政府不過二十餘機關，其複雜情形如此，以中國幅員之遼廣，奚能望其有統一的行動？

命令與法律，形式上之效力雖不同，實質則相等，行政官吏不依法令之行爲，當然是犯法行爲，

犯法行爲在司法應予以糾正，監察可提出彈劾。中國今日司法與監察兩權同時並存，惟恐司法之力不逮，而特重以監察大權，以防官吏之作奸犯科，理論本如此，事實亦如此，奈有大權而不肯發動何？中央近有制定設立懲治貪污專庭之舉，此專庭之是否應有，其爲侵犯司法獨立如何者，各方已有專論指摘，毋須贅述。惟「貪官污吏」一名詞，久已喧囂人口，然則何爲貪官，何謂污吏？顧名思義，凡不當取而取者謂之貪，不應得而得者謂之污，執以現行法上之瀆職侵占各罪，亦同此義。薪俸爲維持官吏之生活計，謂爲酬庸其勤勞亦可，法有明定，固屬應得，至越此範圍以外之收入，是否當取，又是否應得，不容註解，義自顯明，是否貪污，更毋須分辯，中國今日之貪官污吏多矣！專庭豈敢應用哉！

同一爲國宣勞，克盡厥職，因其所在不同而所得各異，天下之不公平孰有甚於此者。政治上之行動，惟有公平始能立足，而一切紛亂之起於不公平者，殆居大半，試觀年來之內亂可知。「天下爲公」，總理素爲圭臬，諄諄教人，事事準此，其信徒亦誦之口如懸河，而其行動則皆反是，無怪黨治三年，成效不見，循此以往，六年訓政，亦徒擁其名耳。

法律貴乎實行，既不能實行，又何必制定，更何必公佈。若謂國難期間，爲欺騙民衆計，而頒布緊縮政策，然民衆可欺一而不可欺再，結果徒損自己威信，軍閥時代有「政令不出都門」之謂，今日

統一先從小處做起

「六六

則有「政令不出府門之概」情況愈趨愈下，言之殊爲可慘。

負政治責任者而自己所頒行之法律，而自己猶不願實施，遑論其他，「以身作則」，「正己正人」，古有明訓，今日之中國政治，要從當局本身做起，言必有信，行必有果，在全國政治未整個統一之先，從中央政府內部統一做起，逐漸擴大以及全國。

我們要超越抵抗的心理纔能排除國難

民二二年一月二十
日時代公論

我們始終以抵抗爲前提麼？

我們始終不能採 進攻的態度麼？敵人進攻上海，我們固守閘北，敵人擊破閘北，我們又退守瀏河，崑山，敵人進佔榆關，我們防守九門口，迨敵人攻破九門口，我們又退守石門寨，柳營寨。敵人進攻靡窮，我們退守益速，敵人節節前進，我們步步退休。錦繡山河有限，暴日慾壑無窮，中華民族！你將退往何處去？希瑪拉雅山嗎？

所謂「抵抗」，終極是被動的，必待敵來侵犯，然後纔去抵禦。被動的東西總是跟着人家行走，命運係由他人決定。我們現在要由被動變爲自動，我們才能生存。被動是奴隸之性，仰承主人鼻息而生存，一切由主人去支配。世界最高文化所結晶的中華民族，難道永遠的毫不覺悟的這樣生存下去嗎

中國民族今日的動作，是：

敵人來了就慌張

敵人去了又頹唐

我們要超越抵抗的心理纔能排除國難

今日上自政府大員，下至鄉村百姓，他們心理的象徵，沒有一個能逃開這個範疇。然則孰令致之？天天喊着「禦侮救國，長期抵抗」的先生們，實不能辭其咎。因抵抗喊得高唱入雲，而無確切準備，於是敵人來了就不能不立現慌張，因抵抗喊得起勁而無奮進情緒，待敵人一去又自然而然的復歸頹唐了。

我們若祇求苟安於國難，國難是永遠不會減少的，我們要超越國難，我們才能減少國難，才能消除國難，對於暴日侵略，我們若天天只喊抵抗，不但抵禦暴日不住，東北失地收復不同，榆關繼續陷落，即熱河平津亦難望保其安全，華北亦有淪落之虞，我們若想制止暴日侵略，我們要超越抵抗，迎頭痛擊上去，出以攻擊的態度，採取消取的方式，我們才能擋住日本侵略，才能保全國土，才能收復失地，才能保障和平！

我們要矯正日本人經驗的錯誤與思想的荒謬，我們實不能不使日本人嘗受戰爭痛苦的風味。我們要趕緊轉移戰爭場所，攻進日本國土，燒毀繁榮城池，襲擊重要都市，打殺日本生靈，使日本人嘗些飛機的威嚇，砲火的震驚，與目擊戰禍的慘酷。我們無論戰勝戰敗，總要使日本人領略戰爭的經驗，使日本人以後不致如此橫蠻猖狂，正如使其受着地震的慘痛一樣。

民族精神是要建築在心理上面，抵抗的心理是消極的，進攻的心理才是積極的。我們今後要造成

積極的心理，養成進攻的精神，國難才能消滅，強暴始能退去，和平要用血與肉換來，和平方有價值，惟具有實力，始有真正和平，總理說：『我們對於西洋文化制度，要迎頭趕上去』。我們今天對於日本人的侵略，也要迎頭痛擊上去。

我們既然決心進攻，我們要全體總動員。總動員的意義，大家不要弄錯，有簡單二句話可以表明，就是「各盡所能，各竭其力」，有力者，上前衝鋒陷陣，有財者，在後接濟糧餉，其他一切運輸等等，竭盡國民全知全能，以從事於戰爭工作。

德總理施萊轍一月十五日在柏林日耳曼立國慶祝大會，曾大聲疾呼，警告國民曰：

「日耳曼之存在，由於陸軍之榮譽的功績，德國自由人之象徵，為執戈之權利」。又曰：

「彼自始至終均贊成國民之應受強迫軍事教育，此非為擴充軍隊設想，實人民於危急之秋，應各具捍衛邦國之決心及準備」。

中國今日已至存亡危急關頭，全國人民，應一致奮起，準備殺敵。

「中國自由之表徵，為執戈討日之權利」。

如何整理財政？

民二二年五月五日時代公論

如何整理財政？

今日談到中國財政問題，莫不疾首蹙額，歎國家財政，已至山窮水盡之期，財源枯竭，搜刮涸竭，今後若不另籌高策，則惟有坐以待斃而已，在朝在野的人，談到整理財政，又莫不曰惟有開源節流。何謂開源？就是想方法去求開闢新的財源，以謀增加收入，如辦理所得稅，營業稅等是。許多舊的財源，或因不適現狀，阻礙發展，或因本源枯竭，收入減少，不足以應付當前國家種種之需要，而且如今日國家政軍各費之繼長增高，國家新興事業之有加無已，若非握有廣大財源，自難求其與今日之膨脹的財政相抵合，故開闢財源者，亦勢所必然也，何謂節流？就是裁併機關，淘汰冗員，停辦不必要之建設，中止非切迫之事業，以求節省開支，以期收支適合也。

然而，開源節流，固是今日整理財政的一個方法，毫無疑義，國家財政係與私人財政不同，以「量出爲入」爲原則，欲求適合現代國家之需要，欲謀應付新興事業之擴張，自非新開財源不可，同時以今日之駢枝機關，到處盡是，冗員乾薪，習以爲常，若不設法排除，亦非「取之於民，用之於民」之道。此種整理財政的方法，所謂從開源節流着手，自然無有異議，惟吾人所欲疑問者，開源節流，是不是今日整理財政的根本方法？中國今日財政的窘迫，是否僅僅財源不足而已？中國今日財政的弊病，是否只限浪費？今日實行整理財政，若不從根本上着手，惟求開源與節流，又能否有濟於事？請申論之：

第一：開源節流，通常均有一定的限度，一旦超過限度之上，開源既不可能，節流亦不可行，此爲兩者本身所具之自然的限制，况以民窮財盡之中國今日，欲求廣開財源，在事實上恐等於「望梅止渴」，而節流亦惟有於可能之範圍着手，蓋國家財政，原以量出爲入，應有建設，自不能以無財而擱置也。

第二：就開源而論，今日財政上的種種弊端，如不能斷然決然剔除，惟恐開源愈多，所生弊端愈大，結果開者徒多，收者有限，人民因疲於奔命，政府依然未獲實益，損人而不利己，莫此爲甚。

然則到底應該用甚麼方法去整理財政呢？當前財政的困難，就是入不敷出，而且相差殊遠，試就收支對照表觀之，當不難一目瞭然，財政當局唯一之彌補方法，不是東挪西湊，便是濫發公債，寅吃卯糧，挖肉補瘡，結果財政狀況，愈趨愈下。

爲甚麼收入減少，支出增多，以致入不敷出呢？難道老百姓沒有納糧繳款麼？

不然不然：老百姓確實完糧納稅的。皇糧國庫，誰敢怠慢！不獨完糧納稅，而且完納很多，連年災荒，兵匪騷擾，人民收入雖然減少，而完納的義務不能免除，荒年是不能荒糧的！人民如不能完糧而想免糧，祇有逃跑一法而已！浙西人民每年繳納的糧：有銀子，有糶米；銀子分上忙下忙，作兩季

徵收，漕米一次征繳，亦名抵補金，此爲正稅，又稱國稅，此外有種種之附加稅，曰建設捐，曰建設特捐，曰教育經費，曰慈善經費，曰保衛團經費，曰地方事業經費等等，名目繁多，記不勝記，而附加稅之稅額，竟超過正稅以上，更有所謂徵收費，小費，亦稱打秋風，爲催糧辦事者之所得。總之，巧立名目，極其搜刮之能事耳。以去歲最豐收之年而論，每畝收入除繳糧外僅餘洋數角，人工尙不在內，花費固不必說，一遇荒年，祇有凍餓以死也。（附註：去年穀賤傷農，亦其原因之一）。

此僅就「地租」一項說明而已！其他烟稅，酒稅，屠宰稅，印花稅，錫箔稅，鴉片稅，各種產業稅，各種消費稅，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外國之所有，中國皆有之，外國之所無，中國亦從而有之，包羅萬象，色色俱全。從人民荷包裏掙出來的金錢，真是車載斗量，不計其數，然而政府收入確有限，收入仍不足以償其支出。

此何故歟？曰征收之稅額，未有全數解入國庫也。中國財政弊病的癥結，即在於是，財政將陷於萬劫不可恢復之地步，此即爲之致命傷，我們今日論財政改革，若不能從此着手，一切都是空想，一概都成廢話。

今日財政的弊病，既係由於「中飽」太多，故實行整理，惟有先行剷除中飽，掃絕陋習，然後纔談到開源與節流。

試察征收情形，無論何種稅收，自人民繳納以至入於國庫，中間經過許多遞解機關，層層剝削，節節中飽，政府實際之收入，僅有人民繳稅之幾分之幾耳，大部分之脂膏則入於私人之皮囊也。嘗聞友人言曰：前年上海閔行有一統稅分局（俗稱分卡），局長某某，曾任某省教育廳長有年，因卸職後僑居滬濱，感於生活困難，不得已出任斯職，稽其地位，僅一委任職，查其月薪，不過六十大元。其所以翩然屈就者，當然大有肥在！結果彼自告人曰：「吾不貪，吾不刮，一年淨得二萬元」。就此例而論，第一，彼一人年得二萬元，其他幫同搜刮之人，究竟得有多少；第二、不貪不刮，一年可得二萬元，若貪若刮更如何。此僅一小例耳，中國一切之稅收，幾無往而不如是也。

次就支出言之，政府之用款，同犯上述毛病，中間亦經許多剝蝕，眞真消耗於實際需要者，亦不過支出內幾分之幾耳，大部分則入於經手人之荷包也。且舉一例證之，日前同友人談到購買飛機一事，彼曾詢問經購代辦之飛機公司，據稱：「私人訂購戰鬥機，需洋約九萬元，如爲政府所購，同一飛機則非十一二萬元不可」。彼聞之深爲詫異，當詢其何故，據答：「政府之經手人，往往勒索巨額之抗減心也，羊毛出在羊身上，經手人既索價錢，則惟有抬高貨價耳」。同一物品，因購買人之不同，而價格相差如此之鉅，可勝痛心，此僅購機一事而已！其他凡政府機關與商人購買之物件，無一不較私人所購者價高而貨劣，雖一至微至小之物，亦莫不措油三分，審計部若能作一實地調查，不難原形

如何整理財政？

畢露。現在機關購物，不談貨價，先講折扣，一筆一墨，都有七折八扣。試問誰受折，誰得扣，機關鬧得如此地步，誰之咎歟？

收入支出之實際情形如此，財政焉能不支絀，國家又如何不趨於破產！

是故今日整理財政，方法極簡，理論平常，既不要開源，又毋須過於節流，祇要剔除一切中飽，掃蕩所有揩油，財政自然裕如，收支必能適合。

救國應先恢復民族精神

民二一年十月十四日
時代公論

地球上一個獨立自存的國家，並不是專靠土地遼廣，人民衆多，物產豐富，就算條件具備；必須於土地人民物資之外，要有新興的民氣，獨立自主的明確意識，纔能生存於世界。尤其在強凌弱，衆暴寡，有強權，無公理之今日，特別要有興旺的民氣——熱烈的民族情感與自覺的民族精神，方能內則安邦定國，外則伍鄰列強。所以一個國家之強弱，要視形成此國家之民族之民族精神之興盛與否以爲斷。民族精神若是興旺，這個國家一定強盛，不然一定衰微，故一國之民族精神如何，可視爲測度此國強弱之寒暑表也。一個民族如果失去民族的自信力，沒有民族的自覺心，所謂「民心已死」，「民氣頹喪」，這個民族決不能生存於地球之上，古今中外，決沒有這樣民族能夠存在的先例。

中國今日之所以一蹶不振者，亦由於民氣消沉，民族精神頹唐衰廢之故耳，自東北事變發生以來，時逾一載，暴日由武力佔領而組織傀儡政府而正式承認，殫精竭慮，花樣愈演愈奇，所謂武裝移民，派遣特使，着着進行，不遺餘力；擺攤路礦，攘奪關郵，一步一步，威逼而來，最近更將由東北而直撲平津，欲南下而牧馬矣，姑無論其行爲之是非曲直，所作之喪天害地，而其動作之敏捷，擺布之神速，與夫全國人民一致合作之努力，直有驚天地而動鬼神。返觀我國則如何，朝自事變發生以來，在政府既沒有整個的抗日方策，在人民亦無必死的抗日決心，在苟迄今，國是莫定，際茲外寇日猖，領土日削，國難日趨嚴重之際，而黨內領袖，偏知爭權攘利，一般國民，惟顧聲色貨利，至於國家生存，民族前途，則毫無所用其心也。這都是民族精神消沉的表現，國家趨於滅亡的象徵。

在國難嚴重的時期，而重大貪污案件，竟有層出不窮之慨。好像國家快要亡了，而個人享樂物資不可或缺，正好趁火打劫發一宗大財，預備等國亡了好逍遙法外。別的且不論，單就煙土案言之：國府專車運土案尚未解決之際，而永年輪又在漢口抄出了大宗特貨，上海市公安局贓物股主任竟以泥土私行掉換煙土，接連江大輪在江海關又忽發現百萬兩以上之黑貨，五花八門，煞是可觀。此僅就已暴露者言，其他未發覺而安穩到手者，更不知凡幾。且案中多牽連國家公務人員，其努力自肥可與日人之進取東北成爲正比例，中國人想發財的心理，真是超越世界一切矣。

豈獨發財爲然，爭權奪利之念亦復如是。西南問題在忽幻忽明的閃光當中，而山東之韓劉已實行火併，川中風雲又忽趨緊張。中國愈是對外緊急，內部自殘愈是激烈，憶歐戰緊急之時，各國無產者爲爭祖國存亡而分家，中國共產黨偏趁滬危急之秋，四出騷擾，以爲發展勢力之絕好機會。「國無外患者國恆亡」，在中國又誰敢言其適合呢。

再看中國人民對於國難的認識與記憶如何，當去年萬寶山事件發生之後，京市人民的代表齊集國民大戲院開會討論，決定方策，激勵政府，伸張民氣，表示決心。當時到會人數之多，擠滿一堂，情形極爲熱烈。可是今年「九一八」週年紀念開會之日，到會者僅其一半，形勢大不相同。「九一八」在中國歷史上意義之重大，要超過萬寶山事件多少倍，而目前局勢之嚴重，亦較去年爲甚，民氣相懸，識者能不寒心。然在當日下午開演九一八「影之時，情形復變熱烈，因爲義務電影，看客不須出資，其觀衆之多，誠爲稀有之盛況，接連開演數場，尚有數千觀衆不能一飽眼福。似此國民，似此民族，還能希望存立於今日世界麼？

據上所引事實，中國人的民族感情之薄弱與民族覺醒之不澈底者，可以見矣，所以我們今日要排除國難，要挽救中國，須先從恢復民族精神做起。「民族精神」，不是單靠一時的衝動，也不是單靠一時熱烈的情感，尤不是開會遊行，貼標語，喊口號所能了事。然則民族精神要具有甚麼特質呢？

要有克服私慾，抑制小我的偉大精神，

要有犧牲個人，奉仕祖國的高尚的愛國心，

要能殺身成仁，捨棄個人生命，爲確保大生命的永遠的靈魂。

貪污自肥，貪安好逸的墮落性格，是民族精神之大敵，我們要把這些地方剷除，然後才能造成捨身赴難的精神。

德國在十八世紀的時候，備受拿破崙蹂躪之蹂躪，當時諸侯之互相殘殺，媚外自肥者，正與我國民元革命以來之軍閥相若。會有大哲菲希特（Fichte 1762—1814）者，慨於國內四分五裂，憤然興起，發表「告德國國民」(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1808)一書，鼓吹日耳曼民族感情，喚起德國民族精神，謂德國要達到獨立自主之目的，非先從克服小我做起不可，彼云：

「將來的國家，必爲民族國家無疑。普魯士之所以被法國武力粉碎者，德諸國侯之所以屈服於拿破崙者，都是因爲德國國民被利己心，我慾，貪慾籠罩所致，國民相互猜疑，國內分裂所致。今後德國國民欲完成其偉大的使命，必先克復利己心與貪慾之念，振作國民感情，以覺悟其目的與義務」。

爲保持國家的生存，要制限個人自然的自由，爲謀祖國的獨立，個人要能捨身赴難。彼云：

救國應先恢復民族精神

「國民不止僅僅對於憲法法律的冷靜的服從爲已足，要有捨身救國的永遠的高尙的愛國心，如火焰燃燒一般」。

彼讚美熱烈的愛國的行動。彼謂具有高遠的心思者，不僅爲單純生存而尊重個人的生命，乃爲自己所成就之事業而尊重其生命。國民爲其事業之守護者，爲對於將來之保證者，故國民之安全要比自己安全更有價值。爲國民而拋棄生命者，乃是確保大生命之常存，使自己的生命更有意義。

當拿破崙攻陷柏林之時，菲希特猶日講德國民族精神之如何偉大，德人之應如何努力，德人環而聽之者數千人，法兵雖荷槍監視，而菲氏仍講演自若，毫不畏縮，精神且益加奮發，故論者謂德國之復興，實菲氏鼓勵民族精神之力也。

復次，民族精神是甚麼東西所結晶呢？一個民族的造成，不是僅靠種族言語等等客觀的條件，其創造民族，結晶民族的重大因素，乃是「追懷過去所有之「功業」與「光榮」，及所遭受之「犧牲」與「困苦」，各個人現在爲欲保持共同生活而接受於共同遺產，更欲以之繼傳於後代而發生的積極的慾望」。法人至今猶追憶拿破崙雄霸歐陸之光榮，其於普法敗後能發奮圖強，卒克復仇雪恥，以奪回羅阿二州者，這種追懷過去偉大的光榮之悠遠的民族精神之力有以致之也。我們民族在過去有獨創東方文化之光榮，有建造萬里長城之偉業，有四千餘年之歷史，在世界人類上有特殊之貢獻，以武力言

，曾雄霸東方，號令天下，蠻夷荒服，進貢稱臣，所以我們今日應該繼往開來，承續這種民族精神，努力祖國復興的事業。蒲隆繼里 (Bluntsohl) (1808—1881) 有云：

「據吾人之所見，民族究竟是甚麼？民族是靈魂 (Soul)，是精神 (Spirit)，在過去由於追懷犧牲，光榮，或屢遭顛沛與共同悲哀而來之精神的家族，在現在為欲繼續共同生活而來之精神的家族。民族的構成，乃是在過去曾共同成就大事業，在將來亦欲造成大事業」。

然則已衰落的民族精神要怎樣恢復呢，菲希特以為喚起民族感情，涵養愛國熱情之方法，莫過於從獎勵教育着手。彼認為從來德國教育，缺點甚多，感化學生而失敗。教育不僅授以知識，要鼓吹靈感，使學生道德的性質向上，藉着高遠的宇宙的道德秩序之靈光，以消散狹隘的個人的利己心。教育不僅只止於富有階級中產階級之人士，使所有階級之人，都能浴這種廣大高尚的教育之恩惠，將統一的感情，鼓吹於德人四肢脈管之內。

我們要恢復民族精神，根本要從人格教育做起，無論何人，不能否認。不過我們過去的教育，不但沒有養成健全的人格，連知識方面都不能滿足，真是慚愧。我們今後要努力教育，尤其要注意人格教育，才能恢復民族精神，才能真正挽救中國。惟造成人格教育，首先要注重嚴格訓練，像今日學生把學校當作遊藝場一樣，辦學者把學校當作造勢力場所一樣，連知識教育尙談不到，遑論人格教育。

日本以二十餘年之苦心亡我東三省，我們亦要下十年二十年之決心，始有恢復之望。十年教訓，勾踐卒能復仇，史實昭然，吾人應奉爲圭臬者也。

教育救國，固屬重要，然教育爲百年大計，功效誠有緩不濟急之虞，而且教育之功效在感化，對於現社會弊病之矯正，力量甚微，爲目前計，爲矯正成人之墮落性格計，惟有實行法律，才能控制這種貪污自私的常性。中國今日貪污案件之多，實由法律廢弛之故，許多駭人聽聞的貪案，而且證據確鑿，到後來總被人情金錢而有耶無耶葬送了！貪污之上更加一層貪污，結果連貪污原案都是化有爲無矣。中國今日的法律祇是制裁鄉下老百姓的，稍爲有一點勢力與金錢之人，甚麼法律都與他不相干，他無論犯了甚麼罪質，都可以逍遙法外，我敢說一句，今日無論那一個都沒有把法律放在眼中者，長此下去，社會還有大亂。今日講道德是無濟於事，（關於法律與道德，擬他日另作專文）祇有嚴厲實行法律，始能矯正一切。惟所謂嚴厲者，不是要加重刑罰，是要公平無私，凡犯罪者一律處罰。胡漢民先生就在職立法院長之日，曾云「立法要寬，執法要嚴」，正是今日的對症下藥。

我們四萬萬同胞翹首雲霄，耐心靜候的國聯調查團的報告書已發表了，公正與否，姑且不論，假定日本人俯首聽命的接受報告書，則中國所保留者，僅僅一個冠冕堂皇有名無實的「宗主權」耳。國人們！千萬再莫癡想！東三省（？）已是十足的亡了！我們一時莫想收回（不過義勇軍的進攻政策，

還是要繼續下去)，我們也莫想國聯有正義主張，到了現在即欲直接交涉亦不可能，我們今日祇有去小我以從大我，整頓內部，努力復興工作，求人莫如求己，是我們唯一的政策，語云：「十年興敗多少人」，盛衰興敗，瞬息轉變，我們祇要立刻翻然覺悟，則十年後之東方，誰敢謂又非漢家之天下呢！回頭是岸，國人其醒諸！

荒謬絕倫之日本聲明書

民二十一年十一月廿五日時代公論

——幼稚無恥，莫過於此——

國聯行政院會議，於本月二十一日在日內瓦舉行，因此次會議，專為討論李頓報告書，及由此以導引解決中日糾紛，該報告書對於日本以武力侵略東北之事實，明白揭出，關於日本此次暴行，則宣布如下列之罪狀：

- 一、日本所藉口暴動之懸案，並非真確。
- 二、九一八當夜日本所採之軍事行動，不能認為合法之自衛手段。
- 三、日本一切行動，乃預定之計劃，中村問題，不過為此行動所利用之口實。
- 四、偽組織係日本一手所造成，並非出於當地人民之公意。

荒謬絕倫之日本聲明書

這種很公正而坦白的意見，日本認爲於己不利，遂借報告書中批評中國之現狀，如內訌政變，及謂中國抵制日貨，有受政府贊助或默認之嫌疑等等，乃大放厥詞，信口雌黃，強詞奪理，任意誣陷，不特侮辱我國，且侮辱世界，實爲和平之公敵，以負責任之政府，而公然作如斯荒謬絕倫之聲明，原不值一駁，爲免淆惑世界之觀聽起見，特闢之如左：

第一：日本謂中國現在既爲無政府狀態之國家，將來亦不能期待有永久的中央政府之實現，因此與中國發生之爭執，不能以普通和平機關解決之。

中國今日誠有幾多內訌及政變發生，吾人固不必深諱，然此爲一個國家由舊式的國家蛻化而爲新的國家之過渡期中所應有之現象，無論何國，不能或免，事屬平常，毫無足怪，此在報告書中已明言之，（見報告書第一章），即以日本之明治維新而論，長派與薩派之引兵相爭，亦是一個很顯明之例，惟其混亂之期間各有短長之不同耳。抑有進者，中國今日固有幾許之混亂現象，試問日本的現狀就推算安定麼？又難保今後沒有混亂事變發生麼？吾恐任何國家不敢斷言。中國在帝國主義者侵略壓迫與夫種種陰謀及搗亂情形之下，依然抱着大無畏之精神，於艱難困苦之中，忍耐犧牲，向着建設新國家之途程邁進，各國對此應予以同情與援助。九國公約之用意，可云就是這個表現；而日本獨懷異志，於侵略壓迫之外，竟公然向世界發此暴言，謂中國爲無政府狀態，其用心不獨拙劣，而且可恥！吾人

所欲問者，中國這種改革過程中之一時的事態，而名曰無政府狀態，然則日本動輒刺殺一國首相又爲如何耶？原敬之死也，濱口犬養之被刺斃命也，豈號稱秩序安定之國家所應有之事乎？日人真不知人間之有羞恥事也。人而無恥，不可以爲巫醫，羞哉，日本政府之聲明書！

日本又云：『中國自民國以來，陷於無政府之混亂狀態，中國由此演進，祇有國家的崩潰，或不能期待永久的中央政府完現時望之到來，……所以與中國發生之爭執，不能以普通和平機關解決之』。然華盛頓之會議，究爲何時召集，日本既知中國自民元以來，祇有國家之崩潰，不能期待永久的中央政府實現，日本又何以簽訂保全中國行政與領土完整之九國公約？自己承認之條約，自己又不惜出以破壞之手段，世間之無信無恥，孰有過於此乎？關於此點，美國當局已作有力之抨擊（見二十一日華盛頓電）。內有一段，復引如次：

『對於日人所持九國公約不能適用於滿洲爭執之立場，尤難贊同，認此種立場，絕難自圓其說。因美國信九國公約，專爲保障中國之統一而設，今以日本軍事行動結果，中國之統一，直接爲之破壞。美國固願承認中國，今方缺乏某種之統一現象，與國內之缺乏安定，但當時締結九國公約之時，日本與其他簽約國，均早已明白承認此種事實，且於完全深知中國狀況之後，同意商定，不加干涉。又當九國公約提出討論之時，中國國內正在各軍閥相鬥中，南方既不與北京政府合作

，而東三省又自爲政令，且爲中國本部一份之真正統一者，考當時所以締結此約者，此卽爲其理由之一」。

更進一步言之，中國今日政治之未能十分穩固，而日本參謀本部之一貫的搗亂政策，實應負其大部分之責任。此余在國聯調查團報告書駁議中已詳言之，茲不贅述（見時代公論三十四號）。

第二 日本在聲明書中，謬稱「滿洲國之成立，並非新發現之事實，中國未曾有合併滿洲之實力，張作霖宣言獨立，已達兩次」。

然則試問張作霖之任東北三省巡閱使，是不是出於當時中國中央政府之北京政府所委任？設假定當時之東北三省非中國領土，而又非中國政府——北京政府——統治權之所能及，日本關於東省各種不平等條約，卽今日之所稱權益，如何要求北京政府簽訂？當時與張作霖私訂之各種條約，又爲何要北京政府予本承認？更爲何一再申訴說現政府不履行條約？說中國對滿鐵取包圍政策，侵略日本條約上之權利，說中國欲斷絕日本在滿之權益？自相矛盾，莫此爲甚，所稱

「舊清領土推戴往時統治者之後裔爲元首，脫離中國本土之政府狀態，豈可謂日本之主動耶？」

然居天津之廢帝溥儀，難道不是日本官吏土肥原挾持以去麼？溥儀這幾年在天津，不是住在日租界，天天在日人掌中玩弄麼？俗語有云：「猴子盤鷄巴，不盤出血不收場」，日本人把溥儀盤了這

幾年，當然要盤出一場把戲才好，這次薄儀登基，又豈彼個人之所樂爲乎？此爲世人皆知之事，日人猶欲強辯，令人欲哭無淚！至謂：『滿洲國人民歡迎新政府之事實頗顯著』請問顯在何處？幾十萬的義勇軍，前仆後起，再接再厲，就算是歡迎之表示麼？難道他們不是滿洲國的住民麼？蘇炳文一再通電國聯，宣布日本罪狀，可算一篇歡迎辭乎？又云：『新政府在前清滅亡以來，最初之文治政府，非如中國現在軍閥獨裁政府也』。試問何謂文治，對日本搖尾乞憐卽曰文治乎？若如此，則文治者，奴隸之謂也。一個國家連自衛能力就沒有，根本上卽不能成立國家，文治也好，奴隸也好，橫直烏合之衆而已。又日本政府之不能控制軍人，難道不是軍閥獨裁政府麼？不如直截痛快，將此段聲明改爲：『新政府自前清滅亡以來，最初之文治政府，非如日本現在之軍閥獨裁政府也』，如此既合事實，又能博得大多數之同情，而要求各國之承認僞組織，更無須乎叩頭乞助也。

聲明書稱：『滿洲國之組織與將來滿洲之前途，頗有希望』，此言誠屬萬分真確；惟此種有望，乃日人心中之對日本而言，不出十年，滿洲必爲高麗之續，可斷定也。所云：『現在治安之回復，順利進行，……滿洲政府無排外感情，又無共產主義之災禍』，試問牛莊英僑何以被綁？「排外」空作何解釋？若以民族復興運動爲排外，則世界除僞組織而外，何一莫非排外之國家也。至稱：『無共產主義之災禍』，卽應成立國家，則首先卽應取締日本國家，蓋以其共產主義之爆發，終年無時

或已也。界利佐野等等，何可勝數。復謂「滿洲於中國本土有特別之地位，張家之暴政，排斥民族自決之主張，自動造成民衆運動，而遂惹起前清復辟運動」。此言不獨荒謬，而且暴露日人之無智無識。今日滿洲人還有一個獨立的民族性存在麼？一個民族都具有一種特點，以表示其民族精神之所在，請問滿洲民族之特點何在？他的民族精神是甚麼？是不是唯一的特點「奴隸性」罷！溥儀今日之左丞右相，除溥偉熙洽之外，究有幾個滿洲人？前清滿洲之王公大臣，何以絕未參加？此而號曰民族自決，則民族自決連一文也不值，威爾遜有靈，九泉之下亦不能瞑目矣。日人何以如此無廉恥，請生物學家研究日本人究竟是否人類

總之，日本政府之聲明書，幼稚已極，不值一駁，偽組織之出於日本一手所造成，舉世皆知，徒逞狡辯何爲！吾人敢告於世界者，日本既謂偽組織既出於三千萬人民之自動，又係民族自決，且新政府日趨安定，則今後請將日兵日將一齊退出東省，中國亦不派兵維持，我們靜觀新國之前途如何！吾人敢斷定其必然之結果曰：

偽組織必然的崩潰與情願自動的歸順中國。

拿破崙統一法國，曾在槍砲下迫使各邦人民投票合併於法，其用意亦無非要表現所謂人民之自動，而結末拿氏擾亂歐洲之維也納會議，對於這種強迫屈服的表示，並未予以承認。德皇威廉窮兵黷武

且每次刺激之後，反而加深一層麻木的程度。混亂墮落，萎靡卑怯，無恥腐敗，甜嬉，苟安種種數不盡的惡德所表現出來的現象，無論在社會方面政治方面個人生活方面，都日益深刻化。人心已死，背義趨利，大有江河日下之勢。

這種民族道德的喪失，追究其根源，一方便是帝國主義侵略使社會經濟破產後的必然結果，便是孟子所說的：「無恆產者無恆心」，下層階級因生活的壓迫，遂至流於寡廉鮮恥無所不爲。一方便是舊道德失去了支配人心的力量，同時又沒有樹立新道德來代替，封建意識又時顯時沒的作祟，使上層階級，內心過着矛盾錯綜的精神生活；復因環境的威脅，遂不免同流合污，耽於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上層階級既不能爲維繫社會道德的中心，民族道德的藩籬遂悉被決盡。政治的惡濁，內訌的紛起，官吏的貪污，匪禍的蔓延，教育的破產，風俗的敗壞，都是這個民族道德的喪失結果。

民族道德的喪失，雖然一部份爲帝國主義侵略所造成，但大部份却是出於我們的自作孽。如果我們民族有堅強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力，自然能夠將新舊道德融會貫通起來，並且也能夠精勤不懈的努力，則九十年來的國難，決不會到現在這種地步。或者早已把國難解除，建立一個強盛的國家，我們看日本明治以來的情況，便可明白。就是最低限度，也決沒有二十一年來的內訌迭起禍亂相乘的呷面，使國本受到重大的摧殘，到現在只能眼巴巴的看人家宰割我們土地，屠殺我們人民，而我們除了

乞憐國聯外竟一籌莫展，這種國家民族的奇恥大辱，可說是自食其賜。我們過去的一切，的確是「自侮自伐」我們現在如果不改革過來，一定弄得不能避免亡國滅種的慘禍。

十二月二十四日電通社東京電載：日本陸海當局非公式發表聲明，說三中全會抗日提案是「中國自身急於沒落的行程。」我們聽到這種侮辱的話，很爲憤慨；過後想想，我們的確正在沒落的行程中；不這個沒落的行程並不是抗日，而過社會政治各方面表現出來的混亂，墮落，萎靡，卑怯，無恥、腐敗，酣嬉，苟安，種種現象。我們抗日不但不是沒落的行程，而且是自救的手段，必須堅持到底。可是社會政治新表現出來種種缺德的現象不清除，甚麼抗日救國的工作，甚麼民族復興的事業，以及一切物質建設，政制創造，無論說得「天花亂墜」都是廢話。

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我們今後不能不洗心革面，痛切反省，上自負責當局。下迄社會一般民衆，都應該人人負其責任，過去的錯誤是全體人人的錯誤，過去的罪過是全體人人的罪過，這個賬我們算不清，雖然其間也有輕重大小的分別，但是我們決不能分別某人和某人，因爲我們無論甚麼，都有直接間接的關係，都負直接間接的責任，我們應該全體人人痛自覺悟，痛自懺悔！

十八世紀德國的內憂外患，正和我們一樣，其時德國哲人非希特（Fichte）於告國人書中說：

『德國之失敗，不是一二在高位者之咎，負其咎者，爲國民全體的聯絡，爲時代的精神，爲錯誤愚昧膚淺和怯懦，爲以上種種不可分離的結果，總之，此時代生活的全體，令我們失敗至此，這不是高位者之咎，乃高位者有以誤之，伸言之，是我們各人共同的過失。』

『德人誠爲法人所制勝，然我們就願爲人所輕視麼？願於武力戰敗後更喪失名譽麼？這就要看我們怎樣的自處了，武力戰爭已終止，今後的戰爭，是理論的戰爭，德行的戰爭，品性的戰爭。我們是否參加這新戰爭，也要看我們有怎樣的決心。』

菲氏這種言論，正是我們今日的鐵砧，我們今日能否挽救國難，能否建立新興國家，能否復興民族，全看全國上下「怎樣的自覺」和「怎樣下決心。」

幾年以來，大家都在責備政治的怎樣怎樣，以致社會一切都受政治不良的影響，走上破產的地步。但是要曉得政治不良是社會環境所造成，政治和社會是互相影響，互爲因果的。中國今日的現狀，真正是像菲氏所說『是種種不可分離的結果』，『是各人共同的過失。』不過，要解救這種種過失，入手的方法，仍然要從政治始！

✱

✱

✱

✱

✱

✱

✱

從中國歷史上看，政治上的風氣，常常能夠轉移一時的人心。中國自來士大夫和治者，便負有這

種特殊的使命，所謂治國平天下須先從正心，誠意，修身，齊家做起，所謂「正己而後正人」這種感化的力量，到現在還沒有失墜。政治如果清明，自然能夠在混濁的霧圍中，樹立一個良好的中心，開闢一條平坦的道路。固然今日中國的紊亂墜落，應該由全體人人負責，應該全體人人洗心革面；但是負政治責任的人，負有特殊使命者，尤應該特別刻苦，以身作則，予社會以一種好的觀感，來轉移一時的風氣人心。所以內政修明，是今日第一要着。卑之毋高論，今日政治的修明，應該要有以下幾個根本原則：

第一，養廉恥：今日中國廉恥道喪，尤以政治上為甚。暮夜乞憐，白晝騙人，貪污賄賂，舞弊枉法，幾成普遍的風尚。管子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今日政治上寡廉鮮恥的風尚，使國家得到何種結果，我們可以想像而得，舉辦一件事業，還沒有進行，主持的人，便從中舞弊，先飽私囊，弄得結果，經費被私人內蝕乾淨，而事業則一無所成，如此而言建設，不但是緣木求魚，簡直是自尋絕路。舉辦的事業越多，國家社會破產越快。而社會的一般人，又簡直時時在羨慕祈求有這樣的機會到，可以大快個人的私慾。友朋同僚的互相勉勵，不在於廉恥道義，而在於計較利益的多少盈虧。官場中常聽見人說：「某人差使很好，某人缺很肥美」，此所謂好者肥者，均不外正當收入以外之進賬是已，親朋戚故相見，每以「收入多寡」，「外快有無」相詢問，今日官場形

狀如何，由此不難想見。又常聽人說，「某人做官很不錯，又不大很要錢」，此所謂錢者，亦即份外之收入是已。他人之財不可取，取者爲盜爲賊，國法明有規定，而官吏之不應要「份外錢」者，乃官吏之份應如此，並非有功於職務，何可風之有！至不大要錢而當堪稱讚贊譽者，今日官場之實況如何，又可想而知。官吏的貪贓，成爲官吏應享的權利；人民的納賄，成爲人民必盡的義務；政以賄成，官場牟利捷徑，卑鄙無恥，恬不爲怪。一般人一旦爲官，則目光所在，精力所注，不外一己的私利。地方的庶政，人民的幸福，成爲個人的犧牲品。所以今日談修明內政，第一要養廉恥以澄清吏治。這是如果做不到，政治絕對沒有修明的希望，建設的事業也絕對沒有成功和發展的可能。至如何始能養廉恥，則惟有厲行法律，嚴厲制裁，對於貪污之輩，不問官大官小，一律從嚴懲戒。

第二，嚴賞罰：有功必賞，有過必罰，這是一個最公平的原則。賞罰得法，便人人勉於向善，爭自格外努力；賞罰不公，便人人各生懈心，事業必至廢棄。年來政治現象，公務員的黜陟升遷，一憑長官個人的好惡，長官的親故姻姪以及阿附取容得長官歡心者，都不問學問能力如何，成績如何，一律升遷；其他無論學問能力怎樣強，成績怎樣好，工作怎樣努力，苟不能得長官歡心，不能奔競請託，絕對休想升遷。這樣結果，一方面便獎勵公務人員不從「事」來努力，而從「人」來鑽營；一方面便使懷才向上有志之士，永遠沒有被拔擢的機會，所以要嚴賞罰才能拔擢人才，才能推行政治。

第三，明是非：是非不明，黑白不分，這是今日政治混亂一大根源，今日政治，我們隨處都可看見無是無非的狀況。甚至朝秦暮楚，忽而爲是，忽而爲非，隨個人利害關係而轉移。個人有利的，雖非必飾以爲是；個人有害的，雖是必飾以爲非；其與個人漠不相關，雖是非顯然，亦必持模稜兩可態度，弄得是非顛倒，曲直倒置，陰霾公佈，漆黑一團，而仍然沒有人敢伸張正義。於是政治上一切寡廉鮮恥卑污行徑，都陸續的表現出來。政治道德日益墜落，官僚政客，益敢肆無忌憚，放膽做去。是非不明，政治永無清明之日，官僚政客永得匿跡其間，以擾亂政治。故今日矯正政治的是非，破除敷衍情面，務使黑白分明，這是政治很重大的要件。

第四，重法紀：政治靠法紀維繫，沒有法紀，政治便宣告破產。年來我國政治紊亂，法紀廢弛，政府官吏可以自由行動，也可以不負責任。政府法令，朝令夕更，受之者也置之不理，認官樣文章爲不足輕重，政府對於這種不法的舉動，沒有方法制裁，甚且遷就事實而承認之，遂致威信大大喪失，法紀愈益敗壞。另一方面，便是政爭也沒有遵守法紀。失敗方面，極力搗亂，破壞國家威信，亦所不惜。所以今後要尊重法紀，才能使政治健全，才能使政爭納入正軌。

以上所說四項，非常重要，應該要由政治的負責者做起，躬行實踐，以身作則，才能收挽回風氣之效。原則方面做起以後，才能談到政治建設，不然總是落空。

政治建設最重要的，也有以下的幾項：

第一，整理財政：中國財政，年來陷於山窮水盡之境，幾於全靠借債過日，寅糧卯借，挖肉補瘡，誰都知道這不是長久的辦法。可是閱三中全會財政部的報告，去年二月起至三中全會開會時止，沒有舉債，結果竟能使收支相抵後尚餘二，四五三，一八五、一九元，這不能不說是個自來未有的好現象，同時也可以看出財政如加整理並不是沒有辦法。財政的整理，一方面在擰節開支，一方面在整頓稅收。目前國難期間，中央實行緊縮，支出已大大節省。收支適合，於量入爲出方面，可說已經做到；稅收方面，各項國稅，財政部歸併爲關務鹽務及稅務之大機關，並標示向改良間接稅一途努力，循以下的六原則，（一）減少稅收之種類，（二）實行劃一稅率，（三）裁廢各種二重稅，（四）歸併各種稅收機關於關鹽統稅三大機關，（五）裁減冗員，（六）實行文官制度及保障制度，使服務人員之薪給地位得以穩固，黜陟升遷，一以勞績爲標準。財政部所舉，都是就其舉舉大者而言，我們很希望他能夠切實做去；但是我們總以爲稅收方面，積習相沿甚深，仍不免有若干弊端未易發覺，或未能革除，要使人民不感繁苛之苦，收入復涓滴都歸國庫，則今後仍須有切實整理的必要。財政是國家的命脈，民生國計關係所在，所以不能不更嚴密注意。再則地方的財政，需要整理也甚急切，各地財政，現時差不多都陷入於紛亂的狀態中，也可說多數已瀕破產。據報所載，四川有的地方，田賦已徵至民國一百年，

其他各省，也很多已經預徵了十幾年，地方財政如此，地方人民，其何以堪，來日方長，尤須籌劃一良好整理辦法，使各地財政都能夠均衡發展，關係民生甚大。

第二，刷新教育：中國興辦教育數十年，可說完全失敗，便是因為教育的制度和內容都是盲從外國的主張，而沒有審察我們國家民族的需要。三中全会通過改革教育制度案，標示國民教育，生產教育，師資教育，和人才教育四項，確能適應中國最急切的需要。今後教育循此制度，當不難於刷新。但是：目前學風浮薄囂張，學生程度日下，學校設備簡陋，經費缺乏，真是像胡適說：『東鈔西襲的課程，朝三暮四的學制，七零八落的設備，四成五成的經費，朝秦暮楚的校長，東家宿而西家餐於教員，十日一雨五日一風的學潮』。種種學制以外的缺點，尤應該要力圖救濟，才有刷新的希望。教育爲立國根本，影響國家前途至大，政府應該要具有刷新整頓的決心，與實際的一步一步做去，始克收效。

第三，培植社會重心：中國社會最大的不安，誰都知道是土匪爲患。目前兩湖及河南安徽，亦匪十分之八九已告肅清，所餘殘匪無幾，幾年來赤匪毒箠，不久即可完全消滅。不過中國自來有土匪國名稱，而現時赤匪之外，其他散匪搶劫，隨地都有，這些匪的發生，都是因爲受生活的壓迫。所以挺而走險。處置的辦法，除清剿外，還須注意扶助社會生產事業，救濟農村經濟破產，使一般貧民都有謀生之路。這個問題是很麻煩而很重要的，要用政治來解決，尤其政府和人民都要通力合作。最重者

便是在地方上要培植各個重心，做地方人民之領導，於是政府的政策，總能一一見諸實施。

第四，整頓國營事業，今日國營事業，大多內容腐敗，應該力圖整頓改良，當此國家財政困難的時候，凡賠累的事業，尤不應隨意擴充，妄事增設，以增加人民的負擔。國家建設事業本來是以社會國家的福利為目的，並不一定要計較盈虧，但是也要看看是否急切的需要和是否與經濟情況相適應，不然，盲目的建設越多，虧累越重，結果只有陷到破產的地步；而且建設之後，不是整頓，又何貴乎乎有新事業之建設。所以目前最要的便在將原有的力謀整頓改良，以裕收入，

第五，釐定官制官規：今日我國機關組織之重複，現行官制官規之紊亂，可謂達於極點。今日政治之無進步，良法美制之不易推行，一切政策之不易發生實效，此亦其原因之一。蓋以其本身之不健全，更何從希望其有健全之結果，然則中國機關組織與官制官規，何由一至於此？其原因則甚簡單：一為仿倣外國，取法他人；一為沿襲舊制，來自統傳，兩者之間，不能調和，重疊衝突，由此而現。吾人今日欲望政治有進步，政策易推行，非先從此整理不可。其釐定原則有二：一為在橫的方面，幅員不要太大，在縱的方面，銜接不要太多，二為機關本身組織要簡單，系統要明顯，若能合乎這二個原則，不獨事務有進步，即物質方面，亦可節省經濟不少。

以上種種，都是目前政治上最重要的工作，而且要由上到下的來實行。當這個內憂外侮最危急的

時候，我們何忍不顧實際，唱甚麼好聽的高調。現在全國人民和政府的當局，都應該要痛下決心，澈底覺悟，革除以往種種的過失，埋頭來做一點切實的工作，才是自救救亡之道。當着這個民國二十二年的新春，我所貢獻的在此，我所希望的也在此。

黨國當局應有之覺悟

民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時代公論

——爲三中全會開幕而作——

暴日強佔東北，組織傀儡政府，國聯始而決議令日本撤兵，繼而派員調查，作成所謂李頓報告書，一再延宕，正予日人以倒行逆施之大好機會。今國聯重開會議，討論報告書，倘國聯尚有公理與正義存在，則東北問題誠不難求一公正之解決矣。無如公理與強權不能併存，行政院會而不能定議，乃提交大會處理，而大會復因大國之偏袒，議而又不能決，於是乎中日年餘之糾紛，又移交十九國委員會作調解之進行矣。中國國民所希望於國聯之最後處斷者，又將有耶無耶葬送以去矣。花樣愈翻愈奇，而暴日氣焰則愈張愈大，人云中國近年委員制度流行，一切問題輒委之於會議，乃有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之誼。然而國聯開會，先則決而不行，繼則會而竟不能決矣。情勢每况愈下，一任暴日橫行，其惟始終信任國聯處理之我國國民，會後將取如何途徑乎？坐以待亡乎？抑奮起以自圖生

黨國當局應有之覺悟

一九七

存乎？千鈞一髮，此不能不急待國民之速自決定也。

憶此次國聯會議，雖日本代表松岡洋右，強詞奪理，信口雌黃，然小國代表捷愛西瑞猶能共同提案，認為：『（一）九一八後大規模之軍事佔領行動，不能認為合法自衛，（二）目前滿州之組織，係依日軍佔領滿洲始獲成立，承認此種組織，不合於現有之國際義務』，此不能不說世界尚有一綫之公理與正義存在，人類文朋尙不致於即趨破滅也。然公理儘管存在，而事實上則公理不與強權相敵，世界上諸種問題的決定，大都仍依「力」的因素為轉移，「強權即公理」（Macht ist Recht）的信條，猶未離開處理國際政治者的腦海，小國公正之提案，擋不住大國強權之壓迫，小國義憤填胸之指摘，敵不過西門一場之荒謬演說，吾人今後尙能依據公理以求是非之解決乎？抑或充實力量以求是非之大白乎？

西門曰：『中日問題並非某國未依照國聯盟約規定，事前設法和解，而向另一國宣戰，亦並非某國興兵以武力侵犯另一國之土地』，則不知李頓報告書所云：『中國方面當時遵守上峯之訓令，並無在該地攻擊日軍或危害日人生命財產之計劃，九月十八夜路軌炸裂之事，斷不能引為軍事行動之理由，故前節所述日軍在是夜之軍事行動，不能認為合法之自衛手段』，又作何解！李頓者，英國所派之調查代表也，以英國代表主編之報告書，英國代表猶不欲承認之以求解決，前後豹變如此，國際間尙

有公理是非可問乎？吾人敢斷言曰：「最少大國強國祇有強權而無公理也，國聯者，大國魚肉小國之傀儡組織也」。吾人今既知之，吾人既被詰之，今後國際問題。吾人就能理直氣壯以訴求國聯之取決乎？一失不可再失，望國人深省之！

國際關係複雜，一髮牽動全體，東亞問題實足以擾及世界和平，有如愛爾蘭所云：「遠東之和平與戰爭，影響勢必達於全球者也」。日本固為世界和平之公敵，倘不幸因東北問題而發生世界第二次大戰，日本固應負責，而中國亦不能辭其咎。『世界若竟發生二次大戰，則人命之摧殘，財產之損失，將難以數字計之』，尤非危言聳聽，誇張其詞。吾人為圖民族獨立生命計，為謀世界和平與繁榮計，吾人實不能不速尋自決之道也。

自決之道為何？就是對於東北問題，要用自身的力量來處理。否否，不止東北而已，一切凡與中國國家利害有關的問題，都要用自己的力量來決定，自助者人助，自助以外無辦法，亦惟有自助才能希望有他助。今日問題，決非東北三省土地被侵而已！亦非中國主權有失完整而已，觀於國際情勢，則今後問題之嚴重，更較失去東北為尤甚。吾人倘再不能自求生路，則所設「國際協定」，「國際合作」，勢必馬上到來，中國在形式上雖不至於「瓜分」，或到「國際共管」的地步（？），最少則「國際干涉」的情勢，實不能有所倖免。今日為中國國民之生死關頭，吾人尙能因循怠惰，偷安苟活乎

『中國今日只有一條路，『不求活則必死』，環境情勢如此，如何惟賴吾人之自決耳。

如何勢能樹立『自生之路』，國民全體固不能卸其責，而國民黨同志尤不能不負起責任，國民黨的領導者中央委員更不能不立下決心，肩起復興國家的重大責任，此吾人所以希望於三中全會之趕緊決定方策，循以邁步前進也。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吾人於此敢以國民及黨員之真誠，略貢一得之愚，爲諸君進一言：

一、中國今日最大的缺陷，厥爲內部不能團結。外患日迫，疆土日蹙，而內爭如故，黨內同志間相磨的軋，較敵黨間之鬥爭爲尤甚。此次國聯態度，尤其英國態度的突變，一面固受日人惡劣的宣傳，而內爭不息，亦是一個很大的影響。自陳濟棠發動以來，山東韓劉之爭，川黔軍閥的互鬥，以及國民黨同志間之暗鬥，都是很明顯的事實。中國人有一種壞脾氣，無論何事，全憑主觀，自己所作所爲均是，他人則均非，不量己力，一切都要自己來幹，倘所欲不遂，則從中搗亂，非至破壞無遺而不止，亦惟同歸於盡而後快。對於他人所行所爲，吹毛求疵，肆意攻擊，興風作浪，借公報私，其程度實有過於外國之反對黨對於政府黨也。所以中國人一遇當權柄政，大部分之精神則消耗於消極工作，因對方既來搗亂，自不能不講求應付方法，朝於斯，夕於斯，結果事未成而心力交瘁矣，循環演繹，政治一無進步，而國事愈鬧愈不堪聞問矣。

此不獨政治上之現象如是，對於社會事實亦如此，甚至一個家庭中兄弟間，亦莫不皆然。吾人嘗觀家庭中兄弟爭奪當家，大哥當家，二哥反對，二哥當家，大哥攻擊，不惟家事不能進步，終至分家而後止。甚至分家後就爾強我弱，構訟尋兇。此無他，個人主義與自私自利之心太強也。因個人主義心強，常以私害公，因自私自利心熾，則罔顧大體。

中國人因有這種狹隘的劣根性，在平素專喜注意他人私事小事，尤喜竊聽他人的醜事祕聞，或拆閱私信，探人隱微，友朋笑話之間，酒席茶會之上，專以他人的隱事穢聞，引為談笑資料，對於公事大事，社會事業，國際情形，學術研究，毫不聞問，習慣性成，演至在政治上專以鉤心鬥角為能事，結合小組織以為鉤心鬥爭之工具。須知政治上最壞的就是小組織，如兩領袖之間，你也有小組織，我也有小組織，結果因兩小組織相互間之暗鬥，勢必引起兩領袖之衝突，倘兩領袖間一有小組織存在，則其衝突不能免。

人類意見，當然不能相同，世界上亦絕無二個人的意見，完全一致，蓋各人天性既所賦不同，而社會關係又各具途徑也。然吾人生於斯世，既不能離羣而索居，則為達到共同生活起見，自不能不各棄小我以就大我。然如何始能棄小我就大我，惟有嚴自抑自私慾壓制私念耳。

以從政治言之：吾人既從事於政治生涯，便要有政治家所應具之風度——紳士謙讓的態度，在政

治上若有機會來幹，而且自己能幹得下去，就不要客氣，欣然毅然來幹，若自己不能幹，就讓他人去幹，既讓他人幹，便不要搗亂，自己既不負責任，便不要罵他人獨裁，包辦，在野的政治家，應有兩種態度：若不能出以友誼的態度援助政府，亦應出以客觀的立場批評政府。設一旦自己上台，就要負起責任，成敗與共，生死以之，不要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對於他人良好的建議，要以虛心坦懷來接受，心成意摯來實行，絕不可敷衍衍，虛與委蛇。

中國年來政治上謠言之多，實非任何國家可比，此固由造謠生事之徒所為，然政治家態度之不真誠，亦為重大原因之一。蓋當局者之所作所為，及其心中所欲作欲為者，常與其表面上所表白者，不能一致，聲東擊西，心口不符，此不獨其作為不能昭信於人，設一旦表裏完全相符，仍不能去他人之懷疑，貽害政治，實非淺鮮。今後欲望政治有進步，則此種態度誠不能不澈底剷除也。

「天下為公」，惟有德有能者居之，非任何一人可得而私也。人孰無欲望，又孰無政治欲望，惟奪取政權，必須採取正當之途徑，若能養德植力，終有柄政之日，如只求目的，不擇手段，縱得之又焉能安而保之！縱橫捭闔，挑撥離間，過去政潮之多，此亦為原因之一也。

復次：整頓官方，樹立綱紀，亦為今日政治上切要之圖。中國人之道德墮落，廉恥破產，莫若今日為甚。然明恥立信，講德修廉，諄諄誨誨者，大有人在。總理亦嘗以恢復舊有道德，為恢復民族精

神之要圖。無如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社會上犯罪之事件，日見加多，土匪殺人綁票案件，繼長增高，於是國家乃有懲治盜匪條例之頒布，此其亂世必用重典也。然一觀政治上之現象如何？人民之道德破壞，固不僅無知無識之人而已，知識份子，士大夫階級，亦同在一條線下進行。近年貪污案件之多，實爲古今中外所未有，政府雖一再申令懲治官吏貪污，然未聞有雷厲風行以實行之，豈真竊國者侯，竊鈎者誅乎？其他姑不具論，監察院之彈劾案件，堆積如山，究應實行幾件，此不能不求政府之反省者也。今日之要圖，厥惟養成廉潔風氣，欲達到此目的，惟有嚴厲實行法律，依法嚴究，「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無論何人，稍涉貪污者，即須治以應得之罪，不得以私害公，尤不得因人而枉法也。今日要使政治上軌道，造成廉潔政府，祇有公平的用嚴刑重典而已。

總之，中國今後之救國途徑，便是修明內政。欲修明內政，必先從「明恥立信」着手，此而做不到，遑論救國，亡國猶恐不及矣。余草文至此，適首都各界歡迎蔣委員長剿赤勝利旋京，蔣當以今後國人救國救民，要從「禮義廉恥」做起，造成有組織紀律之國家，不可徒托空言，高喊剿赤抗日。此真對症良藥，國民應銘刻五內，體驗力行，尤望負黨國責任之當局，要時刻以蔣委員長之言爲座右銘也。

建國戡亂之正道——真與誠

（民二十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時代公論）

鴉片戰敗，五口通商，自是外人勢力之澎湃，如洪水之來，波濤洶湧；而且無微不至，正若水銀瀉地一般，而中國的領土，中國的主權，適與外國勢力之膨脹成正比例，減縮削小，與日俱增，時至今日，老大的古國——中華——幾不能成爲一獨立完整之國家矣。噫，豈止不獨立不完整而已！若中國今日之局勢，正世無其匹類也。南京爲首都所在，如何莊嚴神聖，而外國兵艦砲船，鱗鱗列於江面，槍口向城對準，正如兵臨城下，咄咄逼人，國人仍昏瞶盲昧，醉生夢死，而莫之計較也。世豈有國都所在，而任外國兵艦遊弋，明槍實彈威臨其間乎！有之，則自吾中華民國始！中華國民！汝若稍具血性者，能不憤慨欲死乎！汝若稍有良心者，能不奮起圖強乎！

中國之設事改革以抗禦外國也，垂今七八十年，所謂建造堅固軍艦，所謂訓練新式陸軍，所謂創建學校，所謂開設國會，所謂制定憲法，樹立自治，所謂修築鐵路，與辦航輪，舉凡外人以之建國與國者，無不一一嘗試矣，舉凡外國之謀以改革社會，刷新政治者，無不一一仿倣實行矣。然而結果如何，曰軍艦則用以販賣鴉片，變爲少數人養生送死之所。曰軍隊用以爭奪地盤，養成私人竊權造勢之

具。曰學校徒馴養不事生產之高等流氓。曰國會則變爲走狗猪仔之遊息場所。憲法則一改再改，自治則有名無實。鐵路收入，不歸國庫，徒爲少數人發財享樂之用。航輪營業，惟飽私囊，藉供個人揮霍浪費之資。所謂改革者，如是而已，所謂刷新者，如是而已。總括言之，失敗而已。嗚呼，如此改革，如此刷新，欲國能建，欲國能興，烏可得乎？其不淪於滅亡者幾希！

失敗復失敗，循環演繹，及於今日，瘡痍滿目，遍地荆棘。租界環設吾土，形成國家內之國家；關稅據諸他人，實業毋由振作；其他如領事裁判權也，外人之居吾土而得不受吾國法律之拘束，內河航行權也，外國船舶可以自由通行於江海河川，與夫駐兵停艦，威脅國防，隨發紙幣，紊亂幣政，種種限制，不一而足，中國之不成爲國家者，世焉有能與之比類乎？最近暴日更冒天下之大不韙，大刀闊斧，強吞硬嚥，以數千萬方里之土地，不旋踵而淪於滅亡，數千萬親愛之同胞，頃刻降爲奴隸。現在東北未了，而西南東北之風雲，又將告急，正是赤白帝國主義，四面楚歌，經濟與武力，八方威逼而來，使中國行不得動不得，而將由窒息以至於死也。

外患之加，既如其般，然返觀內部則如何？農村破產，工商凋零，民窮財盡，萑苻叢生，壯者遊於四方，老者死於溝壑，流離失所，比比皆然。循是以往，人不亡我，我必自亡，野蠻之日本，固有自趨崩潰之勢，而無組織無中心之中國，亦難免陷於滅亡之禍矣。

然而先哲之唱導改革也，既如是苦慮焦思，其所用之方法，既如是良多，而其失敗之重複，亦隨改革而俱增。其故究將安在？失敗之原因果何？以聰明睿慧之吾華神胄，不能究其失敗根源，亟思振起以圖挽救乎？

然則過去失敗之原因惟何，一言以蔽之曰：「惟知西歐之物質文明優於我國，惟知從形式方面着手。」

圖圖吞棗，不求甚解，而忽略其精神方面，不知從心理建設做起。」

李鴻章之謀國也，祇見外國之堅甲利兵，軍艦重砲，未悉其立國精神如何，故惟知籌設海防，與北洋水師耳，其結果一敗於日而不能復振。戊戌之維新，有見議會制度之良善，成文憲法之美備，思移植以奠國基如磐石之安，時日過短而未見效，自不足論。卽清末之籌制憲法，議設自治，亦僅欲仿倣西洋之皮毛耳，實未究其運用憲政之道也，民元以來之改革，亦復如是，惟見他人之良制美法，而卽思仿倣之，移植之，絕未究他人所以臻於良制美法之理，亦不思扶植良制美法之道，故其仿倣移植，徒成東施效顰，重演失敗耳。

然則今日救亡之道惟何？曰惟有探本溯源，對症下藥耳。至不齊其本，而揣其末之論，絕對不能再談，亦絕對不能再用，爲若不然，亦惟有重演過去之失敗而已！

根本救治之道，就是要從「真情」二字下手。第一，要準據「真理」，第二，要養成「真情」，第三，要造成「真意」真理就是「智」，真情就是「仁」，真意就是「勇」。「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就是說智仁勇三件事爲達於天下一切道理的正道，有了智仁勇三者，天下一切事情，都可以做通，所有一切目的，均可以達到。有了真理真情真意，一切事情，小者如待人接物，個人處世，大者如政治改革，國家建設，無有不可以底於成功。易言之，個人有了真理真情真意，始可以興家，政治上有了真理真情真意，方足以建國，請申論之。

第一，真理： 今日的中國，無論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凡遇困難問題，都不欲依照真理去求解決，以糊塗含混，敷衍了事爲常用之手段，亦惟有能敷衍者佔優勝，惟有能胡混者得便宜。是故社會上友朋之中，團體內彼此之間，均以敷衍胡混爲能事，某事應如何處理，某人不應如何行爲，很少有人下一公正之批評，而作一明確決定之主張也。其結果造成是非不明，黑白不分之象，此不獨國事難望其有進步，而且構爲政治紊亂之源也。閱報嘗見監察院彈劾某：爲貪官污吏，然其結果如何，則不得而知，被彈劾者若果貪污有據，政府應明白處以應得之罪，以昭示國人；彼若非貪官污吏，國家亦應明白宣告或治彈劾者以反坐之罪，爲之洗白刷清。若一彈劾之後，卽鮮有下文，則不獨社會上喪失真理性，失去人民之信仰，而且是非不明，黑白不分，爲善者不必有賞，爲惡者亦無必罰，其淆亂

觀聽，卒致一般人民，莫知適從；何者爲善，何者爲惡，罔知擇避，固無怪乎世間作奸犯科之多也。平心而論，今日作奸犯科之多，實由於賞罰不明之故，惟有嚴賞罰，庶足以養成人民道德之基礎者，實非過言也。

又嘗見掛戒烟藥膏之招牌，而實行售賣鴉片烟者，然而鴉片烟總是鴉片烟者，決不能以其代戒烟之藥膏，恐華陀轉世，亦無爲此偷樑換柱之本領也。日前聞友人談及上海特區第二法院有一案件，法官竟不知之應如何判決也。緣有一人攜帶貼有武漢特稅局發行之印花稅票，而准在江蘇省內推銷之烟土一包，路經法租界被巡捕搜獲送院，當其訊問之時，該犯大聲疾呼曰「此土上貼有政府發行之印花，而屬公賣，且我人既已繳稅，當准吾人持有，何得謂之犯法？」法官聞言，不獨瞠目無以對，而且自問良心，亦不知應該如何判決。然而結果仍判決有罪。事件固屬簡單，然而其影響於人民道德社會人心之爲如何者，當不難據以推斷矣。古人以「不教而誅」爲可恥，今「教人犯罪，又從而罰之」天下寧有是理乎？有之，亦惟自吾中華民國始！若謂如此而能立國於今日世界者，吾決不信也。

是非不明，黑白不分，模稜兩可，糊塗鬼混，不獨使政治無進步，而且成爲政治紊亂之源者，前已言之，是故今日吾人最切要者：厥爲辯別是非，凡百事物，均依真理去求最後之解決，是者爲是，非者爲非，一刀兩斷，截然分明，善者必賞，惡者必罰，敷衍假借，一概劃化，惟如是始能正人心，

使人民有所歸趨，惟如是始能養廉恥，使人民向前應戰。

第二，真情：中國今日最大的弊病，厥爲一般人——至少爲大多數人——之不講信用，不說真話，不吐實情，專尚「虛僞」，「欺騙」，「僞作」，「狡猾」，而以「應酬」，「敷衍」，「利用」，「手段」等等爲立身處世之不二法門，一切作爲，則鮮存真情的流露與熱血的表现，無論個人來往，抑或政治接觸，均欲以此等方法爲操奇制勝之利器，一若能用最大之欺騙者，方能獲得最大之成功，能施最妙之手段者，乃能達到最後之勝利。吾人試一涉足中國社會，無往而非遭遇此種現象，一切事情，自開始以迄於終結，常旋轉摸索於此類空氣之中，若非爾詐我虞，便是彼欺此行，再不然就是相互利用，文人欲利用武人以擷獲政權，武人欲利用文人以擴充已勢，於是相互誇張，狼狽作虐，交相稱譽，在頌功成。故慣使此技者，常自鳴得意，而以真誠赤心之輩爲拙劣爲笨伯也。

請略舉數例，以爲吾言之證。商人應以「信義」爲第一，古訓所謂「信義通商」，然今日大多數之中國商人，均不講求信用，一味敷衍搪塞，故冒牌膺造，魚目混珠，劣貨充斥，到處欺騙，凡能混過顧客眼前者，常不惜卑用種種方法以爲應付，其影響於將來信用之爲如何，則鮮有計及也，政府應以「真誠」爲第一，孔子所謂「政者正也」中庸將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看做一套，惟能正心誠意，纔能治國平天下，然觀歷來政府之作爲如何，禁烟則實賣烟，禁賭暗抽賭稅，禁娼

則挨戶收捐，抗日則按兵不動，利用建設，徒飽私人囊，訂立合同，先取「抗滅心」，諸如此類，不勝枚舉。而且大言欺人，口是心非，濫發空頭支票，掛賣狗皮膏藥，因虛偽則生猜疑，猜疑的結果，往往造出許多亂源，中國政局一遇變動，則謠詠百出、人心惶恐者，其故皆由於當局平日之少說真話，不能以真誠見信於人民也。其他如銀洋乃有假造，紙幣則有假票，奸偽狡詐，五花八門，到處相逢，盡成騙局，吾人一投身社會，若非戰戰兢兢，小心翼翼，幾不能以自保自存也。由是經驗之昭示於人們者，「惟有如此如此，方能從心所欲，惟有依樣葫蘆。始能立足社會」，其結果則整個社會變成一虛偽狡詐之社會矣。此豈獨個人處世立身之艱難而已耶！整個國家將有喪於此等奇怪現象之中也，蓋以常往來來於欺詐制勝之下，則不良結果有二：

一 凡缺乏應付知識者，不易於生存，故一般人多為生存而同流合污，結果善惡倒置，以善者為例外，而以惡者為常道。

二 撒謊要撒到底，不然露出馬脚，因而平日之精力多用於應付之工作，不能以其全力貢獻於所經營之事業。

吾人今日欲出國戡亂，非立下決心，革除這種盜世欺人的惡習慣不可，尤以政治當局，更應首先力行，然後纔能正全國的人心，所謂已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也是也，倘當局能言行一致，赤心主

政，則全國人民必望風歸順，衷心悅服，正是「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一切政治改革，社會施設，無不得心應手，自然政治趨上軌道，外患何自來乎？一切妖毛鬼怪，自然退避三舍，抱頭鼠竄以去也。吾人不惜大聲疾呼曰，當今之局，惟有以修明內政着手，更惟有以「真誠」來轉動一切。內政者，猶工廠之機器也，真誠者，猶運轉機器之動力也。無動力則機器不能運轉，無機器則工廠不能生息。

孔子釋「政治」的意義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又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三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此「正」者，卽「真誠」之謂也。

第三：真意：真意就是「勇」。惟具有真意志，纔能發生「力量」，惟有「力量」，才能果斷處事，不論個人立身，國家建設，都是一稱。中國一般人都帶有幾分「精神萎靡，意志薄弱」的稱號，所謂「麻木不仁」，「優柔不斷」，「因循怠惰」，「偷安苟活」，「困疲懦弱」，「退縮畏懼」，成爲今日普遍的現象。吾人在街衢行走，對方來者一望而辨其爲中國人或外國人，蓋外國人則挺胸凸肚，中國人常垂頭喪氣也，而且此種現象，尤以知識界爲甚，愈有知識，則愈乏朝氣，政治界更登峯造極，一個人做了三年官，一定朽木不可雕也。經驗爲一人之南針，吾人決定將來方針，自不能不遵

循過去以定去留，是故經驗愈多，做事愈益幹練，決定愈無錯誤，然中國人往往不然，經驗愈豐富，其行動愈狡猾，做事愈敷衍，待人接物，愈無誠意，處決一切，愈不負責任，而因果相生，中國官場似確非如此不可，誰人做事愈老實愈負責任，前途必定愈倒霉，誰最會狡猾，愈能指日上進，政治習氣鬧到如此惡劣者，事出有因，根深蒂固，

然則吾人將用何法以矯正之，是又不能不察其所以致此之由，約有以下數端：

第一 利害太明敏 一般人對於利害，觀察太銳利，感覺太靈敏，故知難引退，趨利避害，非常迅速，而犧牲勇敢之精神，自然無由表現。如軍人臨陣，若念及家庭兒女，前途名利，計較得失，自然不會勇敢作戰也，

第二 過去奴隸道德所麻醉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等等傳說的格言，都是使人喪失進取之精神，

第三 身體缺乏健康，常有影響於意志力，

矯正第一點，惟有以「拙而力行」制勝之，至第三點若能強健國民體格，自然可以滅除，惟第二點最重要，根深蒂固，非努力剷除不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其所謂足，所謂止，限界究在何處？何地應止？何度爲足？人類慾望，其有止足之境乎？因有慾望，乃生衝動，於是努力奮鬥，以求滿足

吾人慾望，若先以足止自居，而壓制慾望之展生，抑止衝動之興起，自然不求上達，優遊歲月，而無能用其心也。此種奴隸道德，爲麻痺吾人進取的毒劑，應從根株斬除，不惟此耳，更應加點興奮劑以犧牲奮鬥，發憤圖強，勗使一般國民努力向前，勇猛邁進，使其堅持到底，百折不回，日日如是，年年如是，以至於老，以迄於死，然後我們獨立自由國家方能建設，國難始得排除，

人類生活，不進則退，決無中間停擺的道理，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者，因其常動不住故也，西諺有云：「惟有冒大險者，始能成大功」，現在世界上許多偉大的事業，都是由於堅強的意志與勇敢的冒險所造成，吾人今日觀飛機之翱翔空際，忽上忽下，忽東忽西，翻雲覆雨，來去無蹤，其爲如何安會而自由，如何迅速而平穩，然多人應知飛機之成功，能發生今日之偉力者，不知其間經過幾許人之冒險與多少人之犧牲而交換得來，是故吾人只要認定這件事是真的，就應立下決心，毅然去做，不要左顧右盼，尤不可遲疑觀望。「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麋鹿興於左而目不瞬」，朝乾夕陽、我人應時時以此自警矣！

建國勘亂，原非一件普通尋常之事，尤其中國今日建設一個獨立自由之國家，更比任何國家爲難。如南京爲首都所在，而停在江面之外艦，居然可以拿破口向我人描準，時時監視吾人行動，時時對我威嚇，此爲世界任何國家之首都所絕無之事，而我獨有之，已如上文所述，故中國的復興事業，其

艱難險阻，荆棘叢生，直如西遊記上唐三藏面西天取經路上所經過的八十一道難關一樣，設無孫行者勇往前奮鬥到底的精神，決不能越過這個難關。我人這一代祇有一面擋住敵人之前進，一面努力開墾下種，其真正獨立自由國家之建成，恐怕還要讓諸後一代罷！開墾下種的責任，我人固義不容辭，墾如何開墾，如何植種，就要根據這真理真情真意三方面去做，然後纔有辦法。如果全國人民都有「真理」「真情」「真意」，都能以「智」「仁」「勇」去力行，纔算一心一德，如此纔是有組織之國家，日本人誣我如無組織國家，固然出於有意侮辱，別有作用，然吾人試平心靜思反省一下、現在中國情形如何？在前方拚命殺敵為國捐軀者有之。在後方做漢奸販日貨以圖自肥者有之，借共產之名而行土匪之實者有之，養尊處優醉生夢死者亦有之。似此各自為政，各不相謀，而能號稱為統一有組織之國乎？固無怪暴日之侮我辱我也，禍由自取，咎將誰歸！前事已矣，來者可追，吾人應痛自反省，吾人今後應致力於民族心理之改造，從「真」「誠」二字下手，一言一行，惟真與誠，一舉一動，惟誠與實，不說大話，不放空槍，腳踏實地，按步就班，凡事實是求實，利害在所不計，臥薪嘗膽，百折不回，以最大之努力，抱必死之決心，如是纔能建國，如是纔能勸亂。

幾何學上的定理：「兩點之間的垂直線，惟有一根」。易詞言之，兩點間的直線只有一根，而兩點間之曲線，則有無數千萬。世界上的道理，正屬如是，真的，實的，只有一個，都在一條綫上，而

虛的，僞的則不慮無數千萬。全國人民如果都能以真誠相對，自然站在一條線上，向同一方向進行。全國人民如都有同一的「真理」，「真情」，「真意」，就是所謂「萬眾一心」。從前紂之人民，億萬人有億萬心，武王之民，三千人只有一心，武王伐紂結果能以成功者，職是故也。真的只有一個，決沒有二個，我人今日的國是很明顯的擺在面前，就是「建國勘亂」，「征服日本」，我人應該照此方向、誠心誠意去做，以「真」的精神來貫徹到底，這就是中國獨立自由唯一光明之路。

菲希特敬告德國人民曰：

「此高尚之祖國愛，即對於德國全民族之愛，應為德國內部各邦之最高原則，其有忽視之者，即喪失人類獨立自尊自性，而自速其滅亡」。繼曰：

「誠心愛國者，應立即下一決心，由自身執行之。：今後之能否由惡而善，皆決於吾人之自身，天下決無有善境之求，而不出於吾人之努力者」。

我們今日也要拿這種精神，向前努力，我人看到西遊記一書，我人感覺唐三藏精神之偉大，孫行者意志之堅決，彼等只向目的地——西天——努力不懈、不顧生死存亡，不計成功利害，終能渡過八十一道難關而達於西天，這種精神，真正「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我人應效法這種意志，這種精神，抱「建國勘亂者舍我其誰」之決心，向前奮鬥。

航空救國與國民動員

民二十二年二月三日時代公論

一

現在的世界是科學的世界，現在的戰爭是科學的戰爭，惟其爲科學的世界，故世界一切的一切；無不要受科學之支配，而一切非科學的均不能適存於今日，惟其爲科學的戰爭，故戰爭的範圍，由水陸而擴充至於空際，戰爭的武器，由槍炮軍艦而進於使用飛機。

飛機是科學的產物，自從歐戰以還，應用於各種方面，其效用之廣，威力之宏，莫可凌比，世界各國更積極不斷的謀改良與擴充，所以飛機的發達，一日千里，只有百事落後的中國，航空事業，到現在仍然幼稚不堪，總理在十年前便提倡「航空救國」，以現在與總理當時比較，雖然全國飛機增多幾架，但實際上依然毫無進步。去年淞滬之役，最近榆關之戰，日本飛機之跋扈橫行，而我國之飛機則消聲匿跡，自過去一年來中日的戰事觀之，並不是我們軍隊戰鬥的力量和奮勇的精神不及日本，而是日本的空軍充實，飛機發揮其作用，盡其轟炸能事以威脅我軍隊，使我軍隊不得不幾次三番以血肉來抵擋飛機的轟炸，結果全部不能支持，乃不能不一退再退。此係很明顯的事實，淞滬之役，參與戰爭的翁照垣將軍事後很痛心的表示說：「只有飛機，才能抵禦飛機」。當茲外侮憑陵國勢危急之秋，吾

入應認清「航空」之重要，急起直追，發展航空事業，纔能談得到抵抗與自衛，才能達到禦侮以救國。進一步言之，我們若空軍充實，進則可以攻，退則可以守，攻守自如，則暴日之凶饑蠻橫夫何足懼，敵人之繁興都市與工業重心於必要時我們亦可以轟炸破壞矣。

關於飛機之用途與航空之重要，可分軍事與普通兩方面論之。

二

先從軍事上觀之：現在空軍的力量與效用，已寔寔乎凌駕陸海軍之上。未來的戰爭，很明顯的已不是平面的戰爭，而是立體的戰爭。無論海軍或陸軍，都不免受空間之限制，惟有空軍則可以行動自如，海闊天空遨遊橫行。在未來大戰爭中，空軍一定益顯示其更廣更大的威力。一九一八年德廢帝威廉第二說：

『將來世界大戰第二次開幕後，不出二十四小時，全歐洲的大都市，由於轟炸機的襲炸，將盡化為焦土，彼時歐洲文明，亦隨之而滅亡』。

一九三一年意大利某飛行家舉行橫斷大西洋飛航之時，意大利航空大臣致詞說：

『飛機是本世紀文明所產生的最可怕武器，意大利現雖有陸軍十師，兵艦三十萬噸，然若空中防禦虛弱，則我們的軍需工廠，倉庫，鐵路，港灣等等之設備，皆將在頃刻之間，被敵人轟炸而喪

失戰鬪的能力。所以我們要組織優良精銳空軍，才能抵抗外國」。

我們從這寥寥之數言，當可想像今日空軍在軍事上之重要矣。

未來的戰爭，毫無疑義的是工具之戰爭，而工具最便利最靈敏者，更毫無疑義的便是飛機。吾人今日縱談東北事件會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並亦深知第二次大戰無疑的要以中國為屠殺場所，更將由此戰爭而決定中國民族存亡的命運。帝國主義者正躍躍欲試，而太平洋風雲日趨險惡，其爆發則無疑，惟時間之遲早耳。然吾人所欲問者：吾人對於大戰，有無準備？吾人有無應付未來大戰之工具？吾人如以過去內戰所使用之方法與工具，而用於應付未來之大戰，此無異於以卵投石與以螻蛄撲火，其悲慘的結果實不能有所倖免。

未來戰爭之殘酷與恐怖，我們只要以歐戰所用之兵器來比較現在的兵器，以歐戰的結果來想像未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我們便可瞭然，現在帝國主義者擴充軍備的特徵，不在數量之增大，而在專注力於機械化與技術化之發展，大多都沉迷於新式兵器與毒氣之研究和發明之狂熱中，瓦斯與電氣之應用，尤為廣汎，殘殺轟燬之技術，較之歐戰當時更加大了強度與高度。

再就航空技術言之，亦有驚人之發展。飛機散放毒氣在歐戰當時尚未發明，現在則一機飛馳敵人陣內，能散放廣大面積之毒氣；航空力比前增加十倍；偵察機和轟炸機的力量增加百分之三十至百分

之七十；飛機上機關槍之火力增加六七倍；投炸彈之速度增加四倍。此種種機械之改良與技術之進步，其破壞力量當然較歐戰時加強數倍無疑，但歐戰之淒慘光景，已令人可驚可懼矣。歐戰交戰國總動員之兵額為六千萬，結果直接死亡官兵約一千萬，殘廢一千六百萬，俘虜五百萬，此外犧牲三千萬萬元以上之金錢，而各國人民直接間接生命與物質之犧牲，更無法統計。第二項世界大戰結果，益加淒慘，當可想而知。帝國主義者之對立，一天比一天尖銳化，無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戰，一天比一天逼近，當茲浩劫將臨的前夜，我們有沒有準備我們的工具？我們有沒有充實我們的實力足以應付這非常的事變？我們更有沒有與暴日周旋到底的決心？

可憐的中國軍備，更可憐的中國空軍，我們一想起來，真是不寒而慄，我們際茲大難臨頭之時，始興起提倡空防，始回頭實現總理十幾年前所提倡的「航空救國」，可謂遲之又遲。然而亡羊補牢，猶為未晚，我們今後若何各盡力之所及，設法補救，或者我們當前的厄運尚有挽救之望！如再癡迷不悟，中國前途，益將不堪設想，而我們却仍在夢中，真是所謂，「自作孽，不可活」了。

三

航空與軍事關係之重要，已略述如上文，人人類能知之，抱着人道主義的先生們或許會疾首蹙額，以為飛機是殺人的利器，便斷定航空於人類為有害無益，事實則大謬不然。航空的效用，決不止於

軍事，統空和民生，殊有重大的關係。自從十八世紀以降，蒸汽機，電氣，火車，汽車等相繼發明，交通愈見便利，人類的時間愈益經濟，到了飛機發明應用於交通事業成功以後，交通情形更爲之大變，人類的經濟生活也受到極大的影響。我們試把現在幾種交通方法每一小時的最高速度來作比較，便知道飛機在交通上的關係；

交通方法	每小時速度
賽跑	二一英里
跑馬	三九英里
腳踏車	五七英里
火車	一一〇英里
汽車	一六三英里
飛機	四〇二英里

在右列表中，很明顯的只有飛機方是交通最優越的利器，所以飛機是最進步的交通工具，現在世界各地的關係日趨密切，水陸交通的工具，因受地面海面種種的限制，不能使一般人盡能滿意。所以航空的發展，必然跟着人類文明進步而前進，航空在交通事業的前途是無可限量，因爲飛航的航程，

爲起迄兩點間的直線，高山，大洋，沙漠等，都不能阻礙其進行，這是人類征服自然的一種奇績。現在火車、汽車和輪船爲交通上不可少的工具，但是航空器具在不斷的進步改良之中，不久必定達到安全保障的地步，而取得今日火車、汽車、輪船的地位，是一定可能，吾人更斷定其成功必不在遠。

茲進論飛機與民生之關係爲如何：

第一，從農業上來說，飛機與農業：

美國便很早用飛機來散播種子和散播殺蟲的藥料，較之人工散播，可以節省一半以上的費用，而且無論峻嶺高原人工所認爲很難散播的地方，飛機都能在瞬息之間，散播完畢。譬如用牲畜牽引的機械，每夜只能散種三十畝，要是用飛機，一個下半年便可散種二百畝至一千畝。又如欲散佈殺蟲藥料，可先將受害區域在空中拍一照片，然後再照這照片，選擇飛行最適當的路徑，以求得最高的效率。其法乃置藥料於飛機中一漏斗內，散播時開放漏斗，藥料從下端漏出，被螺旋槳的風力所吹動，可散開成爲一塊約三百呎寬的路徑。用這樣散播的方法，極爲均勻，收穫量可以增加百分之三十三，蘇俄也用這種方法，來改良農業。

第二：飛機還可以防救森林的火災：

廣大無垠的森林，一遇火災，往往延燒很廣，及至發覺之時，已受很大損失，如果用飛機巡視告警，一遇火警，用飛機來施行撲滅，和運送救火人員及器械到發火地點施救，都可以收到很大效果。

第三，飛機可以測量地圖：譬如在地面上，要測量高山峻嶺及地方形勢，極感困難，而且亦不正確，若用飛機實行空中的測量，種種困難都可不成問題，而且有許多的優點，（一）地上測量多費時間，空中測量，只要數小時便可完事；（二）空中測量比較地上測量用水平儀器，較經緯儀器等爲詳細；（三）地上的景物和形勢都可以攝入照片，而且極準確；（四）費用較地上測量節省甚多。

第四，飛機可以便利海洋救生：接到海洋船舶遇到危險請求救護的電訊後，可以立刻派飛機前往偵察並擔任救護的工作。歐美各國大半已經實行此法，收效甚宏。

第五，飛機可以便利調劑金融：譬如某地方銀根吃緊可以由他處用飛機連送金錢以爲調劑，此種方法，直接所以救濟金融業，間接即所以維持商業，而人民生活，也受到很大的益處。

飛機之有利於民生者甚多，一時真是言不能盡，譬如飛機運載搭客和貨物，更是人人所知道的。歐美各國，航空事業，天天在突飛猛進中，試問我們中國怎樣？言之惶恐慚愧，我們總是事事落在人後，尤其航空事業相差真有天壤之隔，我們天天講救國，但是何所恃而能救國？究竟做了那一種能夠救國的事業沒有？我們再不要沒有計劃的不負責任的亂談救國的主張，我們要切切實實的把航空事業發展起來，來充實我們的軍備，來改善我們的民生，這便是我們目前最急切而最切實的救國工作。

四

航空與軍事及民生之關係，以及「航空救國」意義之重要，我們大概都已經明瞭，但是，我們要怎樣才能達到「航空救國」的目的呢？換句話說，就是我們要用甚麼方法來促進航空的發展？我們曉得，發展航空，是全國民共同的責任，同時也是政府不能推卸的責任，所以發展航空的方法，可以分政府 and 國民兩方面來說明。先就政府方面言之：

第一 訓練航空人才

航空事業，經緯萬端，然其最重要而又非須臾之間可成者，莫過於人才之訓練。航空人才的訓練，有二方面的意義，一為駕駛人才，二為製造人才。中國與辦航空事業，提倡航空救國，為時不可說不久，然直到現在仍然沒有顯著的效果，雖然有很多的原因，而人才的缺乏，實為此很多原因中的最主要者。如在技術方面，駕駛人才幼稚。甚至於連幼稚的人才亦不可多得，所以要靠得住一點的飛機師，只好利用外國人才，同時在製造方面，雖然滬粵兩地之飛機製造廠也曾製造過幾架飛機，但都是渺乎其小，比較外國製造的，不特數量很少，而其實質亦相差很遠，所以要好一點的和戰鬪用的飛機，只好向外國購買。航空駕駛人才和製造人才的缺乏，實為航空發展之最大障礙。訓練航空人才的辦法有三：（一）增設航空學校：擇內地地點適當的地方，計劃增設航空學校數所。我們看日本公私立的航空學校有十餘校之多，便知道日本航空事業的發展，並非偶然。（二）國立各大學校中就其理工科

設備完善者添設航空科：這是顧慮到現在經濟困難的情形而想出的辦法，至於其他的公私立大學，平時應該鼓勵理工科學生研究航空學，使其對於航空學術的研究有高深的造詣和新的發明。（三）考選國內航空學校學生留學外國：使其更求深造，吸收外國優良的航空學術。

第二 籌設大規模的航空製造廠

我國自有航空以來，所有航空飛機，大多數購自外國，製造廠雖亦備有一二，皆皆簡陋非常，只能仿造飛機附件與小號飛機，即此簡陋之製造，其原料仍輸自外國，長久這樣下去，終屬危險異常。一則金錢外溢；二則航空機械的供給操之外國，如果和外國發生戰爭，沿海被封鎖，外國來源斷絕，中國的空軍一定因材料缺乏，無法施展，坐以待斃。何況中國現在所謂空軍，其翱翔空中而詭以自豪者，僅在內戰的時候才能夠發揮作用，如用以應付國際戰爭，直若螞蟻撼大樹，莫想有損毫髮，現在世界上空軍之實力，以美國為最強，美國如和外國發生戰爭，全國工廠能夠在一個月內趕造飛機二萬架，此種製造力量該是多麼可驚！我們現在雖不能夠到這種進步，但最低限度，一個比較大規模飛機製造廠，能夠製造好用一點的飛機，無論如何是絕對需要的，我們希望政府趕快實現這個建設，我們全國人民應以全力援助政府。有了製造廠，並可修理飛機，因為飛機壽命甚短，最多不過三數年。此外飛機廠內對於各種汽車。尤其與戰事有關係之長途汽車，運輸汽車等等，亦應附帶製造。現在都

買人家現成的，一到戰時，便不能進口，其於戰事危險可知。

第三 設立鋼鐵廠硫酸廠硝酸廠

與製造飛機有連帶關係者，厥爲鋼與鐵，我們知道今日的世界是鋼鐵的世界，若沒有鋼鐵，平時已無辦法，重工業不易立足，一到戰事，更是不了。飛機的材料，非鋼卽鐵，苦自己沒有煉鋼鍊鐵廠，徒事仰給於外國，縱設有大規模的飛機廠，亦不能運用自如，正猶人之具有跛足而不能自由行動也。同時鋼與鐵均是製造武器的必需品，如自己不能產生鋼鐵，在今日世界直可云缺乏立國的條件。中國並非不產生鐵，惟不講求鍊冶之道耳。

現在中國兵工廠所用的材料、如鋼如銅如鐵，多是購自外國，十之八九是仰給於日本，因其價廉故也。似此而猶欲與日本開仗，簡直等於開頑笑，故今後非亟謀設立鋼鐵廠不可。

硫酸硝酸都是製造火藥所必需的原料，今日均輸自日本，真是危險萬分，而且言之可恥。我們此次要下決心對日本作長期的奮鬥，所以對於這些戰爭上所必要的物品，都要自己來製造。硫酸硝酸不僅製造火藥是必要，而且在一般工業上用途甚廣，爲一國工業上之靈魂。

第四 廣設航空線站

要發展航空，鞏固空防，則各地航空線和航空站，應該要迅速規劃籌設。我們中國幅員廣闊，邊

疆偏僻地方，交通很不便利，如果各地都建築鐵路和公路固屬很好的辦法，然此非一時所能談得到，航空交通的建設，則是輕而易舉的事。航空線站雖然要購場地，並要有測候所無線電台和其他設備，但都是比較鐵路的建設省儉得多了。何況航空的交通，有許多的特點，而且航空線站設立以後，同時也是一種空防很重大的建設。近代軍事家說：『沒有空防，便沒有國防』，空防之重要如此，航空線站應即迅速設立，這是很需要的。

第五 添購戰鬥機

中國現時既不能自己製造可用的飛機，而現有可用的戰鬥機又很少，為應付目前國防的需要起見，只有添購戰鬥機這一個方法。據說我們中國在『九一八』事變以前，全國的飛機大約四百架，然其中東三省有二百六十架，佔半數以上。『九一八』以後，全國最完美的東北飛機場和佔全國半數以上的飛機，都陷落於日軍之手，以後雖然也稍有添購，但全國現在的飛機，統計全數也只有二百架左右；其中半數以上是練習機小型的飛機和陳舊的破機，可以作戰鬥用的，不及百架，空軍力量這樣的薄弱，如何能應付當前的大敵呢？所以目前的辦法，只有希望政府設法多多添購戰鬥機，擴大空軍的力量，才能應付將來太平洋戰爭的大變局。

第六 獎勵組織商業航空

商業航空和軍事航空可說有同等的重要，平時既便利交通，並可訓練和保持無數的飛機和飛行的人員，一旦戰事發生，立時可以組織空軍。現在世界各政府，都極力獎勵商業航空，所以要觀測各國的空軍力量，決不能就其空軍本身，同時對其商業航空也要深切注意。商業航空，可說是軍事航空的變相，譬如德國自訂凡爾賽條約以後，被限制不准有空軍的設備，但是德國政府則變更方式，極力獎勵商業航空，雖每年營業入不敷出，政府亦不惜子以大量的津貼以維持之。所以德國商業航空的發展，辦理的完善，規模的宏大，直使歐洲各國，驚懼不安，我們於此，可以見商業航空的重要。

其次就國民方面來說：

第一 國民應輸財購置飛機

國難危急到這地步，而我們的空軍更這樣的幼稚，雖然要政府今後極力的擴充，以圖補救，但我們國民，也負有發展空軍的責任。因為現在戰爭和以前戰爭的觀念不同，蘇俄領袖斯達林說過：

『從前的戰爭，以軍隊為範圍，今後的戰爭，以國民為範圍』。

未來的戰爭，不但前方的軍隊和軍隊作戰，後方的工廠，產業，經濟等等都在作戰的狀態，可說是此方全體國民和彼方全體國民作戰，而這種國民和國民作戰，較之軍隊和軍隊作戰，更為重要，所以未來戰爭關鍵，可以說不是決勝於疆場，而是決勝於後方。換言之，是決勝於兩方國民的全體。未

來戰爭既是以國民爲主體，所以必須挫折敵國國民生存能力，才能夠獲取戰爭的勝利。換言之，在着迫敵國屈服的前提下，縱使敵國全國土地淪爲焦土，全國的人民炸爲肉泥，也是戰略所許可的。未來的戰爭，是絕對沒有人道和正義可言的，所以戰爭的發生，全體的國民都要動員，戰爭未發生以前，全體國民，都要未雨綢繆，絕對不能絲毫沒有準備，我們國民，對於這一點，應該要有深切的認識，我們現在提倡『航空救國』，可以說就是國民自救的方法。然如何始能達到『航空救國』的目的，國民方面，無疑的當前第一步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大家輸財來購置飛機。希望我們國民，深明大義，慷慨解囊，以實現『航空救國』這一個很重要的主張，達到每縣購置一機之目的。

第二 國民應投資於航空事業

民用航空的重要，我們大概已經明瞭。我們中國在現在航空事業這種幼稚的情形之下，要單靠政府的力量來經營，恐怕很難有長足的發展。譬如現在政府所經營的中國航空公司，通航的只有滬蓉線，由上海經南京安慶九江這一條航線。京平線雖曾一度開航，現在可以說又告停頓。正在籌備中的歐亞航空公司，還沒有一條航路正式開航，我們全國國民應該要自動起來促進航空事業的發展，決不能痛癢毫不關心。

以上所說，不過就其舉舉大者，疏漏的地方當然很多，一時也說不盡，不過現在世界各國，對於

空事業，無論在軍事上民用上，都競爭不遺餘力，不但在量一方面竭力的增加，就是在質一方面也竭力改善。如現在有所謂無聲飛機，隱色飛機，如無線電操縱飛機等，在這種不斷改良進步之中，而我們却連一點簡陋的航空設備都沒有，這是多麼可恥可羞的事，我們現在，應該全國上下，協力來發展航空事業，這是當前最急切的任務，只有負起這個任務，才能夠拯救垂危中國。我們希望「航空救國」的主張，不要像十幾年來情形一樣，長久沒有人注意，以致沒有一點進步，我們要把這個主張迅速的實現，而且要堅忍的長久維持下去，切不可像五分鐘的衝動，馬上又復歸原態。（完）

外國糧食傾銷與我國農村經濟

廿一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晨報

——深望政府急起圖之——

我國今年年歲除匪區人民因不能耕種外，各省大都豐收，每畝收穫之量，多超出常年平均以上，誠不能不謂爲一國民食之好現象也。去歲荒及十六省，荒年之後，必有豐收，地力未減，理應然耳。政府倘能通盤籌畫，確實統計，以豐收各省之餘糧，救濟匪區之民食無虞。且有無相通，而豐收各省糧價之跌落，亦可資以調劑：一舉兩得法至美善，且能如此做去，一年所需糧食，必至相差無幾，縱或相差，亦屬有限；斯時或購外米補充或借美麥接濟，視經濟情形而決定均無不可。乃政府計不出此，在糧市慘落靡已之時，忽有大批借貸美麥之舉，以致米麥市價，聞風益跌，幾至不可收拾。

關於借貸美麥一事，據報紙記載：謂續貸數量約有四十五萬噸，價值美金一千二百萬元，合華幣五千萬元，其抵押品及運送辦法，係由財政部美顧問與美國財政善後公司駐滬代表會商云。

借麥消息傳出後，各地人士，羣起反對，最近上海市政府根據糧食委員會之呈請亦代電行政院，請勿再借美麥，免傷農村經濟。蓋恐美麥運華傾銷。國產糧食必至遭受壓迫，價格益趨跌落，而農村經濟之破產，勢必不能苟免。惟聞政府對之並未中止進行，且爲之辯護曰：匪區糧食缺乏，借麥原爲

救濟匪區民食耳，故雙方代表，仍繼續會商。因是糧市慘落，日甚一日。據報載上月三十一日上海糧米市價竟猛跌至四五角之多；又據五日晨報經濟新聞，載有上海麵粉四日行市慘跌至一兩六錢，爲近十年來最低紀錄，並云：『本埠粉商鑒於外電之連跌不已，已屬虛糜不堪。况現時外麥又值新出之際，欲望回振：難若登天。更鑒於報載美國二次借華之洋粉洋麥。勢必源源而來其前途極呈悲觀。……查民國十一年份麵粉市面，曾小至一兩七錢一分，至十三年間亦曾小至一兩七錢不料昨又小一兩六錢七分五，竟超過十三年間之最低價格，造成十年來之新低價，殊堪驚人。究其故，一言以蔽之，無非受外人經濟侵略而已。』

我國今年米麥市價之低落，實爲十數年來所未有，其原因是否直接出於借貸米麥，固不敢必，然外米洋粉之源源來華，跌價傾銷，當爲重要原因之一。是故今日欲調劑米價救濟農村經濟對於外米之無條件的輸入，實不能不加以嚴厲之限制也。以愚意度之，今年米麥之跌落，約有以下三種原因：

- 一、產量豐富，目前供給超過需要；
 - 二、因一二八事變而經濟秩序破壞，人民購買力減少，米商無力購囤；
 - 三、外糧大量輸入，跌價傾銷；
- 糧食一項，當然受普通經濟現象之限制，不能越出需要供給之範圍，今年各地豐收，市場供給一

定超過需要。加以年來天災人禍，鄉民經濟窮困，缺乏囤積能力，故新貨一出雲集市場，價格自然跌落。而一般米商及放款者因受滯變影響，經濟枯竭，停止買進，致堆積如山之貨，無法可以推銷，同時關稅率低，外米源源進口，壓倒市場，跌價拋售；在內地米賤幾至無人購買之時，上海中級以下居民仍食外米，於以上原因之外，而政府突又有大批借貸美麥之舉，其欲糧價之不慘落，烏可得乎？

爲今之計，政府應速實行以下四策，以安定米價。倘不察癥結所在，而仍一味因循，則國產糧價，必更慘落至於不可收拾之地步，而農村經濟，定將破產至於萬劫不復之境矣：

第一 停止借貸美麥；

第二 增加進口糧食稅率；

第三 禁止徵收米捐（如安徽米照捐之類），使產額過剩之糧食，得以運銷於荒歉之省區。

近十數年來，百物騰貴，高至一倍或一倍以上，而米價則騰貴有限，往年價雖較高，然亦能追隨其他物價，比例循進；荒年固不必論，豐年人民亦常有不能溫飽之虞，蓋以其所入每不足以償其所出也。且近年農村秩序不寧，兵匪常出騷擾，苛捐雜稅，疊疊重重，故農民多棄農改業；不特農田荒蕪，失業增加，而兵匪來源，多由於此。我國以農業之國，農民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倘再不速籌補救，豈惟農村經濟將陷於紊亂不可恢復之境也。事實擺在面前，非敢故作危言聳聽。深望政府當局

急起圖之！

我們要準備進攻纔能應付國難

廿二年一月
載大公報

同胞們！我們始終以抵抗爲前提麼？我們以唯一的抵禦就能保全民族不致滅亡麼？唉！敵人攜槍擊彈的打進門來，我們就反應着一種抵抗的應戰，更全體一致大聲疾呼曰，禦侮救國，抗日自衛。敵人若一旦終止進攻，或暫時休戰，我們亦隨着他人之終休而停歇的反應的變化，不抵抗，天下太平，復上行下效的依然還玩着舊時的故態——貪安，好逸，酒色，財迷，縱橫，捭闔，賄賂，貪污……。

這樣循環演繹，不但我們民族的缺點，暴露無遺，我們這個民族，實在太沒志氣，太無出息了！二十世紀——弱肉強食——的今日，我們這樣消極苟安的態度，還想能夠生存嗎？人家孜孜向上，川流不息的努力，發展，充實，進步，我們依然着天下太平，苟延殘喘的優遊歲月，我們還配做世界的一員以圖其同生存嗎？我們又焉能並駕齊驅，以與其他民族馳聘逐鹿於生生不息的修羅場嗎？

同胞們！我們始終不能採取進攻的態度麼？我們總是被動的跟着人家後面跑麼？敵人進攻上海，我們固守閘北，敵人擊破閘北，我們又退守瀏河，崑山，敵人進佔榆關，我們防守九門口，迫敵人攻破九門口，我又退守石門寨，柳營寨。敵人進攻靡窮，我們退守益速，敵人節節前進，我們步步退休。

我們要準備進攻纔能應付國難

。唉！錦繡山河有限，暴日慾壑無窮，中華民族！你將退往何處去？希瑪拉亞山嗎？嗚呼！中國民族休矣！

同胞們！抵抗主義比溜之大吉固然高明得多，然抵抗終極是被動的，必待敵來侵犯，然後才去抵禦。被動的東西終是跟着人家行走，命運係由他人決定。我們現在要由被動變為能動，我們才能生存，我們要從能動變成自動，我們才配做人。被動是奴隸之性，仰承主人鼻息而生存，一切由主人去支配，決定，主人叫你生就生，主人令你死就死。「一天不脫奴隸性，一天不得做主人，一天不能做主人，一天生存由人定」。唉，黃帝子孫，世界最高文化所結晶的中華民族，難道永遠地毫不覺悟地這樣生存下去嗎？

中國民族今日的動作，是：

「敵人來了就慌張

敵人去了又頹唐」

一針見血，這十四個字可為中國民族今日心理的寫照。毫不客氣的說一句，今日上自政府大員，下至鄉村百姓，他們心理的象徵，沒有一個能逃開這個範疇。然則孰令致之，天天喊着「禦侮救國」「長期抵抗」的先生們，實不能辭其咎。因抵抗喊得高唱入雲而無確實準備，於是敵人來了就不能

不立現慌張，因抵抗喊得起勁而無奮進的情緒，待敵人一去又自然而然的復歸頹唐了。

同胞們！人類生活不能一刻停止，「不進則退」，就如大地時刻轉動一樣，無時停休，我們身體是時時刻刻生長的，由少而壯，由壯而老，生生不息，進展靡窮，我們的精神也是如此，世間凡百事物，亦莫不如是。所以我們「不求進」，則必退，不能上前進行，勢必往後退下，決無立在中間停擺不動的，停擺不動，就是死去，如鐘之振子一停擺動，時鐘即刻死去，計時的效力馬上消滅，死物猶且如此，何況以生為存在之生物乎！又何況以生為靈之人類乎！

同胞們！應付國難亦如是，暴日侵略亦如是，我們若只求苟安於國難，國難是永遠不會減少的，遑論消滅！我們要超越國難；趕過國難，我們才能減少國難，才能消除國難。對於暴日侵略亦然，我們若天天只喊抵抗，不但抵禦暴日不住，東北失地收復不回，榆關繼續陷落，即熱河亦不可保，平津華北亦難望其安全，以往經過，即屬明證，事實俱在，不必諱言。我們若想制止暴日侵略，趕出敵人於國土之外，我們要超越抵抗，迎頭痛擊上去。出以攻擊的態度，採取進取的方式，我們才能擋住日本侵略，才能保全國土，才能收復失地，才能保障和平！

同胞們！我們只管拱手靜候的老讓敵人來進攻淞滬，襲取東北，佔領榆關，組織傀儡，我們就不想着進擊京濱——東京與橫濱——襲取阪神——大阪與神戶——麼？我們固不欲做帝國主義者，亦不想侵佔領

我們要準備進攻纔能應付國難

士，奪取財富，然我們爲世界和平計，實不能不給彼殘忍無類的日本人以嚴重的啓懲，我們爲保全國土計，亦不能不給彼貪慾無厭的日本人以創痛的教訓。日本人自開國以來，事事走着上風，每戰必得便宜，卽此次人財幾捐無算之世界大戰，歐洲各國無論屬於戰勝者或戰敗者，言之無不心酸，時時引以爲戒，而數得便宜的日本，在此期間，猶能攫獲厚利，大發戰財，自然高興百倍，視戰爭爲有利可圖，以戰爭爲發財之具。一般日本國民，祇知戰勝的光榮，版圖的膨脹，從未自覩戰爭的慘酷，亦未嘗受砲火的苦痛，無怪乎其幸災樂禍，天天希望戰爭。再加軍閥野心家，妄肆宣傳，煽惑挑撥，更不期然而然的把一般國民引向戰爭的狂熱之路矣。

同胞們！我們要矯正日本人經驗的錯誤與思想的荒謬，我們實不能不使日本人嘗受戰爭痛苦的風味。我們要趕緊移轉戰爭場所，攻進日本國土，燒燬繁榮城池襲擊重要都市，打殺日本生靈，使日本人嘗些飛機的威嚇，砲火的震驚，與目擊戰禍的慘酷。我們無論戰勝戰敗，總要使日本人領略戰爭的經驗，使日本人以後不致如此橫蠻，猖狂，正如使其受着地震的慘痛一樣。日本人一聞地震，莫不驚心動魄，鬼哭神號，東逃西竄，喪失神魂。小孩子怕地震更厲害，猶如怕父親一樣，有一句俗語，「地震如父威」，以其受地震慘痛經驗太多耳。

同胞們！民族精神是要建築在心理上面，抵抗的心理是消極的，進攻的心理才是積極的。我們今

後要造成積極的心理，養成進攻的精神，國難才能消滅，強暴始能退去。和平要用血與肉換來，和平才有價值，惟具有實力，始有真正和平，總理說：『我們對於西洋文化制度，要迎頭趕上去』，我們今天對於日本人的侵略，也要迎頭痛擊上去，

同胞們！我們既然決心進攻，我們要全體總動員。總動員的意義，大家不要弄錯，有簡單二句話可以表明，就是「各盡所能，各竭其力」，有刀者，上前衝鋒助陣，有財者，在後接濟糧餉，其他一切運輸等等，竭盡國民全知全能，以從事於戰爭工作。

德總理施萊轍一月十五日在柏林日耳曼立國慶祝大會，曾大聲疾呼，警告國民曰：

「日耳曼之存在，由於陸軍之榮譽的功績，德國自由人之象徵，為執戈之權利」。又曰：

「彼自始至終均責成國民之應具強迫軍事教育，此非為擴充軍隊設想，實人民於危急之秋，應各具捍衛邦國之決心及準備。」中國今日已至存亡危急關頭，全國人民，應一致奮起，準備殺敵。我們前面只有一條道路，就是「討伐日本，擊破三島」，吾敢向全體國民正告曰：

「中國自由人之表徵，為執戈討日之權利」

二二，一，一五作於南京台城之下。

我們要準備進改纔能應付國難

二三八

573

